社会经济研究丛书 | 潘毅 古学斌 主编

鸣谢利丰社会政策基金会

Social Economy in China:
Beyond the Imagination of Capitalism

社会经济在中国

——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潘毅 严海蓉 古学斌 顾静华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本书探索社会经济的理论问题，并扎根在中国社会的本土实践上，摸索一种有别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从根本上来说，社会经济不是服务于资本积累的，而是重新将经济发展嵌入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新型模式。社会经济的实践是多元化的、开放性的、非垄断的，真正回归社区和人的发展需求的。例如，合作社(生产者合作社，消费者合作社)、社会企业、公平贸易、社区内生性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等等都是社会经济的具体实践。在走过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又接着走过了三十年的市场经济的当下，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双重压力，正在实践和探索中的社会经济，或许正是我们改革的新出路。我们希望通过本书，推动社会经济在中国的落根，也尽一点绵力。

上架建议：社会学

ISBN 978-7-5097-4909-8

www.ssap.com.cn

ISBN 978-7-5097-4909-8
定价：55.00元

社会经济研究丛书 | 潘毅 古学斌 主编

鸣谢利丰社会政策基金会

Social Economy in China:
Beyond the Imagination of Capitalism

社会经济在中国

——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潘毅 严海蓉 古学斌 顾静华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经济在中国: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潘毅等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
(社会经济研究丛书)
ISBN 978-7-5097-4909-8

Ⅰ.①社… Ⅱ.①潘… Ⅲ.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Ⅳ.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0875号

·社会经济研究丛书·
社会经济在中国
——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主　　编/潘　毅　严海蓉　古学斌　顾静华

出 版 人/谢寿光
出 版 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经济与管理出版中心(010)59367226　　责任编辑/王玉山
电子信箱/caijingbu@ssap.cn　　责任校对/刘广增
项目统筹/恽　薇　　责任印制/岳　阳
经　　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4.5
版　　次/2014年1月第1版　　字　　数/158千字
印　　次/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97-4909-8
定　　价/55.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刘老石先生——中国乡村建设的佼佼者

总　序

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在第二次改革的十字路口，面临着过去三十多年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及深层社会矛盾。十八大提出在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加强社会建设，注重以人为本，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注重统筹兼顾，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一直以来，中国的高速工业化与劳动人口城市化之间的巨大落差造成了两亿多农民工“进退两难”的身份困境，他们的劳动权利与生存权利因为这种模糊的社会身份而无法得到保障，使幸福和尊严成为距离他们最遥远的梦想，而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更是农村问题的焦点。

“十二五”规划提出通过城镇化来弥补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落差。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是将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实现对国土的高效利用。这意味着，为了配合工业化发展，城市化进程即将全面展开。农民变成居民，一个缠绕在农民身上几十年的沉重的咒语似乎忽然解除了，换来的是一个轻飘飘的居民身份。农村变成城市可以如此容易，只要资本愿意向其招手，便可以戏剧化地在城乡一体化以及城镇化等政策口号之下迅速

完成。

以资本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主要依赖大企业与大资本，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实现利润为唯一目标，这必然造成其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关系的脱离。这种发展模式不仅谈不上有助于社会建设，更无法解决中国当下面临的种种深层社会矛盾。

土地被资本高效地使用了，农民和工人是否因此过上了幸福的、有尊严的、有保障的生活？现实告诉我们，通过农村土地流转向城市工业资本以及地产资本开放所带来的身份与空间转换，无法真正解决“三农”问题，甚至很可能将农民工的生存境遇推向更加窘迫和尴尬的状态。

那么，改革的出路何在？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同步进行？

我们认为，经济的发展必须回归社会，将市场经济逐渐向社会经济转变。立足农村社会现实，真正推动和扶持多元化的经济模式，在农村社会的原有基础上培育工业化与城镇化，而不是任由或者鼓励大资本侵入农村社会，将土地和农民进行彻底的商品化，剥夺农民仅存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相比于市场经济，社会经济的要旨应该包括：以人为本、立足社区、互助合作、民主参与、人与土地的和谐共生、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多元化的社会所有制。

一般来说，市场经济的主要缺陷在于资本垄断的不可避免，人与土地的高度商品化以及对社会与环境的破坏；而计划经济的主要缺陷在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生产缺乏灵活性，官僚主义管理，工人的生产参与积极性和自主性不足。相比之下，社会经济则最大可能地避免了这

两种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并吸收了这两者的长处：它整合了市场经济的生产效率与管理模式，并承继了计划经济的公平分配与社会参与。

从根本上来说，社会经济不是服务于资本积累的，而是重新将经济发展嵌入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新型模式。社会经济的实践是多元化、开放性、非垄断，是真正回归社区和人的发展需求的。例如，合作社（生产者合作社，消费者合作社）、社会企业、公平贸易、社区内生性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等都是社会经济的具体实践。在走过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又接着走过了三十年的市场经济的当下，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双重压力，正在实践和探索中的社会经济，或许正是我们改革的新出路。我们希望通过此套丛书，为推动社会团结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重思社会经济——理论篇

第一章　指南针：指向社会主义的替代性选择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 003

第二章　团结经济：主要概念和问题

团结经济网络创办人　伊桑·米勒（Ethan Miller）/ 038

第三章　公共资源的未来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060

第二部分　当代中国的合作经济实践

第四章　周家庄：人民公社遗产的新启示

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李长江　卢晖临　潘　毅 / 073

第五章　崖口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危机

香港理工大学　刘　亚 / 118

第六章　山西永济市蒲州果品协会社会经济案例

香港大学　东莞理工学院　何宇飞　居　正 / 136

第七章　农户融资：山西蒲韩乡村合作与台湾农会比较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袁月兴　杨　帅　温铁军 / 158

第八章　妇女、手艺与合作经济——一个西南村落的实践案例

香港理工大学　古学斌 / 168

第九章　流走边缘　团结创业——云南流动社群合作生计的实践初探

香港理工大学　兰树记 / 190

第十章　社区妇女有力量：农民工社区的“同心希望家园”

香港理工大学　罗加铃 / 199

第一部分

重思社会经济——理论篇

第一章　指南针：指向社会主义的替代性选择*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候，即使在那些并未将建立社会主义秩序视为直接政治目标的地方，社会主义都构成了人们思考资本主义的替代物，以及为反对资本主义斗争指引方向时主要的意识形态基础。如果说历史上那些与社会主义相关联的特定的制度安排如今已被认为不再可能完成它们的承诺的话，很多传统的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批判却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切近（appropriate）：不平等、经济两极分化、工作无保障等情况正在恶化；大企业主宰了媒体和文化生产；政治越来越成为大资本的玩物，对穷人却不闻不问。对一个充满生机的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选择的呼唤跟从前一样强烈。

本文旨在提出一种途径以帮助思考针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替代性选择（a socialist alternative），其出发点在于这样一种观察，即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与社会主义（socialism）都包含了“社会的”

---

* 本文原载“Compass Points: Toward a Socialist Alternative”，*New Left Review 41*，September – October 2006，pp. 93 – 124。（译／闻翔）

(social) 一词[①]。这个词通常用来表达一种对社会的广泛福利而非某些上层集团的狭隘利益的承诺。更激进地看,“社会所有”与“私人所有”针锋相对,但在实践中它却往往沦为国家所有,到头来“社会的”这个词几乎没起到什么分析性的作用。笔者认为,“社会的”一词可以用来确定一套原则和愿景 (visions),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以及可以称之为对资本主义的纯粹的国家主义的 (statist) 反映相区别。这些原则以我所谓的“社会赋权” (social empowerment) 为中心。本文第一节将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解放社会理论的议程中对反思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进行定位。第二节是对资本主义的简要批判,辨识社会主义是其解决之道的问题。第三节探讨了构思替代现有权力和特权结构的、可信的制度性安排的一般性问题。在这一节我将阐述“社会赋权”的概念,并且解释一个以此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第四节则勾勒了通往社会赋权的路径图,它们体现了“社会的”社会主义 (a “social” socialism) 的原则。第五节以对变迁问题的讨论来结束全文。

一 解放社会科学的任务

从广义上说,解放社会科学力图生产关乎挑战人类的压迫关系、创造条件使人们可以过上欣欣向荣生活的集体性计划的知识。之所以称之为社会“科学”而不是社会批判或社会哲学,是为了强调关于世

① 在传统的政治术语中,“社会民主主义”指的是由社会主义理想所激发的改良主义计划,它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进行的;而“社会主义”则指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变迁计划。在实践中,很多社会主义政党追求的是严格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议程,有些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则保持着对一个更加反资本主义的变迁图景的忠诚。在本文的脉络中,我把这两者都置于对资本主义民主、平等的挑战的连续谱中。

界如何运作的系统的科学知识对这一使命的重要性[①]。之所以用“解放”一词，是为了定义其核心道德要求——消除压迫以及创造人类得以繁荣发展的环境。之所以用“社会”一词，则是为了表达这样一种信念：解放取决于社会世界，而不仅仅是人类内在自我（the inner-self）的变迁。为了实现其使命，任何解放社会科学都面临三个基本任务：第一，提供对现实世界的系统性诊断及批判；第二，想象可行的替代性选择；第三，理解达到变迁的障碍、机会及困境。在不同的历史时刻，三个任务中的某一个可能比其他的要更加紧迫，但是对于一个完整的解放理论来说，三者缺一不可。

（一）诊断和批判

解放社会科学的出发点不是简单地表明这个世界存在苦难和不平等，而是要揭示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现有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某种特性，并且明晰它们如何系统性地导致对人类的伤害。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对产生这些伤害的因果关系的诊断和批判。

这一点通常是解放社会科学最系统和最成熟的方面。以女性主义为例，大量著作以现有社会关系和制度如何产生对女性的各种压制为主题。这些研究的核心是表明性别不平等不是“自然”的结果，而是各种社会过程的产物。劳动力市场研究强调诸如职业性别隔离、在文化上贬低妇女特质的评价体系、升迁上的歧视、置职业母亲于弱势地位的制度安排，等等。而女性主义的文化研究显示，媒体、教育、文

① “科学”这个词对那些愿意将他们的观点强加给普通人的专家来说，暗示着对真理的特权性的掌握。尽管有时候有人用这种方式要求对“科学”的权力，但我则将科学看作一个深刻的民主原则，因为它拒绝任何人声称拥有绝对的确定性，且坚持将开放的、非统治性的对话作为纠正谬误和推动知识发展的基础。

学等领域的大量实践都习惯性地强化了性别身份和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对国家的女性主义分析则检验了国家结构和政策如何系统地确立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和各种形式的性别不平等。由劳工运动传统、种族压迫理论和激进环保主义所激发的各种经验研究也有类似的观察。

诊断和批判与社会公正及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将一种社会安排描述为产生“伤害”，意味着在分析之中加入了道德判断。在所有解放理论的背后，都存在着一个固有但未言明的正义理论（theory of justice）：必须满足什么条件，才能把一个社会的各项制度看作正义的。受篇幅所限，本文不能详尽探讨隐含于资本主义批判之下的规范理论，简要地说，接下来的分析是被一个我们可以称为对正义的“激进民主的平等主义”（radical democratic egalitarian）理解所激发起来的。它基于两个宽泛的规范性要求：一个关注社会正义的条件，另一个则关注政治正义的条件。

一是社会正义：在一个正义的社会中，所有人都大致平等地享有为过上繁荣生活所必需的物质和社会手段（social means）。

二是政治正义：在一个政治正义的社会中，人们应当被平等地赋予权力，以便集体控制那些影响他们共同命运的状况和决定——这既是政治平等的原则，也是集体民主赋权的原则。

这两项要求合起来，需要社会在激进的社会和物质平等的条件下，深化民主的特质，扩大民主的行动范围。当然，问题就在于要说明如何在实践中能够运用这些原则。

（二）发展各种替代可能

解放社会科学的第二项任务是发展出一个统一可靠的、关于现有

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各种替代性选择的理论，这些替代性选择将消除或至少减轻它们所带来的伤害。这些替代性选择可以从以下三个标准来进行阐述与衡量：可欲性（desirability）、可行性（viability）和可实现性（achievability）。三者嵌套在一个类似等级制的体系中：不是所有可欲的替代可能都是可行的，也不是所有可行的替代可能都是可以实现的。

不考虑可行性及可实现性的限制，只探索可欲的替代性选择，这是乌托邦社会理论和许多规范政治哲学做的事情。典型的此类讨论在制度结构方面是十分薄弱的，它们强调的是对抽象原则的阐发而不是实际的制度设计。比如，马克思主义把共产主义描述成一个按照“各取所需、各尽其能”的原则管理的无阶级社会，而这句格言对实施这一原则的制度安排却几乎只字不提。同样，关于正义的自由主义理论仅仅阐述正义社会的制度应该体现的各项原则，却没有系统地探索可持续的、生机勃勃的结构是否可以被真正地设计出来，从而按照表述所采取的最纯粹的方式实施[①]。尽管这样的讨论也许有助于澄清我们的价值观，强化我们对社会变革事业的道德担当，但是无助于我们了解制度建设的实际工作，或者增加对现有制度挑战的可靠性（credibility）。

对可行的替代性选择的研究则正好相反，它关注改变现有社会结构的方案一旦实施，是否能够持续产生最初激发这一方案的解放性结

① 道德哲学家往往认为，“应该”（ought）就意味着“能够”（can）——没有道德上的义务去做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们至少含蓄地认为，面对现时的世界，什么是可欲的替代性选择这一问题要求在理论上能建立可行的制度以将那些原则付诸实践。然而，在实践中，政治哲学很少关注这些问题。例如，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认为他的“自由原则”在词法上要优先于“差异原则”，而不管这个在现实的制度中是否可能。

果。最著名的例子也许是中央计划（central planning）。中央计划是实施社会主义原则的经典形式，作为对市场的无政府主义的替代，社会主义者相信，人们的命运可以因理性计划的经济获得改善，而这是通过一个集权的完备计划的制度设计实现的。但是中央计划的各种“反常的”（perverse）、出乎意料的后果却破坏了它的预期目标，最终结果是，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它是一个可行的、具有解放性质的替代资本主义的选择性方案。

当然，某一特定制度设计的可行性或许并不是一件全有或全无（all - or - nothing）的事情。它可能非常依赖于各种附加条件。例如，在崇尚一种具有文化基础的工作伦理以及集体义务的国家，全民无条件基本收入（a generous 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就是可行的，而在一个高度原子化的消费者社会中就不可行。或者，在一个结合了各种具体方案的优势、实行慷慨的再分配福利制度国家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之后的社会中，基本收入保障就可行，而在一个只有吝啬的、有限的福利制度国家的社会中则不可行。因此，当讨论可行性时，常常要考虑特定设计能否很好运作的背景条件。

对可行的替代选择的探索引出了在现有社会条件下可实现性的问题。有人质疑，如果我们仅在理论上讨论可行的各种替代性选择，而它们在策略上却不能达成，那么这样的讨论又有什么价值？对此类怀疑的回答应该是：未来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我们不可能知道可实现的替代性选择最终的限制在哪里。因为不确定性的存在，对各种可行的替代选择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很重要，原因有二。第一，现在如果发展出这样的理解，那么当未来的情况扩大了可能性的界限时，以解放性变迁为目标的社会力量更有可能阐明实现替代方案的实

际策略。第二，什么是可达到的，它的实际限制部分地依赖于对什么样的替代性选择是可行的这一信念。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学观点：可能性的社会限制不是独立于对限制的信念之外的。当一个物理学家说物体运动的最大速度是有限制的，它意味着一个客观和不可逾越的限制，其运行不以我们关于速度的信念而转移。但是在社会的情境下，关于限制的信念将系统地影响什么是可能的。因此，发展出有说服力的关于可行的替代选择的阐释，是这些限制自身在其中将得到改变的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这句话要说得让人信服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人们出生时社会就已经存在（already made）了，其规则随着他们的成长得以学习和内化。大家忙于各种日常事务，维持生计，应对人生苦乐。社会世界可以按照计划来改变，从而在根本上变得更加美好——这样的想法对他们来说实在有些遥不可及：因为要设想出一个既更加美好又可以实现的替代方案很难，而要想象如何成功地挑战权力和特权机构才能将此方案付诸实践也实属不易。如此，即使人们接受对现有制度的诊断和批判，他们最自然的反应却可能是很宿命论的，即认为我们做不了什么来真正地做出改变。

这样的宿命论对那些以改变现有社会世界的不公为己任的人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采取这样的策略，那就是，不要太担心有没有激进的、有关社会变迁的、科学可信的设想，而是要利用我们对居住于其中的世界里还存在的不平等的愤怒，并且注入对于人类可能性的希望和激情，勾勒出一个关于某种可欲的替代选择的激动人心的愿景。此类魅力十足的空想在历史上不时会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动员力量，但无法形成充分的基础来改变世界，从而带来可持续

的、解放性的替代选择。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情况：在对现有统治结构的英雄主义的胜利之后，随之而来的却是新形式的支配和不平等的悲剧性建立。因此，解放社会科学的第二项任务就是以尽可能系统化的方式发展出有科学基础的、关于可行的替代性的各种制度的设想。

发展一套关于可实现的替代方案的内在统一的理论，对社会变迁策略的实际工作来说是核心的。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仅是因为评价什么是可实现的而常常陷入空想之中，还因为未来的情况是高度不确定的，这会影响任何一个长期战略的命运。而且，像可行性那样，可实现性并未构成简单的二分法：不同的制度变迁计划实施起来有不同的前景。任何一个给定的可行的替代选择在未来某一天被付诸实践的机会取决于两类过程：第一，支持或反对此替代选择的社会行动者自觉贯彻的策略与相对权力；第二，影响到这些策略的成功机会的众多社会结构条件的历时性轨迹。这一轨迹本身就是人类活动长期积累下来的、非预期的效果的部分产物，但是它也是行动者有意识地改变行动条件所贯彻的策略的结果。替代选择的可实现性因此取决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阐述统一的、让人信服的策略，既有助于创造条件在未来落实替代方案，也拥有动员必要社会力量的潜力，在条件具备时支持这一方案。

（三）变迁理论

对上述议题的理解就是解放社会科学的第三项任务：变迁的理论。我们可以将解放社会科学看作对一次从当下出发、走向一个可能未来的旅行的描述：对社会的批判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离开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关于替代选择的理论则告诉我们要去哪里，而变迁理论

则告诉我们如何从此地到达彼地。这包含了若干困难的、相互关联的问题：关于维持现有权力和特权结构的社会再生产机制的理论；关于这些体系中存在的矛盾、限制和缝隙的理论，它为社会变迁的策略打开了空间；关于体系发展的动力理论，这些动力随着时间逐渐改变策略的条件；还有很重要的，关于变迁策略自身的理论。在本文的结论部分我将再次回到变迁策略的问题上来。但是接下来我们关注的中心将是前文所述的三个核心任务中的第二项，亦即阐明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行的解放性方案。为了给讨论搭建一个平台，首先应该勾勒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基本要素，它将展示由资本主义过程所带来的伤害，正是这些伤害激发人们寻求别样的选择。

二 对资本主义的核心批判

本文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其基本特征是：一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特征的阶级结构，它造成了大多数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维持生计；二是通过分散的市场交换组织起来的经济协作。资本主义不是简单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具有某种特殊形式的阶级关系的市场经济。从技术变迁和经济增长两方面看，资本主义被证明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经济体系。然而，还是可以对资本主义进行认真的批判，如果批判正确，将会构成探寻替代性选择的基础。本文无法为这些批判提供完整的证据和分析，但是从一个激进平等的民主立场出发，以下批判显得尤其重要。

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国家和全球两个维度上都系统地造成了财富和权力的不断集中以及越来越多的人被剥夺、被边缘化和

贫困化。

二是由于资本主义系统地拒绝让世界人口的大部分享有自由发展和繁荣的条件，即使在最发达经济体中也是如此，因此在资本主义统治下不可能实现普遍的解放。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宣称“自由选择”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美德，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却只能部分地实现，因为制度滋生的不平等需要限制许多人“真正的自由”：限制他们的实际能力，阻碍他们根据自己的人生计划来行动，以及实现对自己有意义的选择[①]。

三是资本主义的利益驱动机制倾向于生产的不断增长和市场的不断扩张——它带来了一个消费者导向的社会，创造了各种虚假的消费者“需求”——但这些是以无节制的环境成本为代价的。利益最大化驱使资本主义企业将废弃物倾倒进环境中，也导致了非赢利的公共物品生产的不发达（干净空气、公共医疗、全民教育）。资本主义市场未能整合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长期成本，从而造成资源的低度定价和过度开发。

四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压力预示着更加广泛领域中的人类活动将屈从于市场力量的支配：医疗、育儿、老人看护、人类再生产的商品化引发了各种突出的规范性议题。

五是资本主义关系中的利益不一致削弱了休戚与共和相濡以沫的感觉。在剥削关系中，剥削的一方出于自己的利益希望维持被剥削者脆弱和受剥夺的状态。

六是资本主义给民主设定了重要的限制，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得很

① 分别见 Milton and Rose Friedman, *Free to Choose*, San Diego, 1990; Philippe Van Parijs, *Real Freedom for All*, Oxford, 1995。

多重要经济活动无法实行集体决策。

明晰以上批判的本质很重要。所有这些批判的核心都是，它们所描述的各种危害都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机制所导致的。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拥有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社会——面对这些危害无计可施。然而这的确表明，要对付危害，必须引入非资本主义的机制以抵抗资本主义自身的影响。而这又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能走多远，可以既减轻上述危害，又不会因为累积性地引入了如此之多的反资本主义的机制而导致经济结构自身的资本主义特征发生变化？我们在第三节中将看到，这是想象可替代资本主义的种种选择时的一个核心议题。

三 对替代性选择的思考

（一）马克思的路径

在历史上，思考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选择最有影响的途径是由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开创的。他对于如何阐释一个可靠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即使最终的结果可能差强人意，但在智识上却是充满光辉的。马克思不是去创造一个能够展示可行的解放性替代方案可能性的系统理论模型，而是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从长远来看的“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的理论。他的论点我们早就耳熟能详了：因为资本主义内部的动力和矛盾，资本主义破坏了它自身存在的条件。这是一个决定论式的理论：从长远看，资本主义将成为一个不可能维系下去的社会安排，因此一些替代性选择方案

必然会出现。问题是要找到一个可靠的个案，说明一个民主、平等的经济社会组织对于如此的替代性方案来说，看起来还是有道理的。在此处，马克思的理论显得尤其精致，他指出，推动资本主义走上自我毁灭道路的条件同样也创造了历史的主体——工人阶级——他们既有志于一个民主的平等社会，也拥有不断增强的力量来将其利益转化成行动。因为这些元素，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可以被看作实用主义的，其论述围绕着有创造力的、团结的工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展开：随着资本主义进入长期的不断加剧的危机和衰退，工人阶级将发展出集体性的政治组织，从而夺取国家政权，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并且摸索着创建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将一个高度决定论的资本主义灭亡理论——其运作逻辑将最终导致其不可维系——与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论的建立替代选择的理论结合在一起。

这个理论在智识上是一个杰出的成就，它激发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激进的社会政治运动。然而，在一些关键层面上，它却是有缺陷的，并且我相信，它不能作为挑战资本主义的持续进行的平等主义计划的基础。我在这里只指出四个核心问题。首先，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键论题——资本主义自掘坟墓，从而被替代——并不能令人满意。这一预测依赖的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不是简单的周期性的，而且这些危机随着时间推移具有不断深化的趋势”这样的观点，但是这一观点的理论依据却值得探讨。

其次，经典马克思主义预测，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将不断朝同质的无产阶级化的方向发展，但已经证明这是不准确的。尽管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已经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投入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之中，但

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这并没有导致一个不断加深的无产化和阶级同质化的过程，而是导致阶级结构日趋复杂。阶级关系中相互矛盾的位置越来越多，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自雇在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断增长，工人阶级中很大的一部分通过员工持股计划（ESOPs）和养老金基金拥有股票，随着越来越多的已婚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用阶级术语来讲，家庭也变得越来越异质化，职业发展轨迹也给阶级定位带来了暂时的不确定性[①]。阶级关系的复杂形式并不意味着阶级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正在下降，也不意味着阶级结构在根本上正变得不那么资本主义，而是表明，资本主义的结构变化正逐步削弱工人阶级越来越同质化地面对资本主义这一论断。

再次，资本主义潜在挑战者的集体阶级力量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系统地增强。这部分地缘于被宽泛界定的工人阶级在利益上的异质性，但也是因为各种形式的阶级妥协有力地削弱了挑战这一体系的力量。

最后，对于实现民主、平等的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断裂（ruptural）变迁理论并未构成貌似有理的基础。虽然针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性挑战有过很多，但在历史上，没有一次革命性变迁曾维系过长期的民主的制度建设的探索性过程。建立替代性的解放制度的能动理论取决于普通人在协商和决策过程中的积极的、创造性的和被赋予了权力的参与。在对资本主义革命性改变的努力中，曾经存在过此类参与的插曲，但只是短暂且相对孤立的。要诊断它们何以会失败当然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但很可能，成功地与资本主义制度革命性决裂需要政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见 Wright, *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Cambridge, 1997。

治权力和组织集中，而这本身就与民主的实验主义（democratic experimentalism）所需要的参与式实践不相容。革命政党也许是在特定环境下颠覆资产阶级国家的有效的“组织武器”，但当建设一个民主平等的替代性制度时，它们却成了非常无效的工具。因此，我们已有的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的经验案例都导致了经济组织的国家官僚主义形式，而不是任何接近于对资本主义的民主平等的替代。

（二）追求替代性方案的另一种途径

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替代资本主义的理论主要依赖作为资本主义运行轨迹关键性特征的决定论：马克思预测其未来的大致发展方向，希望有助于实现解放的替代方案。如果没有这个理论，就更难让人相信存在着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行的解放性选择了。当然，有一个办法是先努力描绘出一幅社会主义制度的完整蓝图，展示这些制度将有效地运作，接着再给出一张地图，指明从我们已知的世界前往这样一个目的地的可能途径。有了地图在手，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设计出可以完成这样一趟旅程的合适的交通工具。

没有一个现成的社会理论足够有力，可以让我们开始构建有关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的社会目标的全景。也许这样的理论即使在原则上也是不可能的——社会变迁太过复杂，又深刻地受到各种纠缠在一起的偶然性因果过程的影响，我们很难用计划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无法得到一张确定的地图。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离开我们所在之地，远离存在其中的邪恶和不公。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相比一张路径图指引我们前往已知目的地，我们可以把解放社会变迁的计划看作是一次探索之旅。我们启程，随身的航海装备能告诉

我们正在前进的方向以及已走过的航程，但是没有一张地图显示从起点到终点的整个路线。这当然有危险：我们或许会遇上不曾预料到的阻碍，迫使我们不得不向一个我们不曾计划过的方向前进；我们或许不得不折返回来，然后尝试新的路线。也许，通过一路上我们发明的各种技术我们可以创造高地，然后看清楚远处。最后，我们可能发现，我们的旅程存在着绝对的限制，但至少我们知道自己是否正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这种思考解放性替代选择的方式保留了强大的关于资本主义之外的生活的规范性视野，同时也承认我们对超越资本主义体系的真实可能性的知识有限。这不是去拥抱那种错误的决定论，认为对于建构一个民主平等的替代性选择来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限制：我们缺乏坚实的有关可能性限制的科学知识，不仅关于各种激进替代性选择的前景如此，有关资本主义的持久性的了解也是如此。开始这样一趟旅程的关键是我们的航海设备是否好用。因此，我们需要打造一个或许可被称为“社会主义指南针”（a socialist compass）的东西，即一些告诉我们是否正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原则。

（三）社会主义的概念

大多数对社会主义的讨论将社会主义的概念建立在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的比较上。标准的做法是，首先讨论组织生产的不同方式，接着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经济结构，生产以通过市场交换获得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生产资料私有，工人因为不拥有生产资料只得出卖劳动力以维持生计。社会主义则被定义为在一个或几个方面与资本主义对立。既然资本主义概念的核心是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社会主义则

被理解为以或此或彼的方式实行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最典型的就是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的制度设计。我在这里要以一种不同的方式阐述社会主义，我将拿社会主义的概念同时与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statism）这两种——而不只是一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类型相比较。

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被看作组织权力关系的不同方式，经济资源借此得以分配、控制和使用。作为一个初步的尝试，我们可以对这三个概念的权力维度做出以下定义。

第一，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经济结构，其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因此出于各种社会目的（social purposes）而进行的资源分配和使用是通过经济权力（economic power）的实施而达成的。投资和对生产的控制是资本所有者经济权力运作的结果。

第二，国家主义是这样一种经济结构，其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因此出于各种社会目的而进行的资源分配和使用是通过国家权力（state power）的实施来达成的。政府官员通过某些形式的国家—行政管理（state - administrative）机制控制了投资过程和生产。

第三，社会主义则是一种与前两者都不同的经济结构，其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共同所有，因此出于各种社会目的而进行的资源分配和使用是通过所谓的“社会权力”（social power）的实施而达成的。社会权力根植于公民社会中动员人们参与各种合作性、志愿性的集体活动的力量。这意味着公民社会不能被简单地看作一个活动、社交和沟通的场域，它同时也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权力的场域。社会权力与经济权力相比在经济资源的占有和控制上不同，与国家权力相比则在对一个给定地域的规则制定和规则实施权力的控制上不同。民主在这种意义上，可被看作连接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一种具体方式：在理想化

的民主中，国家权力完全从属于社会权力并对后者负责。因此，民主在本质上讲是一种深刻的社会主义原则。如果“民主”意味着国家权力从属于社会权力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则意味着经济权力从属于社会权力。在社会主义中，投资和对生产的控制是通过社会赋权（social empowerment）的各种机制组织起来的。

这一以社会权力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不是通常人们理解社会主义的方式。事实上，很多人用“社会主义”这个术语指代我在本文中所说的国家主义。然而，对社会主义的再次概念化，确实抓住了社会主义的核心道德理念：这是一个按照旨在服务于普通人而不是精英的需求和愿望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经济体，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经济体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普通人所控制，亦即从属于社会权力。

我们需要对上文勾勒的概念图景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三者都是经济结构的一种类型，但只有在资本主义中，经济权力才在决定经济资源的使用上占主导性地位。在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分别由一种与经济本身相区别的权力类型在经济资源的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当然，在资本主义中，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同样也存在，但对经济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不起关键作用。

这三种理想类型中的每一种，我们都可以想象出一种极端形式，即只有一种类型的权力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发挥影响。在这些形式中，极权主义可以被看作高度国家主义（hyper - statism）的一种形式，国家权力不仅是控制经济过程的首要权力类型，甚至于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存在的。在纯粹的自由资本主义中，国家退守到“守夜人”的角色，仅仅保证产权，商业活动渗透到公民社会的各个领域且将一切都商品化。经济权力的运作基本上完全说明资源的分

配和使用；公民是原子化的消费者，他们在市场上做出个体化的决策，却对经济产生不了任何通过公民社会中的联合所形成的集体性权力。而在共产主义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解，国家不复存在，经济被吸纳进公民社会中，成为联合的个体之间的自由的、协作性的活动。

这三种极端形式都不可能作为稳定和可再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存在。极权主义从来不曾连根铲除所有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后者是在国家直接控制之外的合作性社会互动的基础，经济组织的实际运作也从未完全从属于中央集权的指令控制计划。如果国家仅仅扮演自由主义幻想家所定义的最小化角色，资本主义将会变成一个不可再生产的混乱的社会秩序；当然，如同波兰尼（Polanyi）所说，如果公民社会作为一个完全商品化和原子化的社会生活领域被吸纳进经济中，资本主义的运作也会变得更不稳定。因此，可行的、可持续的大规模社会组织的形式，总是牵涉这三类权力之间的某种相互关系。

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应被简单地看作某种各自分离的理想类型，而应被视为变量。基于私有产权实施经济权力的行动者所做出的决策越是能够决定生产型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经济结构就越是资本主义的。通过国家而实施的权力越是能够决定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社会就越是国家主义的。根植于公民社会的权力越是能够决定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社会就越是社会主义的。因此，存在着各种复杂的混合形式——例如，一个社会在某些层面上可能是资本主义的，但在另一些层面上则可能是国家主义或社会主义的。

经济结构是多样权力关系的混合体，这一概念对于改变这些结构的想法至关重要。当今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都包含了显著的国家主义

的元素，因为国家分配部分的社会剩余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国防和教育等领域中的投资。更进一步的，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都从生产资料的私有者那里剥夺了一些权力，比如当资本主义国家对企业强制实施卫生和安全管理时。国家权力而不是经济权力，控制了这些特定的生产领域，那一部分的所有权因此被转移给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同样也总是包含至少一些社会主义的元素，只要由公民社会中的集体行动者通过努力左右政府（在立法方面）和资本主义企业（在工资与工作条件方面），就可间接影响经济资源的分配。如此，使用“资本主义”这个简单的、未加任何修饰的词来描述一个经验个案，等于是在简略地说，一个像“资本主义在组织经济活动上居支配地位的经济结构”这样的东西。

四　通往社会赋权的不同途径

重述一下上文的概念构想：我们可以根据决定经济活动（即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主要的权力形式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主义进行对比。具体来说，对经济资源和活动的使用与控制的社会赋权的形式越多、程度越大，我们就越有理由说这个经济体是社会主义的。这在制度设计上意味着什么呢？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现成的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实例，所以我们对使这两种经济结构成为可能的制度安排有清楚的了解。但是社会主义呢？什么样的制度设计可以保证根植于公民社会中自愿联合的权力能够控制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向一个社会赋权作为经济体的核心组织原则的社会迈进意味着什么？生产资料归社会中的每个人集体所有而不是归国家所有，这在制度上

意味着什么？

在这里，我们不是要给出一个如何实现对经济活动的社会赋权的蓝图，而是希望清楚地阐明一系列的原则，这些原则可以告诉我们是否正走在正确的方向上。这就是一个社会主义指南针的任务。根据上文讨论过的权力形式，这样一个指南针需要指示三个主要的方向：一是通过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而实现的社会赋权；二是通过经济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而实现的社会赋权；三是直接通过经济活动而实现的社会赋权。

这三种社会赋权的方向将引出一系列的途径，社会权力通过这些途径可以被转化成对资源的分配和对生产与分配的控制的权力，如图1－1所示[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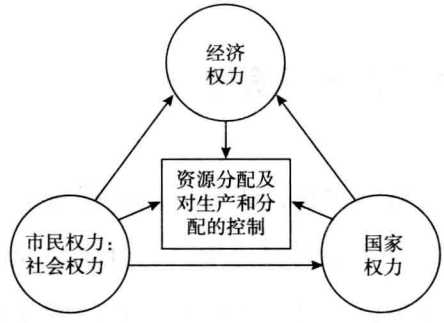


图1－1　社会赋权的不同途径

其中，有五种途径是尤其重要的。在这五种途径中，我们能够思考一系列具体的制度构想，将推动我们沿着更大的社会赋权的方向前进。我将构思这样的制度方案称为“想象真实的乌托邦”（envisioning

① 箭头代表某一领域对另一领域的支配，比如从社会权力到国家权力的箭头就意味着根植于公民社会中的权力直接影响了国家权力的运作。这个图仅仅表现了社会权力如何运作的图景，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关于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所有权力关系的图。也可以描绘类似的图表示通往国家主义或资本主义经济权力的途径。

real utopias)：之所以“乌托邦”，是因为它们体现了解放理想；之所以“真实”，则是因为它们试图形成切实可行的制度设计。接下来，我们将简要地讨论这五种社会赋权途径各自的特点。

（一）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statist socialism）

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将大众权力（popular power）——根植于公民社会中的结社活动（associational activity）的权力——转化为对生产和分配的控制的基本途径是通过国家。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这些方案可以被描述成“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模式。基本的想法如下：政党是在公民社会中形成的组织，其目标是影响国家。政党成员是为了一定的目标加入进来的，政党的权力取决于动员各种集体行动的能力。如果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是深深地嵌入工人阶级的社会网络和社区之中的，且通过一套公开的并因此代表工人阶级（或更宽泛的联盟）的政治过程从而实现民主负责制的，如果这个政党后来控制了政府，政府又控制了经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一个被赋权了的公民社会控制了生产和分配的经济体系。图 1-2 表现了这一国家社会主义的经典模型。在这里，经济权力被边缘化了：行动者不是因为对资产的直接占有才拥有组织生产的权力，而是因为他们在公民社会中的集体性政治组织及其对国家权力的运作。

此种类型的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社会主义（revolutionary socialism）的核心观点。其设想——至少在纸面上——是这样的：政党与工人阶级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对有组织的工人负责，因此它对国家的控制也就成为公民社会（以阶级的形式来理解）控制国家的一个机制。并且，革命社会主义还想象了对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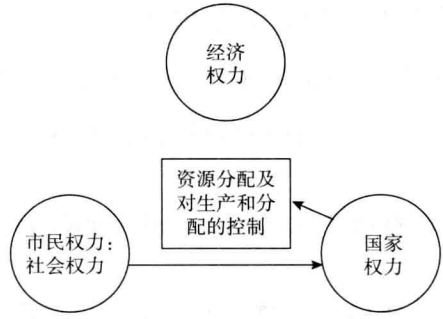


图 1-2　国家社会主义

家和经济制度的激进重组——通过参与式委员会（participatory council）的组织化形式，在俄国革命的例子中被称为“苏维埃”——工人组织直接参与到国家和生产中权力的运作中。这些委员会如果完全以民主的方式赋权，并且扎根于自主的公民社会之中，那么就可以被看作将结社权力的优势制度化的一种机制。再一次的，政党被视为这一过程的关键，因为它将领导从公民社会到实际的社会权力的结社性转化的整个过程（“先锋队”）。

当然，现实并不是如上面所描述的（见图 1-3）。无论是因为革命政党组织有将权力集中在领导层的内在倾向，还是因为俄国革命及革命后所处的历史环境带来的种种严苛限制，总之布尔什维克政党从属于自主的公民社会的任何可能性在 1917 年之后就被破坏掉了。当时新生的苏联政府已经完全巩固了政权，开始其协力改造经济的努力，苏共则变成了一个国家统治的机制，变成渗透公民社会与控制经济组织的工具。某些社会主义的元素仍然保留在这个经济结构的混合特征中，但是它的核心组织原则却是国家主义，而不是社会赋权。此后各国取得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政党，尽管各有不同，但大体上都遵循了这一相同的道路，它们创造了各种国家主义的形式，但从未创造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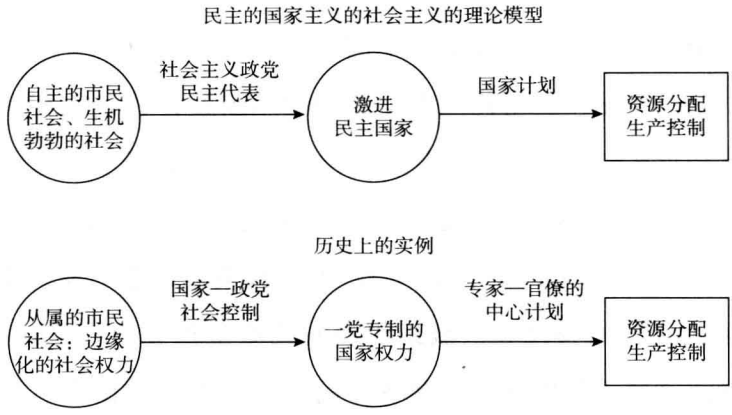


图 1－3 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

个以赋权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

今天，很少有社会主义者仍然相信完全的国家主义的中央计划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一个可行结构。然而，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仍然是所有类似社会赋权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对于许多公共物品的提供来说仍然居于核心地位，包括医疗、教育和公共交通；先不管命令经济下的中央计划的成绩如何，在未来某个时刻，如果历史条件发生改变，还是可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于某些特定种类的商品生产实行有效和民主的中央计划或许是可行的。那么，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关键问题就是，在何种程度上，这些国家掌控的商品生产可以被置于一个民主赋权的公民社会的实际控制之下。典型的情况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提供公共物品，仅仅是对通过代议制民主的制度实施的社会权力轻微的屈服。因为资本家的经济权力对国家政策的强大影响，公共物品的提供往往服务于资本积累而不是社会需要。深化国家的民主特性因此成了核心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国家对商品和服务的提供才能成为社会赋权的真正途径。

很多人也许会怀疑达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命令—控制官僚体系在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双重失败召唤对国家服务的私有化，而不是民主化。但是仍然有一系列的革新设计让我们相信，更有活力的参与形式是可能的，尤其是在地方和地区层面上，它们既可以增强公共物品提供的效率，也可以增强民主制度的代表性[①]。在巴西的愉港市（Porto Alegre），自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参与式预算制度吸引了大量普通公民和次级组织参与到城市预算的真正的决策中，尤其是对政府提供的地方性公共物品的预算。参与式预算引导当地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方向发生显著变化，使其更多地服务于穷人和工人阶级的需要。

（二）社会民主主义的管制（social democratic regulation）

社会赋权的第二条可能途径围绕国家限制和规约经济权力的方式（见图1-4）。即使在当今这样一个去管制化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大获全胜的时期，国家仍然以冲击到资本家的经济权力的方式，深深地卷入对生产和分配的管制之中。这包含了一系列的干预：污染控制、工作场所的卫生和安全规定、产品安全标准、劳动力市场上的技术证明的提供、最低工资等。所有这些都需要国家权力来制约资本所有者的权力，从而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如果这些积极的国家干预形式本身事实上从属于社会权力，那么就变成了一条社会赋权的途径。

但是，对资本家的经济权力的国家管制，不一定意味着显著的社会赋权。问题再一次回到国家管制行动作为真正的民主赋权的表达的

---

① Archon Fung and Erik Olin Wright, *Deepening Democracy: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in 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London, 2003.

程度和深度。在实际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很多经济管制其实是为了应对资本的需要和权力，而不是为了满足公民社会的需要。结果造成了一个类似于图 1－5 所示的形态，而不是图 1－4：国家权力管制资本，但是以系统地响应资本本身的权力的方式。因此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管制过程可以以削弱资本权力、增强社会权力的方式民主化？而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之一有时被人们称为“结社民主”（associative democrac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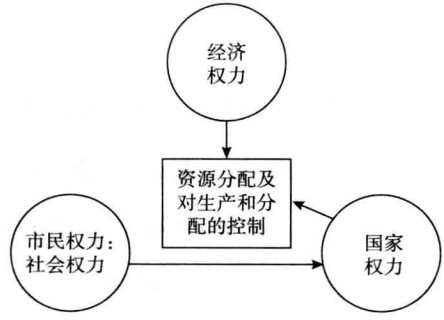


图 1－4　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主义经济管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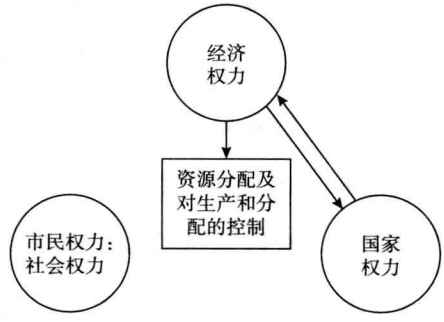


图 1－5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管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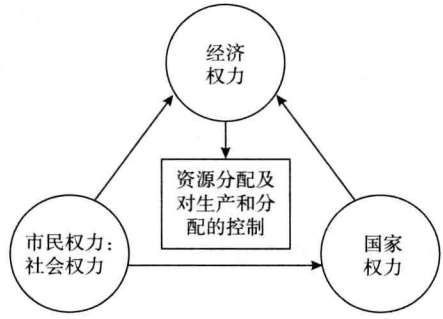


图 1-6 结社民主

（三）结社民主

第三条路经——结社民主——包含一系列制度设计，公民社会中的集体组织，通常与国家的代理人一起，通过这些制度设计直接参与到各种类型的管理活动中[①]。它可被解释成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共同对经济权力施加影响（见图 1-6）。我们最熟悉的形式或许就是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中三方参与的新社团主义（neo-corporatist）的安排，由被组织起来的劳工、雇主协会和国家三方聚在一起就经济管制进行谈判，尤其是那些影响到劳动力市场和雇佣的方面。结社民主可以被扩展到许多其他领域，比如流域委员会（watershed councils），它将公民组织、环保团体、开发商和国家代理人整合到一起共同调节生态系统；又如健康委员会，医学组织、社区组织和公共卫生官员通过它共同计划医疗保健。如果相关组织内部是民主的，代表了公民社会中的利益，并且它们所参与的决策过程又是开放的和审议式的，而不是在很大程度上被精英和国家所操纵，那么结社民主就有助于社会赋权。

---

① 深入讨论见 Joshua Cohen and Joel Rogers, *Associations and Democracy*, London, 1995。

（四）社会资本主义（social capitalism）

经济权力基于私有产权以及对各种类型资本的分配、组织和使用的控制。公民社会中的次级组织，通过各种机制，可以直接影响经济权力使用的方式（见图1-7）。例如，工会通常控制着大笔的养老金。这些钱一般根据信托责任的规定管理，除为受益人提供安全可靠的退休金之外，不得用于其他用途。但是规定是可以被改变的，工会有可能通过对这些养老金的管理而对企业施加影响。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则提出了一种更具野心的新型养老金计划，它由企业分摊，将使更多公民社会中的次级组织对资本积累的模式产生显著影响。现在，加拿大的工会运动已经创造了一种风险投资基金，由工人控制，旨在为刚起步的、满足一定社会标准的企业提供本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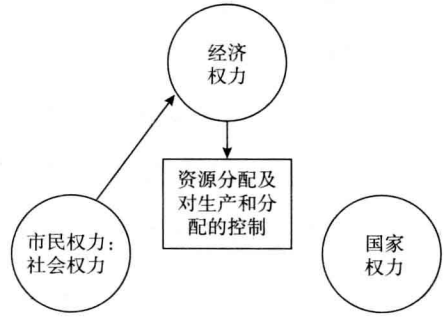


图1-7 社会资本主义

社会资本主义并不限于由公民社会中的组织来控制资本基金这一种方式。还有很多别的方案也通过加强公民社会组织的权力来限制经济权力，但它们主要体现工人集体参与对工作场所的管理。德国的共同决策制度就是一个有限的例子，它规定工人代表必须在企业的董事

会中占据一定的席位。另一个更加激进的方案是用利益相关者大会来取代股东大会控制企业的董事会。再比如对工作场所的卫生和安全情况的监察，通常是由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的，他们派出督察员到工厂里监督规定的执行情况；而一个替代性的计划则是赋予工作场所的工人委员会以监督卫生和安全条件的权力。后者是加强社会权力对经济权力管理的一个例子。将消费者主导的压力施加于企业的社会运动也可以被视为公民社会赋权的一种形式。包括反血汗工厂运动和劳动规范运动，这些运动以大学校园为主要基地，有组织地抵制企业销售不符合某些公认的社会规范的产品。

（五）社会经济（the social economy）

给公民社会赋权的最后一个途径是让公民社会中的次级团体直接参与组织各种层面的经济活动，而不是仅仅影响经济权力的运作（见图1-8）。“社会经济”构成了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生产、国家组织的生产或家庭生产的一种直接组织经济活动的方式。其特点是集体组织生产，直接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服从于利润最大化或国家—技术官僚的理性逻辑[①]。它包括社区自己组织的诊所和托儿所，以及通过减少剥削性的中间商环节以推动与南半球发展中国家（the global south）的公平贸易的非政府组织，还有社区土地信托，它们将土地从市场上收回来，以供应普通人买得起的住房。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经济类型的生产所需要的资金最重要的获取途径是慈善捐助，这也是为什么这样的活动通常是由宗教机构来

① 在图1-8中，没有箭头是从国家到生产和分配的，这是因为国家本身不直接参与到这些活动中。当然，国家仍然在设定社会经济运作于其中的法律参数时发挥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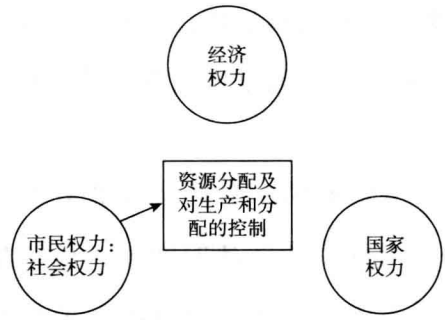


图 1－8 社会经济

组织的原因之一。另一种途径是政府通过其征税的能力为各种社会组织的非市场生产活动提供资助。在表演艺术领域这已经是十分常见的了：很多艺术团体是在不赢利的基础上运作，旨在满足人的某种特殊需求，它们获得大笔的政府补助，从而免于市场的压力。在魁北克有一个很全面的看护体系，它为老年人提供由生产者合作社（producer co－ops）组织的家庭看护，小孩看护则由家庭托育合作社组织。省政府给这些合作社很大的资助，并且订立法规，本质上阻止了营利性公司进入这些领取补助的社会经济部门。这些合作社是从社会经济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接受一个公民社会组织，即社会经济工地（The Chantier de l’économie sociale）的统筹[①]。加拿大的单一付费医疗体系也包含了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元素：政府资助几乎所有的医疗，并为其标准制定规章，但这个体系没有像英国国家医疗健康中心（British National Health Service）那样直接组织提供医疗服务。相反，医院、诊所

① 有两篇文章对魁北克的社会经济的革新性和自主性作了精彩的讨论，见 Marguerite Mendell, “The Social Economy in Québec: Discourses and Strategies”, in Abigail Bakan and Eleanor MacDonald (eds.), *Critical Political Studies: Debates From the Left*, Kingston, 2002, pp. 319－343; Nancy Neamtan, “The Social Economy: finding a way between the market and the state”, *Policy Options*, July/August 2005, pp. 71－76。

和药店由公民社会中的各种机构运作，包括社区组织。它创造了一个空间，医疗保健社会经济在此通过民间参与式合作社运作，可以潜在地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阻碍社会经济长足发展的一个最大因素是为在社会经济部门工作的人们提供一个适当的生活标准的问题。克服此障碍的一个办法是实施全民无条件基本收入，这一般被认为是基于社会公平的平等主义原则。但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策略，将资本积累的部分社会剩余转化为所谓的“社会积累”，通过减轻社会经济中集体组织的压力制定生产者生活标准。借此社会赋权沿着社会经济的路径得到了增强。

（六）社会权力的问题

这五种途径构成了社会权力在理论上被转化为对经济生产和分配的有效控制最主要的方式。这些途径中社会赋权的增加，意味着我们在沿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当然，也有理由怀疑，根植于公民社会中的权力如何才能被组织起来控制资源在生产和分配上的安排。有两个问题尤其麻烦。第一，一个有活力的公民社会恰好是由各种异质性的组织、网络和社区组成的，它们基于不同的团结、根据不同的目标建立起来：它们似乎无法构成控制复杂的经济体系所需要的统一的（coherent）权力的基础。第二，组成公民社会的志愿组织，有很多是基于狭隘的排他性利益以及对特权的保护，比如三 K 党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我们凭什么相信对这些组织的赋权将会有助于消除资本主义的罪恶，更不用说有助于人类解放？

第一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为什么本文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不同

于无政府主义的原因。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超越资本主义意味着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公民社会中的自愿的、合作的集体行动自发地取得维持社会秩序和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足够的统一性。社会主义则相反，它要求国家的存在——国家有真正的制定游戏规则、创造协调机制的权力，如果没有这些权力，公民社会中的集体权力就无法达到必要的整合，从而既不能控制国家，也不能控制经济。就如同资本主义经济需要一个资产阶级政府来保证资本家的经济权力持续运作所需要的条件、国家主义的经济需要一个“国家主义的政府”来保证其最低限度的协调一样，任何一个可持续的对经济的社会赋权过程也需要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

第二个问题——公民社会包含了很多与平等解放理想相抵触的组织——更加麻烦，因为它举起了一个基于排斥和压迫的社会主义的幽灵。我们不能保证，如果来自公民社会的权力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社会就一定会支持激进、民主、平等的理想。然而，这不是社会主义自身独有的问题，而是一切民主制度都会遇到的问题。正如保守主义者经常指出的，民主内在地具有多数人的暴政的可能性，但在实践中自由民主主义已经相当成功地创造了一些既保护了个人权利也保护了少数派的利益的制度。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也将面临相同的挑战：如何设计一种深化民主和社会赋权的制度框架，且这一框架也会培育激进、民主、平等的解放观念？我的主张不是说社会赋权的社会主义必然将成功地应对这一挑战，而是相比资本主义或国家主义，沿着社会赋权的道路前进将给为这些理想而进行的斗争提供更有利的环境。

五　变迁

上述五种社会赋权的途径所描述的真实乌托邦的构想并没有构成一幅完整的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蓝图。要打造完全体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理想、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还需要实现很多别的制度变迁，更不用说建设一个可以在经济结构之外实现民主、平等的解放理想的新社会了。不过，如果我们以上讨论的所有的制度构想以一种严肃和彻底的方式实施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将会被深刻地改变。其中一些构想，当采取个体化的方式时，可能仅被看作某种比较温和的社会赋权运动，但如果采取集体的形式，它们就构成了对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以及基于其中的权力、特权结构的根本改变。资本主义也许仍是控制经济活动的权力关系的混合型结构中的一个部分，但它却是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被国家和经济深刻的民主化严格限制的资本主义。

真实乌托邦的各种设计在现有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它们构成了可欲和可行的替代选择，但作为一个整体方案而言，却不是当下就可以实现的。这要取决于社会行动者的权力以及他们行动所处的环境。发展出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是解放社会科学的第三个任务：关于变迁的理论。

变迁理论的核心问题是：考虑到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对解放性变迁的阻碍和机会、这一过程之中的差距以及社会变迁的不确定的未来轨迹，什么样的集体策略有助于我们沿着社会解放的方向前进？历史地看，争取民主、平等和解放理想的斗争往往分为三种不同的变迁模式，新的社会赋权制度或许可以通过这些模式得以建立。这三种

变迁模式分别是：断裂的（ruptural）、缝隙的（interstitial）和共生的（symbiotic）。

断裂变迁倾向于通过与现有社会结构和形式的决裂来创造新的社会赋权制度。其核心思想是，正面对峙和政治斗争产生彻底的分裂，在很短的时间里现有制度遭到破坏，新的制度得以建立。以实现社会主义为主旨的革命方案就是断裂变迁模式的一种标志性版本：大众力量决定性的、全面的胜利带来根本经济结构的迅速变迁。然而，断裂变迁不仅限于革命，它可能改变的是一连串的制度而不是整个社会体系的基础；改变也可能是局部的而非全盘的。但是其一致的理念是剧烈的不连续性和迅速的改变，而不是一个较长时期里逐渐发生的质变。

缝隙变迁则试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缝隙、空间和边缘中建立新的社会赋权形式，通常在这些地方不会给统治阶级和精英带来直接的威胁。这种策略深深地嵌入公民社会之中，通常会避免对资本主义进行激烈的批判。虽然缝隙策略位于某些无政府主义社会变迁途径的核心，在许多社区活动家的事业中也占据了很重要的实践地位，但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却不屑于这样的努力，认为它们治标不治本，或仅具象征意义，不太可能对现状构成真正的挑战。然而，积累起来，这样的发展不仅可以真正改变人们的生活，而且潜在地构成了扩大整个社会中的社会赋权的变迁范围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

共生变迁则指的是这样的策略，它们既扩大和深化了大众社会赋权的制度形式，又有助于解决统治阶级和精英遇到的实际问题。例如，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就是那些自下而上的、最初被视为对资产阶级稳定统治构成严重威胁的联合压力和斗争的结果。社会赋权的

增加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但它也服务于资产阶级和其他精英的利益，帮着解决问题，从而有助于资本主义的稳定。共生变迁因此具有了矛盾的特点，在制度变迁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之间存在着张力：短期地看，共生形式的社会赋权有利于精英和统治阶级；而长期地看，它们将会改变权力的平衡，从而带来更大范围的社会赋权。

这三种变迁模式表明了变迁政治中的三种不同立场。断裂变迁，至少是其较激进的形式（“打碎国家”），假定社会再生产的核心制度不能有效地用于解放目的；它们必须被摧毁，由新生事物取而代之。缝隙变迁（“忽略国家”）则试图在旧世界之中自下而上地开始建设另一个世界的工作。也许有时可以利用现有体制促进这一过程，但缝隙变迁一般会绕开权力核心。共生变迁（“利用国家”）则寻找可以在社会再生产的核心制度中实现解放性的变革的方式，尤其是在国家之中。它希望形成新的密切配合的混合形式，使我们沿着扩大了范围的解放社会赋权的方向前进。

没有哪一种策略没有问题，没有哪一种策略可以保证成功，它们都有风险和困境。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某种策略或许最为有效，但一般来讲任何一种策略都无法自足。我们经常看到，活动家只忠于某一种策略，视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结果，大量的精力被用来与被拒绝采纳的模式作斗争。一个志在成功的长期计划必须把握好如何将这些策略结合起来这一复杂问题，即使这一结合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当不同策略相互矛盾时斗争常常无法避免。

在21世纪的开端，人们很容易对一个社会赋权的社会主义未来的前景持悲观态度。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牢记，在世界各地都有人在尝试这里的很多方案。探索仍然存在，新的制度正不断地在资本主义

社会的缝隙间被建立，并且不时取得政治上的胜利，使国家可以被动员起来参与到社会革新的过程之中。社会赋权的各种新形式也不断出现。我们不知道在资本主义内部这些局部的、片断的试验和革新有什么限制：社会赋权也许最终被限制在边缘，又或许它们还有更大的演练空间。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至今还没有达到这些极限。系统地思考解放的替代性选择是扩展可能性的范围这个过程中的一个要素。今天看来还只是可行的变迁构想，明天也许就变成了统一的政治计划。踏上了在资本主义内部社会赋权的旅程，我们或许可以到达一个对其赋权的世界，并且最终，也许，会超越资本主义的命运。

第二章　团结经济：主要概念和问题*

团结经济网络创办人　伊桑·米勒（Ethan Miller）

从美国到世界其他地方，大家都正经历和面对着由置少数人利益于多数人幸福之上的经济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那些从这种经济模式中得益的政治和商业领袖们一致宣称没有替代性方案，然而，全世界的公民和草根组织却勇敢地证明了其他经济模式存在的可能性。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民间经济行动已经出现，它们常常很隐蔽，或者边缘化，藏身于主流经济的夹缝之中：工人、消费者与生产者合作社，公平贸易运动，理念村，另类货币，社区管理的联谊中心与资料图书馆，社区发展信用社，社区花园，免费软件资源共享行动，社区支持农业（CSA）计划，社区土地基金等。

尽管这些行动种类多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它们共享一套价值理念，与主流经济所追求的价值观形成鲜明的对比。它们没有强制实行恶性竞争的文化，而是建立了相互合作的多元文化与社区。它们没有将彼此孤立起来，而是促进了相互支持与团结的关系。它们放弃了中心化的管理结构，把我们推向责任共负与直接的民主决策。它们没有

---

*　（译/罗晓旭、刘亚）

强制性地推行唯一可选的全球单一文化，而是加强了地方文化与环境的多样性。与利益优先的理念相反，这些行动鼓励共同为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公正而努力。

这些被全世界的组织者和活动家们称为“团结经济”的种子已经播下了。我们的任务不是从零开始制定一种新的经济蓝图，然后说服整个世界采纳之，而是一起参与到这项不断进行的工作中，以加强、连接并且依赖业已存在的许许多多的合作与团结的经济实践。我们不必等待一场革命，或等待资本主义陷入困境。我们可以开始，就在此时，在此地，在我们的社区和区域，与全世界的人相连接，建立并且加强经济团结的制度和关系。

团结经济是一个开放的过程，是一种邀请。这个概念不是从单一的政治传统或种种思想体系演变而来的。其本质和定义是不断发展的，经过其倡导者的探讨与争论。它追寻的是“路是走出来的”的理念，而不是用力推开一个关闭的或者终极化的意识形态，它是“运动中的运动”（movement of movements），不断寻求相互联系和可能性，同时坚持履行具有共同价值观、旨在改造的责任。本着这种精神，本章并非要呈现一个有关团结经济完整或客观的观点。我以一个美国活动家和学者的身份来书写，期望在厘清团结经济的概念和实践指导方面做些贡献，这兴许会给美国这个“野兽之腹”带来变化，同时这样做也很适当。我借鉴了世界上其他地方人们的工作，也从中获得不少灵感，同时我也认识到这种责任，并为之自豪，那就是我们要形成自己的关于团结经济的思想。我希望本文对此有所帮助。

一 概念的由来

“团结经济”作为一个经济组织概念早在1937年就开始使用了。那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菲利普·阿莱兹（Felipe Alaiz）提倡在城市和郊区的工人集体间构建团结经济[①]。这个词目前的用法似乎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法国和南美洲，特别是在哥伦比亚和智利。在欧洲，团结经济（économie solidaire）这个概念的出现源于“社会经济”行动主义悠久的传统，以及通过“第三部门”替代常规的市场和国家中心体系来解决社会和经济排外主义的政策。社会经济常常试图补充或赞美现存的社会秩序，而团结经济则提倡使用更具改造力的手段解决经济行动主义的问题。在哥伦比亚，团结经济（economía solidaria）是在国家的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这个概念被认为可以把合作主义（cooperativismo）置于一个更广泛、更有政治意义的、建立不同的经济模式的视野之中[②]。在智利，经济学家路易斯·拉泽托（Luis Razeto）将团结经济这个概念拓展得更宽广，更理论化，将其视为经济横向设置的“部门”，包含的企业多种多样但享有共同的“经济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即合作与团结。拉泽托说，那些试图进行经济变革的人们，其任务应该是连接并且加强已经存在的各种经济的替代性方案[③]。

---

① Felipe Lorda Alaiz, *Por una economía solidaria entre el campo y la ciudad*, Barcelona: Oficinas de Propaganda, CNT, FAI, 1937.

② Deisy Arias et al., *Estado del arte de la economía solidaria en Bogotá*, Bogota (Colombia): Universidad Colegio Mayor de Cundinamarca, 2006.

③ Luis Razeto, *Economía de Solidaridady Mercado Democrático*, Santiago de Chile: Ediciones PET, 1984.

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团结经济（economía solidaria）一步步地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为不断壮大的社会运动，在拉美、欧洲以及加拿大都形成了共享研究议程而强大的经济行动网络。在巴西，在团结经济基础上所做的工作尤其具有影响力，包括发展大学研究项目，支持合作社和其他团结企业，以及广泛地发展地方、地区及国家网络以连接各种团结经济的行动和实践者。法国、西班牙、秘鲁、阿根廷、墨西哥和加拿大魁北克也开展了类似的尝试，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其中的许多网络开始相互连接起来。1997年，国际团结经济小组（Grupo Internacional de Economía Solidaria，简称GES）在秘鲁利马召开会议，首次把世界各地努力实践团结经济的代表召集在一起。一个真正的国际运动诞生了，这成为后来的社会团结经济洲际推广网络（Red Intercontinental de Promoción de la Economía Social Solidaria，简称RIPESS）的前身。

团结经济在地方、国家以及国际各层面持续发展。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团结经济运动在新的区域发展壮大，这主要得益于RIPESS以及世界社会论坛（the World Social Forums）的努力。2005年，第三次国际会议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举行。2007年，第一届团结经济亚洲论坛（the First Asian Forum on the Solidarity Economy）在马尼拉举行，这标志着团结经济亚洲联盟（the Asian Alliance for Solidarity Economy）的诞生。同年，美国团结经济网络（the U. S. Solidarity Economy Network）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第一届美国社会论坛（the First U. S. Social Forum）上产生。2009年RIPESS在卢森堡召开了第四次国际会议，并计划2013年在亚洲召开第五次国际会议。这些已经很清楚地显示：面临以少数精英的利益增长为中心的主流国际经济，世界各地兴起的全

球行动网络坚持认为，另一种经济——一种服务于人民和地球的经济——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诞生了。来自巴西的保罗·辛格（Paul Singer）写道："在矛盾的中心，在资本主义的裂缝中，我们正在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和经济。"①

二　作为一种过程的团结经济

运动的优势和创新之一就在于能够超越派系主义。派系之争常常削弱人们曾经设想并且构建其他经济形式所做出的努力。诚然，在面临替代性经济方案这个问题时，许多活动家都常常忍不住制定或寻找一份蓝图，制订一个大计划，用于阐释"经济"应该怎样运作。然而这些替代性经济结构的"蓝图"虽然可以作为厘清工作思路和激发工作动力的工具，但是作为核心的社会变革的策略却存在问题，原因至少有二：第一，蓝图规划常常会失去集体想象和创造过程中产生的丰富内容，没有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能够为数以百万计的人规划出一个经济结构；第二，这些规划可能导致人们就政治路径进行不明智的选择：只要蓝图在手，我们要么说服所有人我们是正确的（这不可能），要么接管政府，把我们的计划强加于每一个人（这不道德）。不论哪种方式，我们都未能成功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不同的经济和社会，我们都未能成功地坚守我们的价值。

团结经济选择了不同的途径。它从一种核心信仰出发——人们是

① 引自 Pablo Guerra, *Economia de la solidaridad: consolidacion de un concepto a veinte anos de sus primeras elaboraciones*, Revista OIKOS, Universidad Catolica Cardenal Raul Silva Henriquez, Santiago de Chile, 2004。

非常有创造性的，有能力自己找到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背景下，这些办法看上去会不同——团结经济试图展示已经存在以及刚刚萌芽的替代性经济方案，用相互支持的方式把它们连接起来。其核心思想很简单：替代性经济形式到处存在，我们的任务是通过创立统一的、强大的社会运动识别它们，连接它们，从而实现另一种经济体系。如此说来，与其说团结经济是一种经济组织模式，不如说它是一个经济组织过程；它不是一种幻想，而是一个积极的、集体想象的过程。

三 反思经济，探寻可能性

“宇宙是由故事构成的，”穆里尔·卢柯瑟（Muriel Rukeyser）写道：“而不是由原子构成的。”[①] 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在这个世界行动，都深受我们如何讲述现实世界的影响。我们的故事帮着决定我们看什么，我们不看什么，以及我们相信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经济学家和许多人讲述的有关“经济”本质的主流故事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经济以及经济变革的可能性和想象的集体意识。利用团结经济这个途径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认识到传统经济对现实的描述方式把众多实践、行动、人际关系及动力变得不可见，从而限制我们想象替代经济的能力。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努力地去使其他经济形式显现并受到重视，则打开了团结经济在其中运作的空间。

主流的经济故事一个最简单的版本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单一的经

① Muriel Rukheyser, *The Speed of Darkne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济体系（The Economy）之内，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或“市场体系”（或其他的各种名字），这个体系是由供求规律来调节的。这种经济的基石是那些理性的、利己的个人和群体，他们企图满足自己理所当然的无止境的欲望。在一个缺乏资源的世界，他们的欲望不断膨胀和积聚（追逐利润）。竞争是这个游戏的名字，经济学就是去理解竞争及其所有的内容[①]。而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更为复杂的版本，它暗示资本主义市场未能侵占的经济领域已被“国家”占领。国家表现得像是资本主义的同谋以促进经济增长，而当经济衰落或没能兑现诺言时则为其保驾护航。在关于替代性经济的公共对话中，这种张力一直持续着：国家对市场的调节应该有多多，或者有多少？我们深陷于这两极之间的光谱中，在政治—经济的钟摆上来回摇摆。

这个故事掩盖的问题比它澄清的要多。在市场／国家对经济想象的面纱背后，是大量其他类型的经济活动、行为和动机。这些经济形式多数建立在各种联系和关爱、合作以及团结的道德规范之上，而不是以协作与个人主义为基础，因此不易嵌入传统经济学所构建的框架中。团结经济不是把经济讲述成一个狭隘的、市场与国家变幻组合的故事，而是倡导我们把经济定义得更宽泛，把它作为人类社区共同满足其需求并创建生活的多样方式的总和。

为了帮助我们识别这些多样的经济活动和关系，我们最好把经济设想成由不同的“时刻”或者各种活动领域组成的、相互连接的过程，以此来检验在每一种领域中已经出现了何种合作与团结的经济组

① 我在此引述这个故事，并非企图反映在经济学领域就此已达成一致。的确，很少有经济学家会接受如此简单的描述。相反，我是想把一个在更宽广的社会里流传、被大众传媒和主流公共话语反复制造的故事，作简略的说明。

织形式。在多元化的经济中，人们在何处参与体现了团结、合作、平等、可持续性、民主和多元化等价值的活动和关系？什么样的经济关系会在我们的社区和社会中开拓一个空间以识别并强化这些价值？通过多元经济的视角来考察这些问题，让我们在经济生活的每一种范围里看到了无数的可能性。

一是创造。基本的“原材料”从何处来？这里，通过我们不妨称之为“生态创造”（ecological creation）和“文化创造”（cultural creation）的形式，我们找到一种强大的礼物经济（gift economy）。生态创造参与地球过程——出生成长、光合作用、呼吸、地质和化学变化等——它们是“生产的原点”（original points of production），维持并生产所有的生命和文化。承担起尊重并分享这些集体的“世界馈赠的礼物”的道德义务，是拥有团结经济视角的重要开端。同样，文化创造提供了诸如语言、故事、音乐、思想和技能等资源。千万年来，通过集体的创造、想象、直觉、观察和实验，对这些资源进行生产和改造，它们是我们祖先传下来的礼物，应该分享并以共同信托的方式对其进行管理。

二是生产。物品和服务是怎样生产从而促进合作和团结的呢？这里我们能确定以下这些结构，诸如工人合作社、民主的非营利机构、草根生产合作社、各种家庭生产、自主创业和自给自足（狩猎、捕鱼、园艺、清洁和“自己动手”的项目）以及家庭社区护理服务。我们也许还可以考察是否有可能对某些“传统”形式的生产组织，比如市政和国有企业以及有价值理念的“正道”（“high road”）企业进行改造，使它们变得更具坚定的民主性与合作性。

三是转移与交换。物品和服务是怎样从生产转移到消费从而体现

团结价值的呢？团结交换的形式包括社区货币、易货网络、公平贸易、“团结市场”以及滑动价格的使用。团结转移也通过单向运动出现，比如进步的／重新分配的税制和罗宾汉式的重新占用（那些因其资源过多而被调用的人将此称为“偷窃”）。礼物经济中的互利互惠是通过不期回报的给予而建立的，礼物经济也是强大的、普遍的资源转移方式。

四是消费或使用。通过什么样的合作机构将人和社区作为消费者组织起来呢？这方面的例子有消费合作社、住房合作社、集体自给自足、社区支持农业行动和实行参与式民主的地方与国家公民机构（参与式预算、社区委员会等）。如何从社会和制度两方面组织市场需求从而促进团结呢？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道德消费”（ethical consumption）的各种形式，它们推动了地方、生态和公平贸易购买实践，以及制度性的“社会责任”购买政策。

五是盈余分配。经济循环中产生的盈余，如何调拨利用从而培育团结的价值观念呢？盈余又将如何重新进入并再次激发经济循环从而支持其他团结的经济行动呢？这方面我们有团结储蓄金融机构，例如信用合作社、合作社贷款基金、标会、馈赠与分享。我们也进行堆肥和回收利用（也是投资的形式），将过剩材料回收，重新投入人们的生产系统以及更大的生命系统中。

六是管理。什么样的制度政策、条例和程序构成一个有利的环境，团结的各种力量由此得以蓬勃发展呢？这也许包含了组织和业务管理的各种要素（民主决策、民间问责、合作与平等的内部经济组织等），或者通过地方、国家或联邦政府实施的政策和程序（参与式预算、合作性结构的服务提供、金融支持、奖励机制和有利的法

律架构等）。

通过超越国家／市场两分法，显现这些团结的经济行为，这种多元的经济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战略工具，我们有必要利用这些工具来着手规划团结经济的教育和组织的途径。在世界很多地方，团结经济的组织者已开始规划项目来识别并且凸显那些在团结经济运动中潜在的或已有的积极分子。巴西政府通过与巴西团结经济论坛（the Brasilian Solidarity Economy Forum，简称 FBSES）联合，支持了一个实质性的国有规划项目，来确认以及规划全国的民主管理企业。在意大利，一个名为宙斯（Zoes）的项目开发出了软件，促进了各种社会和团结经济行动的规划，包括道德银行（ethical bank）、公平贸易购买俱乐部、住房合作社及其他。在美国，几家地方团体已开始绘制当地团结经济行动“地图”，还有美国团结经济网络（the U. S. Solidarity Economy Network）正在探寻支持和连接这些行动的方法。

四　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为我们的行动命名

连接各种行动并开展一场运动，一个重要的方法是创建共同身份，并且为这些实践命名，以作为新兴的“团结经济”的一部分。但是命名的内容是什么呢？当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团体是我们共同建设团结经济计划的一部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对世界许多的组织者而言，连接我们所有人的核心要素就是价值观。让－路易·拉威尔（Jean－Louis Laville）写道：“尽管这些实践各有不同，但是它们都具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极力把团结的理念引入经济活动中，从而倡导一

种团结经济。”[①]

尽管所有经济的关系都具有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社会性，团结的理念确定了一种特定的关系模式：它始于对相互依赖的认识。在由许多不同的力量——权力、特权、包容（inclusion）、排斥（exclusion）、合作和剥削——推动建立的关系中，我们的生活和命运是与许许多多其他人的生活和命运捆绑在一起的。当我们认识到这些联系，积极承担参与其中的责任，并致力于改造具有毁灭性或者剥削性的关系，同时建立体现关爱以及与相关的人相互尊重的关系时，团结的理念就得到了实施。

尽管许多团结经济网络在表达上用词不同，神韵各异，但共同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们都强调合作和共同关系高于不受约束的竞争。个人和集体的福利——由大众和社区而不是远方的“专家”来定义的——是优先于利润和财富积累的。经济与社会公正（或平等）——结束多种形式的社会经济压迫的斗争——被视为是优先要解决的。朝着生态健康而努力——与我们的生态系统及其他的生物建立尊重的、可持续的关系——是重中之重。社会与组织的各个阶层建立起强有力的民主，将大众和社区看作他们自身生活与发展的积极的行动者，像一根线把其他价值联系起来。最后，将这些价值清楚地表达出来，着重强调多样性和多元化，这是一种信念，不相信可能只有“一条路”；相信人们只要共同努力，就必定能杀出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自由之路。正如美国团结经济网络所描述的，这种多元主义鼓励“不同背景下的不同形式，可以是不断变化、自下而上驱动的”[②]。

---

① 引自 Pablo Guerra, *Economia de la solidaridad: consolidacion de un concepto a veinte anos de sus primeras elaboraciones*, Revista OIKOS, Universidad Catolica Cardenal Raul Silva Henriquez, Santiago de Chile, 2004。

② U. S. Solidarity Economy Network, http://www.ussen.org.

在这一点上有几个实质问题会被提出来。跟所有价值一样，团结经济的价值是需要解释的；我们如何判定某个行动是否已达到这些价值要求？不是说“魔鬼就在细节里”吗，那任何一个给定团体达到这些崇高的道德目标的情况有多好？考虑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没有一个行动或项目会完全地具有这些价值，这种情况不是也会有吗？如果是那样，又该怎么办呢？我们又怎么避免被拉拢收买呢？如果一个团体口头上答应要实现这些价值而事实上没有积极地去行动，没有始终如一地去贯彻这些价值观，又该如何处理呢？谁来决定“始终如一地贯彻”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的确，如此松散、存在如此多重大问题的框架，如何能为一个真正的政治运动打下基础呢？

这些是实质性的问题，围绕他们展开的讨论是团结经济运动的中心。要做的工作不是给这些问题找到最终的答案，而是要允许这些问题和斗争自己去激励、启迪、连接。团结经济共享价值的运作，不是按照一套固定不变的、严谨的标准，可以客观地测量和评估，或者在多种环境下都可以均等地、一致地运用，而是按照“坐标”指示共享道德的讨论和学习[①]。这些价值坐标没有规定我们行动的细节，或者强行实施一种不可能的纯洁性，而是创造了一个象征性的聚集空间：我们被邀请到一间名为“团结”的屋子，在那里，大家一起，在持续不断的试验、建设性的讨论、相互挑战共同学习的过程中，为共享的、已经接受的价值创造出了临时的、作为基础使用的定义。

---

① 用“坐标”指示集体道德的讨论和学习这个概念是由马斯莫·德·安吉里斯（Massimo De Angelis）提出的（见《对替代性、公共物品和社区的反思》，载于 *The Commoner*，2003 年第 6 期），后由 J. K. 吉布森·格雷厄姆（J. K. Gibson Graham）加以发展（见《后资本主义政治》，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6）。

这个办法不仅维持了团结经济力求体现的那种开放、自下而上的做法，在策略上也十分重要。它认识到，当很多的人、团体和运动都同意团结经济明确表达的一般价值标准的时候，很少有人能真正宣称他们成功地达到所有的标准。一场运动，既采纳如此宽泛的价值标准，又要求每个人都一直履行所有的标准，的确可能是小规模的。关键反而在于召集那些对制定这些价值标准揣有忠诚的殷切希望的人，但他们也远不是一个单纯的群体。为自我改造并且改造世界、服务于这些共享的价值观念而献身，是团结经济最根本的黏合剂。

五　建立连接

围绕共同的价值发展身份和相互认同，是建立联系、开展经济和运动的一个重要起点，但仅此而已。余下的是实质性的工作，建立牢固的关系，这些关系既是社会的，也是经济的；是建立在各个团结经济行动之间的，也是连接所有团结经济行动的；这些行动体现这些价值，而且要为这些价值的发扬光大创造条件。这并非仅仅是讨论和展望，也不是让大家对相互的活动和革新有更多的了解，虽然这些工作也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工作是要建立现实的经济体——通过团结经济行动者的关系网络发展出真实的、实质性的经济支持和交流的关系。在巴西和其他地方，这项工作被称为“经济整合”或建设“团结交流的线路”。一个“单个价值链”（value chain）在这里变成了一个多重价值链（values chain）。

为了从战略上思考这些内部联系，我们可以回到图2－1所示的经济活动的各个范围。认识这些经济的时刻，并且识别活跃在各领域团

结经济的各种实践，能帮助我们看见已有的关系并想象新的连接形式。这个圆圈不是一种特有的经济结构示意图，而是为可能的连接制订战略规划的工具。我们如何在例如工人合作社和住房合作社之间建立更有力的联系，提供有组织的“团结消费”市场？如果我们努力去建立这样的联系，我们能以培育团结交换的形式进行吗？在工人合作社、社区货币与住房合作社有组织的联盟以及理念村之间，也许已经出现了某种联系。那么，这种有组织的“多重价值链”能调动其盈余来为其他生产合作社提供资助吗？这些是团结经济激发出来的问题，也是可能出现的组织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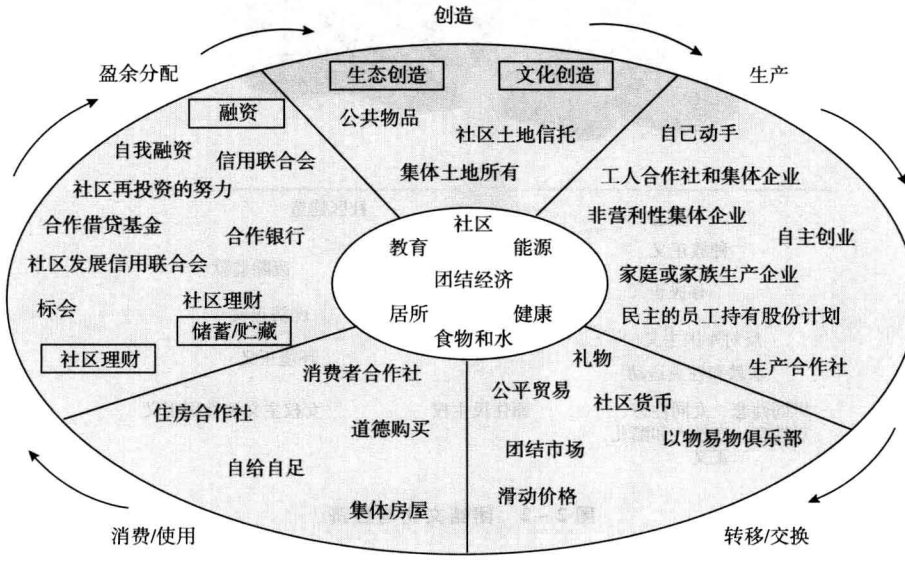


图 2－1　经济活动过程

然而，培育发展团结经济的各种力量所必需的连接不能仅仅被保留在“经济范围”内。社会运动，广义上指那些挑战经济、社会和生态不公正的结构和开发大众力量的有组织的努力，是团结的价值观在社会里的基本表达，同时也是支持团结经济行动重要的潜在基础。至

少在美国，这些联系并非总是强大的。团结经济的一个核心目标必须是进一步将各种经济替代方案整合成社会运动，把社会运动整合成经济替代方案。捍卫我们的生活与社区远离殖民化和不公正，积极反对各种形式的压迫，一起治愈痛苦与伤害，构想以及建立不同的共同生活并满足需要的方式，这些工作必须全部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改造运动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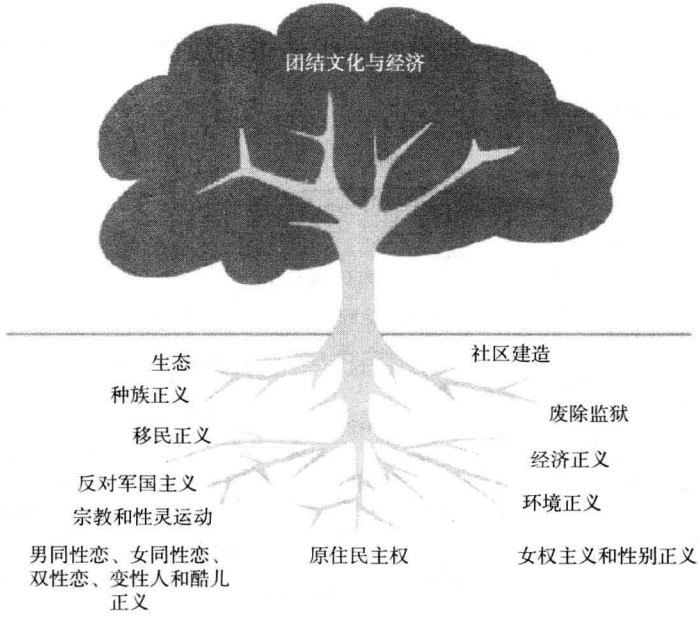


图 2－2　团结文化与经济

社会运动有潜力成为团结价值观问责制度的基础。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经常强迫我们遵守“市场价值”，或者对那些不体现我们核心价值的东西做出妥协，相互问责的社区就是很重要的资源了。我们需要由那些共享价值的人来提醒——但不是那些面临同样诱惑而向主流价值体系妥协或屈服的人——这样的斗争很重要，并且需要共同面

对。我们需要不断地参与到挑战并支持我们履行团结价值工作的各种关系中。这样，内嵌于社会运动背景里的各种经济机构也许更有可能积极坚守他们改造自我和改造集体的承诺。

反过来看，团结经济网络可以将那些体现他们价值标准的具体事例注入社会运动在经济层面的行动中。相反的工作，一旦与替代性方案的愿景和表现相连接，便能获得有力的巩固。这样，团结经济就为社会运动指出了方向，使其超越批评和挑战，承担更多的义务与责任来证明，创造真正的生活的同时构建别样的社会价值典范是可能的。

六 通过集体行动向上扩展

基于共同价值和紧密合作关系的连接能培育集体的能力。我们在一起就会更强大。团结经济组织相互之间以及与更广的社会运动之间的整合，为集体行动和制度建设提供了可能，这是任何单一的行动都无法想象的。这是“规模政治经济”的建设：团体能连接在一起，提升其参与改造活动的能力，如教育、知识和技能的共享、团结市场的开发、服务提供、融资以及政策宣传与管理的转换。

（一）教育、知识和技能的共享

团结与合作在经济学领域并非“主流”教育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不能低估为了共享知识和技能建立活动空间的重要性。关系网络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为这种合作教育培育空间：集会与会议、工作坊与课堂、技能分享的专题会议以及扩大公共媒体影响范围。此外，关系网络可以发展与学术机构合作的能力，并且在现有教育体制

下帮助开设团结经济课程与项目。这些协力完成的聚集空间有可能孕育出新的改革与“团结创业”（solidarity entrepreneurship）形式。工人合作社、社区货币、土地信托、社区支持农业计划、街坊互助网络，种种行动之间长期的“杂交”（cross - fertilization）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经济创新呢？当这些新观念、新方法出现时，我们又如何开发集体能力来支持和传播（可以这样说吗？）它们呢？

（二）团结市场

团结经济行动和社会运动之间的动态关系的发展能产生相互给力的作用方式，互相提供经济支援的坚实基础。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可以为团结经济生产者构成忠诚的“团结市场”——这是基于团结精神有组织的需求网络——他们还能激活社会组织网络，并由此加强及维持以上所描述的经济连接。从反面看，团结经济行动有潜力为社会运动提供实质的物质援助，通过为运动社区提供就业、物资或服务以及分享部分盈余以支持社会改造事业，它们本身就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

（三）融资

对于团结经济行动而言，融资是最不可忽略的后勤挑战之一。以非营利为架构的团体或许可以获得基金会资助、政府拨款和私人慈善家的赞助，但这些资金经常是要么极为有限，要么得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些团体对不稳定的外部资金来源变得依赖起来，结果它们的工作由任务驱动（mission - driven）转为投资者驱动（funder - driven）。非正式架构的团体，即那些“非传统”形式的团体（例如工人所有的合作社或集体），甚或那些执行非正统任务、使用非正统方式

的传统企业，常常发现资金来源更难保证。尤其在这些企业因其活动的性质限制了对投资者可能的回报，或者企业本身的结构不可能为其带来外部的利益驱动的投资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团结经济企业网络可以集中资源为其他项目创造合作的资金筹集渠道以供选择。例如在意大利的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 Romagna）地区，一个人口相当于俄亥俄州东北部人口的地方，号称拥有15000多个种类繁多的工人、生产者、消费者、住房以及服务合作社，每个合作社必须将其年收益的3%拨给由地区网络管理的合作社发展基金会。这些基金会为在这一地区创建新的合作企业提供基本资金[①]。在西班牙巴斯克（Basque）地区的蒙德拉贡合作社（Mondragon Cooperative）则是另一个例子。蒙德拉贡巨大的合作社网络集体拥有并支持一家名为劳动者（the Caja Laboral）的银行，不仅为其成员提供种类繁多的银行服务，而且下辖一个部门，专门为创办新的合作企业提供重要的资金及技术支持[②]。这些例子让我们粗略地了解到通过跨部门合作可能实现的各种融资的途径。

（四）提供共享服务

团结经济行动的大型网络利用集体资源为其成员服务的潜能是巨大的。在诸如保险、金融服务、法律服务、交流和设施、技术支援以及研究与发展方面，网络可以创造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外在经济”：

---

① John Logue, *Economics, Cooperation, and Employee Ownership: The Emilia Romagna model*, Ohio Employee Ownership Center, http://dept.kent.edu/oeoc/oeoclibrary/emiliaromagnalong.htm.

② William Foote Whyte and Kathleen King Whyte, *Making Mondragon: The Growth and Dynamics of the Worker Cooperative Complex*,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91.

把许多小企业的资金集中起来，可以举债经营，其效率规模近似于更大的公司。这种资源合作的例子出现在一些合作化运动领域，包括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和蒙德拉贡，已经发展了好几家“二级梯队”的服务合作社，为其成员提供保险、研发、营销以及其他产品。团结经济运动可以探索类似的行动。

（五）政策宣传和管理转换

在团结经济行动开展斗争、生存、蓬勃发展的经济政治环境的形成过程中，公共政策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与国家打交道有很多风险（例如依赖和价值妥协），一方面应当小心谨慎周密策划，但另一方面，公共政策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工具，动员支持性资源，培养一个“和谐的团结环境”（这与“和谐的商业环境”相反，后者通常是置私人利益于社区幸福之上的一种委婉说法）。这样说来，团结经济网络能够并且应该扮演影响政策的角色。这样的政策也许包含针对各种合作及集体企业结构制定或改善可能的法规，制定向团结行动倾斜的税收政策，公共资金对各种发展团结经济的实践的投资，对团结经济教育和技术援助的公共支持，或者要求任何公共服务私有化必须创建社区管理的社会合作社的政策（而不是逐利的私人企业）。

此外，这里关键的工作是，重新构想国家本身以及努力转型管理结构以便更容易执行和维持支援性政策。参与性的预算是这种尝试的绝佳例子，在那儿政府开销的优先权是由公民通过直接民主的过程决定的。自从巴西的波尔图—阿莱格里（Porto Alegre）在 1989 年实施参与性预算以来，整个拉丁美洲出现成百上千个这样的项目，而且在世

界其他地方也不断增加[①]。这些改革和其他类似的创新有潜力开拓出空间，让有组织的团结经济网络和运动对基于团结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支持，同时改变国家权力的本质。

七 团结经济运动的一些重要问题和争论

显然，团结经济是一个公开的、有争议的思想及实践的世界：在享有共同价值的空间背景下，团结经济网络内部（within）的争论和分歧是存在的，也是正常的。事实上情况可能是这样：对于（for）团结经济来说，最大的对立是如何就复杂的路线达成协议，一方面，在运动里面（inside）赋予讨论和分歧一个生气勃勃的空间；另一方面，从策略、战略以及愿景来看，有些分歧确实可能导致真正的、严重的分歧。当涉及改造主流经济关系时，包容（inclusiveness）可能是有极限的；而这些极限在哪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容易，我也不打算在这里提供什么建议。相反，我想通过提出更多的问题来结束本文。我们也许能提出一些有关团结经济网络和组织努力的关键问题，但是迄今为止，它们还不是所有的问题。

谁应该真正包含在“团结经济”中？尽管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优先考虑的，但是难道在某个地方就不需要划定界限了吗？我们怎么划定这样的界限又不至于产生分歧削弱潜在的运动呢？

团结经济的工作怎样与价值观念相似但名称却不同的运动建立关系（比如说“合作经济”或“地方性社区经济”）？我们的团结经济

---

① Josh Lerner, “Let the People Decide: Transformative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rough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In Canada”, *Shelterforc*, Issue 146, Summer 2006.

运动能否有很多名称但依然相互连接，依然强大？

团结经济运动与“市场”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怎么重新思考市场以及市场的各种动力才能培育团结的价值观？某些市场是否天生就有问题？“团结市场”怎么避免再次制造现行主流市场结构中的排他性的力量？

什么时候才有可能证明将国家卷入进来对一个设法建立真正的、民间的权力和机构的运动是有危险的？在哪些方面可以对国家进行改造，而在哪些方面国家也许会一直都具有压迫的可能性？我们如何避免不是／就是（either/or）的二元对立——也就是说，既让国家参与同时又保持自主和批判的距离呢？

八　结束语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这样说，团结经济是一种思考经济的方法，它为建立一个更公正、持久和民主的经济打开了希望与可能的空间。它是一门正在兴起的语言，用于开展一场运动来改变经济生活。它又是一种战略框架，指引我们怎样创建这种不一样的经济，增强我们的优势，并且彻底连接我们的行动。最后，团结经济是一个空间，供人想象、讨论、创造出以共享价值为基调的另一种经济的愿景。

作为一个政治经济的计划，团结经济既谦卑又雄心勃勃。说它谦卑，是因为团结经济运动并没有宣称它能解决所有问题，而是认识到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有创造性和勇气，可以一起来实践和学习。说它雄心勃勃，是因为它渴望在多个社会和经济部门之间建立起有力的连接，齐心合力开展一种可以紧密相连反对不公正同时创造现实的、鼓

舞人心的替代性方案的社会运动，从而最终改造现行的社会经济秩序。

团结经济远不是什么可以实现这种改造的锦囊妙法。它的概念和实现手段所许下的诺言，要靠我们才有可能变为现实。不像过去许多激进的社会改造理论，认为经济的变革应该构建于结构本身的逻辑中，从某种“历史必然”或“制度内部的矛盾”中展示出来，团结经济没有这样的理论或保证。团结经济若成功了，它也将是勇气、斗争和集体创造的结晶。正如约瑟·路易·科拉乔（Jose Luis Corragio）写道：“社会变革的可行性很少是一个事实，它更应该是一种必须建设的东西。”

第三章　公共资源的未来*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我已记不清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的经典文章《公地的悲剧》[①] 自己看了多少遍，这篇文章被大家作为一个不能反驳的论据加以引用，以支持土地、资源的私有产权会产生较高效率的观点，因此也成了主张私有制无可辩驳的理由。这种误读，部分原因是由于哈丁用牛作比喻：在关心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私有条件下，人们将牛养在了公共草场上。当然，如果这些牛属公共所有，那么这个比喻就是徒劳的了。因此，问题的核心显然是对牛的私人拥有权和个人利益最大化。然而这些都不是哈丁关注的基本点。哈丁关注的是人口增长，他担心个人的生育决定最终会导致对全球公共资源的破坏（这也是马尔萨斯的观点）。这种决定的私人及家庭的属性是个关键的问题。在哈丁看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专制的人口控制。

我在这里提及哈丁的逻辑是为了强调，一直以来我们思考公共资源的方式本身过于经常地局限在一套过于狭隘的假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16世纪以来出现在英国的圈地运动的影响。结果，对问题的思

---

* 本文原载 *Radical History Review*，Iss. 109（Winter 2011）。（译／刘亚）

① Garrett Hardin，"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cience* 162（1968），pp. 1243－1248.

考常常分化为两极：私有制或专制的国家干预。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整个问题由于本能的反应变得模糊起来，要么赞成圈地，要么反对圈地，这种反应通常装饰以浓重的怀旧情绪，流露出对一种存在于很久很久以前的、想当然的共同行动道德经济的怀念之情。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试图在她的《管理公共资源》（*Governing the Commons*）[①] 一书中颠覆一些这样的假设。在该书中，她将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证据加以系统化处理。她向我们展示，为了个人和集体的利益，人们可以并且也常常发明一些巧妙的、非常切合实际的办法来管理公共财产资源（common property resources）。奥斯特罗姆的个案研究“粉碎了许多政策分析家们的论断，他们认为解决共同财产资源问题的唯一办法是依靠外在权威实行完全的私有财产权利或者集中管理”。同时，如作者所言，这些个案也显示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丰富多彩的结合方式”[②]。

然而，奥斯特罗姆的大多数个案涉及的使用公共资源的人数都在100人左右。任何人数多于此的情况（她最大的个案涉及15000人）则要求一种“嵌套等级”（nested hierarchical）的决策结构，而非个人间直接的协商。显然，在此有一个尚未被分析的“等级问题”（scale problem）在起作用。在某个等级上存在的公共财产资源管理的可行办法——比如居住在一条小河流域的100个农民共同享有水权的情况——就没有也不能用来解决诸如全球变暖或者电站酸沉积的区域性扩散等问题。如果我们“跳级”（jump scales）（正如地理学家喜欢说

① 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② *Ibid.*, p. 182.

的那样），所有公共财产问题的性质以及找寻解决途径的前景都会发生巨大改变。在一个等级上看起来不错的解决办法，在另一个等级则不然。甚至更糟的是，在一个等级上（比如地方）的好办法并不必然自动向上或向下在另一个等级（比如全球范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哈丁的隐喻如此地具有迷惑性：他运用了一个小范围的例子去说明全球性的问题。碰巧，这也是为什么从以公共财产路线集体组织小规模团结经济的实践中所获取的教训，如果不借助于嵌入式等级的决策形式，就无法转化成全球性的解决之道。不幸的是，等级对于今天对抗左翼的许多派别来说是极其厌恶的。

在更宏观的体系里面，尤其是全球范围，某种圈地的行为往往是保护珍贵的公共资源的最好途径。例如，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土著居民的文化，作为全球自然文化公共资源的一部分，将在亚马逊实施非常严厉的圈地法案。这就几乎必然要求国家权威去对抗那种为了短期的金钱利益种植大豆或者放牧牛群破坏土地的低级民主。但是，在这个例子中，可能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即将土著居民从他们的林地中驱赶出来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必要方式。换句话说，保护一种公共资源可能会以牺牲另一种公共资源为代价。

公共资源的问题是矛盾的，因此也总是充满争议的。隐藏在这些争议背后的是相互冲突的各种社会利益。确实，正如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所言："政治是那种只能引起争论的公共资源活动的领域。"[①] 到最后，分析家常常只需作一个简单的决定：你站在谁的一边，你寻求保护什么以及谁的利益？如今的富人习惯将自己封锁在

① Jacques Rancière, cited in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Commonweal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50.

门禁森严的社区中，在这里，一种具有排他性的公共资源获得了界定。激进的组织也能够设法获得一些空地，有时是通过私人财产权利的运作（例如活动家为进步的目的购买社区活动中心），由此他们能够伸展出去以推动公共利益政治的发展。或者，他们可以在某个受保护的场地中建立一个社群（commune）或者代表委员会（soviet）。

并非所有的公共资源都对公众开放。有一些资源，如我们呼吸的空气是开放性的，而一些资源，如我们城市的街道，原则上是开放的，但是受管制的，有警察维护治安，甚至以商业促进区（business - improvement district）的形式由私人进行管理。另有一些资源，如50位农民控制的公用水资源，是从开始的排外性到隶属于一个特殊群体。奥斯特罗姆所举多数案例属于最后一类，并且她把调查限定在所谓的自然资源如土地、森林、水源、鱼类等。（我之所以说是“所谓的自然”，是因为所有的资源评估都具有技术、经济和文化的性质，因此对其界定也是具有社会性的。）奥斯特罗姆对其他形式的公共资源不感兴趣，如遗传物质、知识和文化资产，如今这些公共资源由于商品化以及圈地遭受了严重的冲击。比如我们来看看文化公共资源如何被遗产工业（heritage industries）商品化（而且常常被删改）。更为普遍的是，有关遗传物质和科学知识的知识产权和专利权已构成我们这个时代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当出版公司向读者收取费用，以授权阅读在它们出版的科技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时，什么应该成为公共知识并向公众无偿开放的问题显而易见。

适用于多数自然资源稀有性和特定用途的逻辑，常常不适用于文化、知识这样的公共资源，这是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联邦》（*Commonwealth*）中强调

的一个观点。我们可以在同一时间收听同一个电台广播，或观看同一个电视节目。关于文化公共资源，哈特和奈格里写道，它“是动态的，涉及劳动产品与未来生产的方式。这种公共资源不仅仅是我们共同居住的地球，还包括我们共同创造的语言、我们形成的社会实践以及界定人际关系的交往模式等等”。这种公共资源是长期建立起来的，原则上对所有人开放。这样，我们有可能甚至“把大城市看作生产公共资源产品的工厂”[①]。城市的人性特质通过我们在城市各种空间里的实践显露出来，即使这些空间通过不同形式被圈走：私人和公共/国家所有权，社会控制，侵占，以及维护亨利·列菲伏尔（Henri Lefebvre）所谓的居民“对城市的权利”的反向运动[②]。个体和社群通过日常活动和斗争，创造出城市的社会世界，在这样做的同时又创造了某种公共的物品，作为我们可以安身其中的依靠。这种具有文化创造性的公共资源不会因使用而被摧毁，却会因滥用而逐渐堕落，日趋庸俗。

在我看来，问题似乎并不在公共资源本身，而是个人化的私有产权未能按应有的方式实现我们的公共利益。例如，我们为什么在哈丁关于牛的隐喻里不把焦点放在对牛的私人所有关系上，而是将焦点放在作为公共资源的牧场上？毕竟，自由主义理论为私有产权辩解的理由是：当权力通过公平自由的市场交换制度进行社会整合时，它们应该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服务。正如霍布斯（Hobbes）所言：一个联邦（commonwealth）的制造，是通过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框架里将具有竞争性的利益私有化的方式实现的。这种观点，洛克和亚当·斯密等

①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Commonwealth*, p. 350.

② 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50.

自由主义理论家表达得很清楚，如今继续被人宣扬，但是通常贬低对强大的国家政权的需求。世界银行一边严重偏向赫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的理论，一边继续向我们保证，解决全球性贫困之道是让所有的贫民窟居民都能获得私有产权和小额贷款（尤其是那些刚好给世界大金融家们带来高回报率的小额贷款）。据说，一旦穷人内在的企业家天性通过这样的方式被解放出来，一切将会好转，长期贫困的难题也就解决了。

对于洛克而言，个人财产是一种自然的权利，个体将劳动与土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价值时，这种权利就产生了。洛克的劳动价值理论的精髓就在于此。当个体通过交换别人创造出的等量价值而拿回他或她自己所创造的价值时，市场交换就使这种权利社会化了。实际上，通过价值创造和据称是自由、公平的市场交换，个体可以继续持有、扩展和社会化他们的私有产权，这是最容易创造国家财富、最好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方式。

当然，这里假设市场是能够公平和自由的。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里，国家是假定会进行干预的，使市场保持公平和自由。至少，亚当·斯密建议政府首脑这样做。但是洛克的理论中有一个可怕的推论，那就是没有生产价值的个人不能要求拥有财产。譬如当年北美的土著居民被“有生产力的”（productive）殖民者赶出家园，其理由就是因为他们不创造价值。

那么，马克思是怎样处理这些问题的呢？在《资本论》的开头几章里，马克思接受了洛克的推论，不过他的讨论穿插了大量的讽刺，比如，在他处理鲁滨孙·克鲁索神话（Robinson Crusoe myth）在政治经济学思考中的奇怪角色时就是这样：一个人，被抛进一种自然的状

态，表现得就像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但是当马克思开始思考劳动力如何变成个人化的商品，在公平、自由的市场上买卖时，我们看到洛克的推论露出了真面目：这是在价值交换平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体系，它通过剥削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为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者生产剩余价值。

当马克思提出集体劳动的问题时，洛克的论述遭到更为激烈的动摇。在掌握生产资料的个体手工业者能在相对自由的市场里进行自由交换的世界里，洛克的推论或许还能找到某个立足点。但是马克思认为，18 世纪晚期以来工业体系的发展，使洛克的理论设想变得多此一举。在工厂，劳动是集体组织的。如果这种劳动形式派生出了任何财产权利，那么可以确信的是这种权利一定是集体的或者联合的，而不是个人的。有关生产价值劳动的定义，是洛克私有财产理论的基础，此时不再支持个人而是转向集体劳动者。于是，共产主义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①] 马克思不主张国家所有制，而是提倡某种生产公共物品的集体劳动者所有形式。

这种形式的所有权如何产生呢？这个问题通过利用洛克关于价值生产的观点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而得以解决。马克思说，假设一个资本家以 1000 美元的资本开始进行生产。第一年，通过劳动者将劳动与土地相结合，资本家获取了 200 美元的剩余价值，并且将这 200 美元用于个人消费。那么 5 年之后，这 1000 美元就应该归

①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One, New York: Vintage, 1977, pp. 169 - 171.

集体劳动者所有了，因为他们才是真正将劳动与土地相结合的人。资本家也已经消费完了他（她）所有的原始资本。就像北美的土著居民，资本家们就应该交出对资源掌控的权力，因为他们自己没有生产出任何价值。

这种逻辑听上去可能有些偏激，可它却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瑞典推出的迈德纳计划（Meidner plan）背后的理论依据。员工掌管的特别基金会对企业征收利润税，作为回报，工会方面将限制员工的工资，并且基金会将投资并且最终收购这家企业，如此将企业纳入了联合劳动者的共同管理。然而资方使出浑身解数对此进行了抵抗，导致计划无疾而终。不过，我们倒是应该重新考虑这个想法。最重要的结论是，能创造价值的集体劳动必须为集体的而非个人的财产权打下基础。价值，亦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资本主义的公共物品，它表现为货币这种衡量共同财富的普遍等价物。因此，这一公共物品并不是曾经存在却又一度失去某种东西，而是如同都市的公共物品一样不断被生产出来的。问题是，资本就好像在不断地以商品化的、货币的形式包围、侵占价值。举例来说，一个在它的街坊中努力维持文化多元反对社区中产化（gentrification）的团体会突然发现该社区楼价猛增，原来是地产代理商把社区的“特点”描述成文化多元以此吸引中产人士。结果，马克思写道，资本在竞争以追求效用（利润率）最大化（正如哈丁故事里的牛的主人）这条铁律的驱使下一路向前，产生：

技巧的进步，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美利坚合众国，越是以

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这一“悲剧”与哈丁描绘的悲剧相似，但其产生的逻辑大相径庭。公共资源的问题在这里随着一系列可能的解决方法而被重新定义。由于个人化的资本积累缺乏约束，不断威胁着要摧毁支持了所有生产形式的两个基本的公共财产资源：劳动者和土地。并且，随着资本积累出现复合率增长（满意水平通常是最少3%），久而久之这种对土地和劳动力的双重威胁在规模和程度上将逐步升级。

20世纪70年代始于智利后蔓延到英国的新自由主义对组织化劳动权利和力量的猛烈打击，如今正因为严厉的全球紧缩财政计划而加强。这项计划，从加利福尼亚到希腊，势必导致大量人口在资产值、权利和政府津贴等方面的损失，同时把那些迄今为止已边缘化的人群弱肉强食般地吸收进资本主义的动力系统中。这群高达20亿的人口靠每天不足2美元生活，现在正遭遇小额信贷这种“所有次级贷款形式中的次级”（subprime of all the subprime forms of lending）的欺骗，目的是为了榨取他们的财富——正如美国住房市场上发生的那样，先是通过次级的、掠夺性的贷款，紧接着是丧失抵押品赎回权——从而为富人们的麦克豪宅再镀一层金。在环境公共资源方面，威胁也是丝毫不减，而诸如碳交易、新的环境技术等办法只不过是让我们同样采用资本积累和投机性的市场交换以走出绝境，而当初正是这些手段首先使我们陷入困境。不幸的是，这是老生常谈了：1945年以来，每个重大的解决全球贫困问题的决议都一直坚持只使用这两种手段——资本积累和市场交换——而这两种手段制造了相对有时甚至是绝对的贫

困。这就难怪为什么我们身边依旧有穷人，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人数是越来越多而不是逐渐减少。

有一些管理机构曾经试图抑制对掠夺性积累的嗜好（虽然做得不够），但今天却逐渐遭到废除。这为那种“身后之事与我无关”的肆无忌惮的资本积累和金融投机的逻辑打开了大门，这种逻辑如今已演变成了一场真正的洪涝。若想控制其造成的损害，只能将盈余的生产和分配社会化，并且建立一种崭新的、面向所有人的财富共有权。

这里，要紧的不是制度安排上某种特定的组合——这里圈地，那里则在扩大集体和共同财产范围，要紧的是，这种组合要设法改善共同劳动和共同土地资源（包括嵌入在人造环境的“第二自然”里的资源）在资本手里急剧恶化的状况。通过这种努力，奥斯特罗姆所确定的“丰富多彩的结合方式”——不仅有公共的和私人的，还有集体的和联合的，嵌入式等级的和横向的，排他性的和开放性的——都将发挥作用，探索组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满足人类需求的方式。重点不在于满足一个阶级（它占用了另一个阶级所生产的公共财富）为积累而积累的要求，重点在于我们要改变这一切，要寻求富有创造性的途径来发挥集体劳动的力量，最后实现公共利益。

第二部分

当代中国的合作经济实践

第四章　周家庄：人民公社遗产的新启示*

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李长江　卢晖临　潘　毅

一　改革与中国农村

中国的改革是对过去30年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实践的一种扬弃和延伸。1978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为主要标志，期间伴随着对自由市场的否定和对公有制之外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强烈批判和排斥，建立了政府主导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模式。

改革以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意味着生产方式和资源分配方式的改变，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主导下的生产方式为市场主导的私有经济所取代。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否定转变为大力赞扬外资、民营在内的私

* 本文是“打造新的跨境联结：香港和珠三角的社会/社区经济，公共政策研究，2010—2012”（Forging new trans - border links: social/community economies in Hong Kong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Strategic Public Policy Research, 2010 - 2012）研究课题的部分成果。感谢张翩翾、王维和敦猛等人参与田野研究，也感谢严海蓉和老田对周家庄的介绍。

有经济的优越性，时至今日，就规模而言，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①]。

在农村，这一改革历程最鲜明地体现在人民公社的普遍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以家庭经营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农村重新取得了统治地位。从1978年末小岗村宣布“包产到户”“打响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枪”[②]到1985年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镇政府的工作全部结束[③]，仅仅6年多的时间，在中国维系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便宣告解体，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过去多年，人们给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高度评价，认为这一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从1981年到1985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连年创下新高，农业生产获得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④]。尽管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比如国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征购价格[⑤]，放开自由市场，开始允许农民自由流动等，但从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才是促成这一时期农业实现快速发展的根本（林毅夫，1994）。

---

①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7年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为68%，吸纳就业人口占城镇全部就业人口的75.7%，参见http://money.163.com/08/1029/20/4PESDUN0002524SD.html。

② 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与失败》，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

③ 新华社1985年6月4日报道，全国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全部结束，全国共建9.2万个乡（含民族乡）、镇人民政府。至此，建立村民委员会82万多个。

④ 1965~1978年，农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7%；1978~2008年则提高到7.1%。参见张晓山、李周主编《新中国农村60年的发展与变迁》，人民出版社，2009，第140页。

⑤ 林毅夫的研究表明，国家粮食征购价格会对粮食产量造成影响，较高的收购价格将刺激农民的生产意愿，参见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126~143页。

二 小农经济的弊端

农村在经历几年短暂的繁荣之后，很快又陷入停滞。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小农经济不仅不能提高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计，而且制造了“三农”问题。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既无法实现规模经营，也无力通过积累实现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这既使得农民增收困难，同时也使得农村变成了纯农业社区，农业之外的多种经营无从谈起。由于人多地少，农业人口无法完全被小农经济吸纳，于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便出现了。

农民工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农村和农业生产已经无法容纳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发展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供给。“打工潮”从 80 年代中期以来逐渐形成，并愈演愈烈，造就了中国特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路径，促成了存在严重隐患的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

由于出口导向型的工业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需求以及国内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一旦国际市场供求出现大的波动，就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劳工工资长期偏低，造成内需不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堪忧。而在农村，由于农业产出低，大量劳动力尤其是年轻的精壮劳动力流向城市，导致农业和农村发展乏力[①]，更带来“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

① 2008 年，农村非农就业人数为 1.53 亿人，占当年农村劳动力的 32.5%；该年度，农民从非农产业中得到的收入占其平均收入的 45.9%（张晓山、李周，2009）。

在农业生产领域，规模化经营被政府视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出路，各地涌现出的“公司＋农户”以及扶持种田大户的做法，无不着眼于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以期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王永作，2010）。但是这样的规模化经营操控在公司和少数大户手中，广大农民的生计依然难以改善，甚至沦为农业雇佣工人。

由此可见，一方面是“公司＋农户”规模化的农业生产不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另一方面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营已经被证明无法为农民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和发展空间。在这种两难的处境下，重提农村的集体合作经济组织就并非只是基于历史的反思而是着眼于当下的实践和未来的走向了。

三　人民公社效率低?

人民公社作为合作社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对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大量的研究都是对于人民公社持否定的态度，我们有必要正本清源，把问题研究清楚。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这些研究对人民公社多持批评态度，认为公社是一种效率低下的制度安排。

其二，这些研究多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小农经济为参照系，通过前后对比来说明小农经济才是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也更具有发展活力。

其三，这些研究多将人民公社的失败归结为高昂的组织成本，比

如工分制造成的平均主义，所有权残缺造成的对社员和公社管理人员的激励不足，农业生产的复杂性造成监督成本过高等。

（一）监督、激励与合作社效率

对人民公社这种合作社形式效率低下的批判，通常与监督困难、激励不足联系起来。一般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既有农业生产不易监督、产权残缺导致的激励不足，也有工分制导致的平均主义。

1. 农业生产监督的困难

农业生产的复杂性造成的监督困难，被认为是造成合作社生产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这一高成本监督所造成的影响在林毅夫那里被正式模型化。林毅夫（1994）认为，合作社效率低下的原因在于对社员的激励不足，而激励之所以低下的原因则在于对社员努力程度的监督非常困难，后者则取决于生产的时间期限长度和空间散布。因此，农业生产的时间期限越长，空间上越是分散，监督的困难程度就越大，监督成本也就越高，这种情况下监督的效果会大大降低，因而无法形成对社员的充分激励，造成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低下。

与监督有效性相关的另外一个因素是退出权自由，林毅夫提出，由于农业生产的监督非常困难，集体生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社员的自律即自我监督和激励。而只有当积极劳动的社员在其他社员不履行自律协议时有退出的自由，自律才能真正发挥自我监督和监督的作用（林毅夫，2000）。在人民公社制度下，社员的自由退社权被剥夺，农民的“多次博弈”变成“一次博弈”，公社陷入低努力均衡陷

阱当中（林毅夫，1994）。如果说农业生产技术上的特殊性造成了外部监督困难，那么自由退出权被剥夺则意味着社员自我的内在监督即自律也将趋于失效。外在和内在监督同时失效意味着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和效果将无法得到合理的评价和计量，偷懒、搭便车的现象也就无法避免，合作社这一制度安排效率低下也就不难理解了。

2. 产权残缺与合作社激励

周其仁对剩余索取权的分析则将目光指向了对合作社代理人的激励不足。监督必然需要一定的人来完成，因此对于合作社来说，其管理者便是组织的代理人，履行监督职责。在此基础上周其仁指出，“集体生产监管的有效形式是由监管者享有剩余权来保证的”①，因此合作社集体生产的监管之所以困难，“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信息收集和处理的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产权残缺导致对监管者的激励不足”②。

所谓产权残缺，这里并不是指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者共有的产权形式，亦不是国家所有权，而是“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农村社会主义制度安排”③。从这一论断中可以作如下推论：国家控制并不是基于产权的国家所有，而是基于超经济的政治权力，后者保证了合作社虽然是社员共同所有，但国家却能够通过强制征购的方式来获得生产的剩余。这样一来，由于剩余索取权既不归社员所有，也不归合作社的代理人所有，前者既无劳动的积极性，后者也缺乏进行监督的动力。

---

① 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1页。
② 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1～12页。
③ 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6页。

虽然作为代理人的合作社管理者得不到剩余索取权，但拥有剩余控制权，这种控制权最终可能演变为损公肥私的腐败现象，“基层监管权很容易畸变为监管特权，它使监管者得到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实物的和货币的额外好处。这种以腐败形式出现的剩余分享权，来源于对农户、集体福利和国家既得利益的侵占”[①]。周其仁接着认为，正是这种畸形的监管特权弥补了剩余索取权缺失所造成的对公社管理者的激励不足，维系了公社体制的存在。

沿着类似的思路，姜军松（2009）等人认为政府权力剥夺了劳动产权主体的自由平等权和剩余索取权，劳动力产权残缺是导致社员激励不足、公社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因此只有充分实现劳动力产权主体的分散决策优势，允许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社会总体的生产效率才能够实现。

3. 工分制与平均主义

工分制是人民公社时期主要的计酬方式，这一制度被认为是造成合作社平均主义的重要原因。辛逸将工分制定义为“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计量社员参加集体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并获取相应劳动报酬的一种形式，有的论著亦将其称为劳动日制”[②]。作为集体劳动的管理和分配制度，工分制几乎与合作社同时产生。刘庆乐（2010）和辛逸（2005）的研究都区分了工分制的几种类型：

（1）底分，是评定社员劳动能力的主要指标，也是社员劳动获得工分的基本依据。底分通常根据社员的年龄、性别、技能等评定，比如一个男性劳力参加劳动一天可得工分 10 分，而一个成年女劳力一天

① 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 19 页。

② 辛逸：《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第 127 页。

的工分则可能为 8 分。通常情况下 10 个工分记为一个工，即一个劳动日。

（2）死分死记，即根据劳动力的底分和出勤情况记录工分，一个劳动只要达到相应的出勤时间，就可以获得与自己等级相符的工分。很显然，这种记分方法虽然简单易行，但工分的分值却无法反映真实的劳动投入数量和质量。

（3）死分活评，将底分与社员的劳动质量相结合，每天的白天进行劳动，晚上则对每个社员当天的劳动成果进行评价，确定其应得的工分。这种做法虽然是对死分死记的一种改进，但评分的过程非常复杂，且难以避免地会掺杂主观因素，成本很高。

（4）大寨式工分。这种评分办法首先树立标兵，然后社员根据自己一定时期内的出勤情况、完成任务量以及思想政治修养水平，以标兵作为参照，自报这一时期的工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寨式工分作为对定额记工的一种否定，强调思想修养和政治表现，反对物质刺激。

（5）定额记分，即劳动定额制度，这种情况下不再记录出勤情况，而是将各种农活儿分门别类标明分值，然后根据社员完成定额的数量和质量来评定应得工分。和以上几种工分制度相比，定额记分应该说是一种更加倾向于计件工资的工分制度，而其他几种则更多地倾向于计时工资制。

以上四种工分制度中，虽然定额记分制度是比较合理的一种，能够有效地评价不同社员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并以此作为计酬标准。但实际上在人民公社历史上，更加流行的则是死分死记和大寨式工分（辛逸，2005；刘庆乐，2010）。这里面既有技术上的原因，也

有来自政治方面的影响。定额记分制度的关键在于制定合理的劳动定额，由于农业生产过程非常复杂，不同的作物品种、耕作技术、土地条件和生产环节都意味着各不相同的劳动强度，这就使得定额的确定非常复杂，要做到不同的劳动定额能够真实反映其所需劳动投入的时间和强度非常困难，在技术落后、自然条件复杂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这也就是林毅夫所说的劳动监督的困难，在这种约束之下，生产队更倾向于选择简单易行的死分死记，只要出工达到一定时间就能够获得相应的工分。而大寨式工分则因为适应当时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趋势，因而得到普遍的推广（刘庆乐，2010）。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工分制造成了普遍的平均主义和磨洋工的现象，干多干少都得到差不多的工分，勤劳者不能得到奖励，懒惰者也不能得到惩罚，这样的制度安排自然谈不上激励作用了。正如林毅夫所指出的："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极其困难，一个农民不管他劳动的实际数量和质量，每天都获得同样的固定工分。平均的收入分配就是这样一种计酬方案的结果，由此导致对劳动的激励低下，生产率也处于停滞状态。"①

除了不合理的工分计算方式造成的平均主义，窝工也是造成工分分值连年徘徊不前甚至出现下滑的重要原因（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1995）。所谓窝工，曹锦清等人的研究将其定义为"一个生产队全年实际用工总数减去全年有效用工总数"②，针对陈家村的研究表

① 林毅夫：《技术、制度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45页。

② 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第172页。

明，该生产队的窝工数占用工总数的一半左右，这也就意味着社员有一半左右的工分是无效的劳动投入。造成如此严重的窝工的原因，是耕地面积不足的条件下劳动力和劳动投入的不断增加。因此，人民公社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人民公社存在剩余劳动力，事实上，是由于中国地少人多、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的结果。为了防止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国家制定户籍制度控制人口的流动。因此，农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扮演了劳动力蓄水池的功能，比如20世纪50年代末限制城市发展、城市人口大量返乡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都是将大量的城市人口排挤到农村。在这种条件下，如果农村集体经济不能发挥自己的规模优势来通过再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消化多余人口，则必然会造成劳动力的冗余。

（二）外部因素的影响

否定人民公社的众多研究，除了重视监督困难、产权残缺与不合理的工分制等内部原因外，还提出了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比如国家过高的粮食征购，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造成对农民的隐形剥夺，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人口的流出和选择自由，等等。

张乐天（2005）认为人民公社制度具有总体性特征。作为农村的基本单位，人民公社党政不分、政社合一，兼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同时公社也作为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整个社会主义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一元化的公有制、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优先重工业化的国家战略需要。这种外部环境决

定了公社体制的僵化，农民自发的诸如“包干”、“分田到户”[①] 之类的尝试都被“纠正”并严厉禁止。张江华（2007）对社内出现大量无效劳动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也由当时特定的外部环境所决定，比如对劳动力的平调、干部的瞎指挥等，这些负面因素并非公社体制自身所能避免的。

国家重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也加剧了对农村的剥夺。国家通过高征购、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进行工业化所需要的原始积累。林毅夫（2000）的研究指出，无论是计划内的收购价格还是超购部分的溢价收购，国家给出的价格都低于真实的市场价格，从而降低了农民的收益。郑有贵（2007）的研究指出，1959～1978 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从农业部门拿走的净积累高达 4075 亿元；程漱兰的研究则表明 1952～1978 年，农业净流出资金 3120 亿元，相当于同期国有企业非固定资产总值的 73.2%。虽然不同学者的估算有所出入，但都指出国家通过人民公社体制对农村进行过度抽取。

陆云航（2005）对统购统销政策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陆云航通过对浙江象山县一个生产大队遗留资料的分析指出，在统购统销制度下，由于口粮之外的粮食剩余几乎全部被政府部门以低价收购，政府得以独享对剩余的控制权和接近全部的剩余索取权，而农民则被排除在剩余分配的谈判之外。这样一来，合作社内部实际上无法建立按劳取酬的分配机制，因为农民能够自主掌握的粮食

① “包干到户”的做法并非改革开放之后的农民首创，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合作社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农民自发的“包干到户”的做法，引起了风波很大的“退色号风潮”，但这种做法很快就被中央严厉禁止。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仅够勉强糊口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严格按照按劳取酬实行多劳多得，合作社的集体经济也是无力为之。

四　周家庄合作社的实证研究

周家庄隶属于河北省晋州市，地处冀中大平原，距离省会石家庄只有50公里路程。从1952年建立第一个村极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转为联村大社，直到今日，周家庄对外的名称因时变化，如从过去的人民公社改称乡政府，但它的合作社体制一直没有变化，迄今已历经60年，是极少数没有中断的维持集体经济实践的村庄。生活在周家庄的许多社员今天仍依赖集体计划经济生活，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分配是周家庄的主要劳动形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察和研究的机会。在人民公社普遍遭受批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家庭生产早已取得主导地位的今天，周家庄合作社存续至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或许同样重要的是，与南街村、华西村等闻名全国的“红色亿元村”不同，周家庄合作社的留存和持续发展并没有得到外部尤其是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因而对于反思集体化农业的优劣、在新时期探索社会经济的可能路径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2009年的春夏之交，我们第一次来到河北省石家庄晋县周家庄合作社，该社总面积15.73平方千米，土地面积21046亩。2009年拥有人口4495户，13029人。合作社实行两级管理，下辖10个生产队，合6个自然村，俨然一个人民公社。短暂停留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除了惊讶于周家庄的发展水平，就是村庄内部的建筑物井井有条，家家

户户分有一套不算豪华但是整洁的别墅。对于带着对人民公社许多负面看法的我们，周家庄作为一个特例，它的存在，挑战了我们的“常识”，也让我们意识到“常识”很大可能是改革意识形态的主流建构。2010 年 3 月，我们再次来到周家庄合作社，在这里小住 5 天，集中走访了 2 个生产队，浏览了丰富的档案。

“我们周家庄，没有一个到外面打工，也没有一个外嫁女。我们有开小店的，也有开小工厂的，但也是在村庄周围，没有去远的。”一个个村民都如是说。当我们多次问：“你们为啥不分田呢？分了不是更有干劲吗？”最典型的回答是：“我们不分田，省心呀！”2010 年，村里的农村劳动力，一般年龄比较大，年分红收入达到 25000 元到 28000 元，占村里总劳动力比例的 25%。其他的年轻人，在集体工厂里工作，年分红收入是 30000 元到 35000 元。刚生完孩子的妇女，待在家里，说：“不操心！待孩子长大一点，就可以回到工厂里上班。”周家庄没有退休的概念，80 岁的老人家，当看门，年收入也拿 1 万多元。乍看，周家庄的生活无忧，“省心”两字是我们在村中听到最多的词汇；间或，也会听到抱怨，有一位村民，由于不满生产队队长分工不均，2010 年初，自由退社，自己搞了一个小卖店。他说：“我生意好的时间，就留在外面（合作社外），生意不好，再回去，我们这里一年考虑一趟。”

对于一个多年研究农民工的团队来说，这个安居乐业的村庄似乎展示了一条能够解决“三农”问题、消除劳动力剩余、免于“离土又离乡”的打工命运的道路，它算不上富裕，却为当下的“中国现实”提供了另类的可能性。为了深入研究，我们留下了研究助理，从 2010 年开始，她们对村庄里的人进行了多次深谈，也做了录像记录。如果

说合作社的农业生产和集体企业体现了优势的话，那么，周家庄是如何达到有效的劳动管理和合理的分配制度，以及能够做到有效降低监督和管理成本的呢？也正是基于这两个方面，我们探索了周家庄的实践，特别是合作经济为什么会表现出较之小农经济的优越性以及更高的效率水平。

五　周家庄合作社简介[①]

早在1951年11月，周家庄村就由3个农业互助组合并建立了该县第一个合作社——曹同义农业生产合作社，由20户农民组成，拥有耕地194.6亩。到1952年7月，周家庄村已经建立合作社2个，长期互助组49个，临时互助组37个，全村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户达到369户，占总户数的77.7%。此后，农民的互助合作不断发展，互助组逐渐转为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2月13日，以曹同义社为核心，周家庄村的10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与13个互助组进一步联合起来，正式成立周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成员425户，占全村总户数的87.8%。河北省和石家庄市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并宣布在该社建立继饶阳五公之后的第二个拖拉机站。

1955年，中国的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该年11月，晋县县委决定将周家庄农业社作为全县重点，扩大规模，建成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社。1956年2月，周家庄乡的6个自然村的合作社合并，成

① 引自刘增玉、杜荣水、王盛秋、穆兴增主编的《周家庄之路》以及河北省晋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所编的《晋县志》。

立了有1509户农民的周家庄高级农业生产联村大社，合作社的规模自此确定下去并延续至今。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周家庄联村社又转为周家庄人民公社。改革开放之后，周家庄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分开，成立周家庄农工商合作社。

目前，合作社仍然坚持走集体经济道路。就农业生产而言，小麦、玉米等大田作物种植仍然以生产队作为基本的核算单位；2000年以后陆续建立的果园承包给个人经营，但销售和生产所得仍由生产队负责，坚持按劳分配；包括阀门厂、印刷厂等在内的集体企业则实行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按劳分配，企业所得由合作社在生产队之间统一分配，为农业生产提供强有力的补贴。

因此，我们将分3个部分对周家庄合作社作解剖和分析。一般对合作社的研究，都突出村庄“能人”的重要角色，本研究并不否定“能人”所发挥的功能，然而，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合作社内部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特别是合作社如何制定劳动定额管理制度，如何解决集体经济“养懒人”的问题，合作社社员之间的分配问题又是如何处理的，最后我们将对合作社所表现出的规模优势进行分析。

六 劳动定额管理制度

对于集体经济条件下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评价集中在对其效率低下的批判上，认为农业合作生产特点和监督困难造成了分配中严重的平均主义，进而影响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与生产效率。

如果说这一批评不无合理之处的话，那么周家庄合作社这一留存

的意外则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如果合作社的集体生产必然是效率低下，何以周家庄合作社能够在“单干”成风的条件下保存下来并得到持续发展，而其社员又如何愿意坚持这种生产方式而不是群起反对并放弃之？

可能的解释只有一个：周家庄合作社成功地避免了集体生产方式的激励不足和低效率，使其产出维持在较高水平，并实现了相对公平的按劳分配。本文接下来将对合作社的劳动管理与分配制度进行介绍，指出周家庄的合作社经济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关键所在。

有效的劳动管理与分配制度的核心在于三个方面：首先，不同社员的不同劳动内容能够得到真实合理的评价和记录，并以此作为计酬的标准，避免出现“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情况，同时社员的分配要能够体现不同劳动投入之间的差异，形成对社员的正向激励；其次，要能够减少监督和计量成本，降低合作社组织费用，监督和计量费用过高不仅会提高组织化生产的成本，而且很可能导致无效监督的发生，进而影响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导致合作社效率低下；最后，合理的劳动管理与分配制度还必须在坚持按劳分配的同时实现公共积累，为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发挥合作社规模优势奠定基础。

周家庄合作社采用劳动定额管理、合作社统一核算与按劳分配三位一体的劳动管理与分配制度，不仅有效地降低了监督和计量成本，而且也能够使社员不同的劳动投入得到真实合理的评价，并以此作为分配的标准，最大限度避免了组织化过程中搭便车和平均主义的出现。

1961 年中央调整人民公社制度，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体制，并且规定人民公社也可以实行“两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取消中间的生产大队环节，只保留公社和生产队。由于周家庄人民公社规模相对较小，没有生产大队建制，实行公社（合作社）与生产队的两级所有制。1980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周家庄合作社在拒绝“分田单干”的同时并没有固守旧有的经营模式和管理制度，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在坚持劳动定额管理、合作社统一核算与按劳分配三位一体的劳动管理与分配制度的同时进行适度调整，以使其更具效率。

不仅如此，本文的研究还发现，如果说合理的劳动管理与分配制度避免了合作社走向解体的话，那么合作社所表现出来的规模优势则使集体经济得到不断的壮大，从而使全体社员的福利水平不断提高，这一点同样重要。

（一）定额管理与工分制

工分制被许多研究者批评为是人民公社平均主义、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但在周家庄合作社的劳动定额制度下的工分制不仅没有取消，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成为合作社劳动管理和分配制度的基本依据。

1. 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定额

定额管理的核心是劳动定额，又称“工作定额”。劳动定额的内涵，“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一个中等劳动力用通常的劳动强度工作，

在单位时间内所应完成的一定质量的某项作业数量”[①]。因此，劳动定额实际上是一套评定某项生产活动所需标准劳动数量和质量的衡量标准，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合理公平地评价社员从事某项生产活动的劳动投入，以此作为评定工分和按劳分配的依据。

下面以周家庄合作社2004年的《劳动定额项目和计酬标准》为例说明定额管理和工分制的运行逻辑，详见表4-1和表4-2。

表4-1 劳动定额项目和劳动计酬标准

级 别	项目数	计酬标准（劳动日）	包括主要农活
1级	4	1.40	棉花播种
2级	8	1.30	棉花使种、割小麦、钩棉秸、拉谷个等
3级	9	1.25	机播小麦、玉米、大豆等
4级	19	1.20	打麦场、割谷子、打谷场、机械收获等
5级	51	1.10	畜耕地、机耕地、锄棉花、培土、机械破碎等
6级	4	1.05	机送粪、大车送粪等
7级	126	1.00	浸种、扬粪、浇地、粮食分配等
8级	34	0.95	平整土地、点种、喷雾器打药等
9级	70	0.90	平地头、平畦、追化肥、拉沦口节、拔苗等
10级	4	0.85	推畦、划印、砘地等
11级	35	0.80	棉花整枝、锄划小麦、坑追化肥、谷子撒毒土等
12级	6	0.75	搂小麦，辣椒、棉花打顶尖等
13级	2	0.70	拾山药、青棉桃
合 计	372		

① 刘增玉、王盛秋：《周家庄之路》，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

表 4－2　劳动工序计酬标准

工活名称	耕作条件				规格质量	定额		计酬		单位折算	
	远近	劳力	牲口	工具		单位	数量	级别	劳动日	数量	劳动日
机耕地		1		55、60 型拖拉机；4 华犁	耕深 7 寸，耕细匀平，不留界子，随机 1 人，按 27.5 亩，0.825 劳动日	亩	27.5	5	1.1	1 亩	0.04
机耕地		1		18－20 型拖拉机；2 华犁	耕深 5 寸，不留界子，耕细匀平	亩	22	5	1.1	1 亩	0.05
机割小麦		2		北京 3 型收割机	留茬 7 寸以下，不丢麦粒，看仓 2 人，30 亩 1.50 劳动日，接、拉、装、卸、分 5000 千克 5.80 劳动日；散装拉卸入库 5000 千克 1.00 劳动日，按干数计酬	亩	30	4	2.4	1	0.08
机播小麦		1		18－20 拖拉机 12 行播种机	保全苗，补苗自负，随机代擦，籽种自取，随机 2 人，40 亩 1.60 个劳动日，小毁茬机播、大豆、谷子同额	亩	40	3	1.25	1 亩	0.031
摘天鹰椒		1			红椒分清等级，摘净，按干数	斤	20	11	0.8	1 斤	0.04
送萝卜		1			交售日本大根萝卜，司机在内包括拉、装、卸车，15 千米以上包括 15 千米，15 千米以下折算	斤	4444	7	1	1000 斤	0.225
晒粮食					按干数计酬，房上晒，过风	斤	1000	9	0.9	100 斤	0.09

该定额管理制度将劳动定额项目划分为13个等级，共计372项，不同等级对应不同的劳动日计酬标准。表4-1是不同级别劳动定额项目的计酬标准，表4-2列举了一些具体的劳动工序的计酬标准，下面对表格进行具体说明：

（1）劳动定额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计件工资制。以表4-2中的“机耕地”为例，在使用55、60型拖拉机4华犁等生产工具的条件下，1个劳动力（拖拉机手）完成翻耕27.5亩地的劳动量，计为1.1个劳动日。每个劳动日折算10个工分，因此该社员完成上述劳动的分值为11个工分。

（2）劳动定额制度同时也具有计时工资制的特点。上述劳动定额的确定是以1个中等劳动力1天能够完成的劳动量作为基本依据的，因此每项定额下的劳动量并非没有时间限制，而是通常要在1天内完成。

（3）同样的劳动时间投入并不意味着可以获得同样的分值，因为不同定额项目所需要的劳动强度、技术水平是各不相同的，比如机耕地属于5级劳动，1天完成上述工作量计1.1个劳动日，11个工分；而机播小麦的技术要求较高，属于3级劳动，一天完成上述工作量计1.25个劳动日，12.5个工分；摘天鹰椒劳动强度比较小，技术含量也较低，属于11级劳动，一天完成上述工作量仅计0.8个劳动日，8个工分。这种时间上的规定并不是硬性的，比如在麦收季节，由于要“抢收抢种”，正常情况下晚上7点钟收工的联合收割机要一直忙碌到夜间十一二点，这个时候计酬的标准就是完成的实际工作量。

（4）上述情况在周家庄合作社属于“定额工”，实际上更倾向于计件工资的性质；此外还有一些属于零工或散工，比如跟随收割机捡

麦穗的劳动力就属于散工，比如“机播小麦”一项规定劳动力为1人，但在“规格质量”一栏中又有“随机2人，25亩1.90劳动日”的规定，其中的“随机2人”就属于散工。散工或零工通常从事一些辅助性工作，完成数量通常要根据主要生产进度而定，比如拾麦穗，其实就是将大型收割机不能割到的地方用镰刀将其收割干净，比较轻松，劳动时间和劳动量的大小则要视收割进度而定。这类劳动难以按照完成数量实行计件工资制，因此直接根据劳动时间来确定工分，属于计时工资制。

（5）劳动定额的制定综合考虑了多种因素，包括使用的工具、土地的远近、劳动强度、技术含量等；同时不仅有量的要求，也有明确的质的要求。比如机耕地，使用55、60型4华犁机械和使用18－20型2华犁拖拉机不仅耕作量的要求不同，而且对质量的要求也明显不同，从而有利于区别不同劳动的价值，避免出现“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情况，使得工分能够比较好地反映真实的劳动投入。

（6）大多数劳动定额项目的劳力都是1个，意指该项劳动能够个体完成；但也有些劳动是需要几个人共同协作完成的，比如机割小麦，需要2个人共同完成，其中1人驾驶收割机进行收割，另外1人驾驶四轮拖拉机将收割好的小麦从收割机中倒出送到麦场上摊晒，这种情况下则劳动日值为级别下劳动日数乘以人数，比如机割小麦需要2个劳动日则每天收割30亩小麦，4级劳动，共计劳动日数为1.2×2即2.4个劳动日，即24个工分。这实际上是一种劳动组合形式，目的旨在简化计量和监督成本。

（7）上述劳动定额是根据中等劳动力在一般劳动强度下的生产进

度制定的每天需要完成的劳动量，但不同劳动力的快慢其实不同，有的速度快，完成规定的劳动量可能不需要1天的时间，比如摘天鹰椒，有的劳动力可能半天时间就能够完成11斤的摘收任务，如果每天的任务量是固定死的，那么该劳动力就会有半天的空闲时间得不到利用，积极性会受到挫伤。因此合作社规定可以超额生产，并按照超产的实际数折算计酬。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劳动项目都可以超额完成，因为要考虑到相互之间的配合。

劳动定额项目和计酬标准的制定建立在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并且通过民主评议的方式制定。周家庄合作社仅上述农业生产的劳动定额就多达372项，将复杂的农业生产过程进行如此细致的分工，没有长期的农业生产经验是不可能做到的；同样，如果没有各生产队民主参与，标准的制定同样难以做到客观公正并为社员所普遍接受。由于生产技术条件、作物种类等不断变化，定额标准也需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实际上，周家庄合作社的劳动定额基本上每两年都要调整一次。

以上主要是针对大田耕作的劳动定额，目前周家庄合作社的大田作物主要是冬小麦和夏玉米两大类，便于进行机械化的耕作，而果园实行的则是另外一套定额管理制度。

2. 生产队果园的劳动定额管理

近些年来，在大田作物种植之外，合作社还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农业，比如果园，目前各生产队已经建立了包括葡萄园、梨园在内的数千亩水果种植基地。

与小麦、玉米等大田作物不同，除了八队由于规模和劳动力太少与大田种植实行统一核算之外，其他生产队对果园实行专业承包，与

大田生产分开实行单独核算，其要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将一定面积的果园根据其实际生产难易程度把从修剪到收获的整个过程折算成一定工数[①]，然后承包给专业组，专业组负责整个生产过程并获得约定的工数。

（2）由于是将整个劳动过程折算成一定工数进行承包，因此生产队不再规定果树生产各个环节的劳动定额和分值，而只是针对承包组的几个社员，实际上类似于“包工制”。

（3）果园与大田生产分开，实行单独核算，因此果园承包组分值的高低取决于水果产量的高低，如果收获状况好，那么果园的分红就比较高，反之则比较低。因此实行单独核算有利于提高对承包人的激励作用。

（4）承包面积和人数由生产队确定，承包人不能自行确定。这就避免了果园为少数承包大户所垄断，出现分配不公，引发社员的不满和紧张关系。

访问员：果园是小组承包的？

社员：都是队上派的，3 个人包了。

……

访问员：果园挣得多大家会不会抢着去啊？

社员：抢着去不行，果园里也苦，就是生产队上派，叫你去你就去。果园里一般不变，每年在那的，得有技术啊，都是常待着的。

① 工数即劳动日数，1 个劳动日记 1 个工，相当于 10 个工分。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也实行小组承包制，但周家庄合作社果园的承包制不同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虽然果园的整个生产过程承包给专业组负责，但仍然由合作社出面进行统一销售，这样能够形成规模优势，不仅有利于吸引客商，而且价格也要比附近其他实行单干的村庄高一些。第二，水果销售之后的收入由合作社与生产队核算后进行统一分配，而不是直接将销售收入付给承包人，果园与大田之间在收入上会进行适度的相互调剂，避免差距过大。第三，承包人数和面积由生产队确定，通常情况下果园承包人的收入会略高于大田的收入，但差距不大，而且前者更辛苦。之所以这样做，因为不仅果园的土地是集体共有财产，而且建设果园的投资来自生产队与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如果仅仅是少数人获利的话就意味着以公共利益为少数人服务，造成不公。

因此，果园的劳动定额制度实际上是一种介于小农经济和集体经济之间的一种有限承包制。之所以称其为“有限承包制”，是因为诸如果园建设和生产的成本投入、水果的销售、承包量的确定等都是由代表集体的生产队与合作社确定，但同时生产过程又由承包组独立负责，生产队不进行干预。这种特殊的有限承包制旨在实现规模优势和降低管理成本之间的平衡，在下文中对此将有进一步的分析。

3. 集体企业的劳动定额管理

定额管理制度实际上起到了劳动过程标准化的作用，并且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相比，更需要强调社员之间的配合。尤其是随着机械化水平的提高，生产过程的标准化、规范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实际上其有着工厂化作业的趋势。需要特别指出的，劳动定额和工分制度不仅用于农业生产领域，同样也运用于集体企业的生产中。五金水

暖厂1990年的时候有劳动定额374项，而到了2000年，改名后的阀门厂劳动定额则有上千项之多。定额的增加，一方面与产品的种类相关，种类越多，定额项目也就越多；另一方面也与技术的复杂程度相关，生产的专门化程度越高，分工越细致，定额也就越多。

其实定额管理制度并不是周家庄合作社的专利，更不是农业生产所特有的。现代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工业企业中，都广泛存在着劳动定额管理制度。以富士康为例，每条生产线每天都会有产量要求，而制定每条生产线产量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每个员工完成每道工序所需要的时间，这项工作由工业工程部门即IE完成[①]。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将计件工资制和计时工资制相结合的劳动管理制，尽管二者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产权归公还是归私，但其目的都是解决规模生产与集体劳动过程中的激励问题。

（二）劳动过程的监督

周家庄合作社以生产队为基本的生产单位，队长、副队长负责全队的生产工作，要分配任务并监督社员劳动，评价的标准不仅要看是否能够完成当天的劳动量，同时也要看完成的质量。

访问员：干得好不好谁来检查？

社员：队长看啊，你干得不好扣工分啊。你干得不好，一个劳动日，你没干够质量，给你6分、8分，都有。

访问员：队长只能天天转悠看质量？

社员：对对，他检查。比如说我干了什么，按定额算，就报

① “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2009。

给会计，按零工算，该记多少工时就记多少。

在一个生产队当中，队长的权力是很大的，每天要喊队员出工、分派任务，要保证进度；尤其是在“抢收抢种”的季节，更是要不断地督促社员加快劳动进度，通常起得比社员早，睡得比社员要晚。相比较之下，社员虽然反映自由度很小、要听从队长的安排，但也不用操什么心。

访问员：那比如采摘园比大田挣得多，那谁分到采摘园，谁分到大田呢？

社员：那就是队长派了，派谁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你想干嘛就干嘛。

访问员：他会考虑按户分配，一户里有大田的，有采摘园的吗？

社员：那就是人家当官的说了算。

……

社员：不愿意干就干别的，有时候给你分个活儿，你说不愿意干，干别的，有别的你就干，同意的你就去，你不去就歇着呗。现在也没有什么劳力，都上厂子里。现在的都是老的，这村子一千五百多人，劳力最小的也五十多，年幼的人家谁干那个。

在队长之下还有组长，每个组长要带领本组的成员负责完成特定的劳动任务，因此负有督促之责，如果本组所负责的劳动任务完成的不理想，将会受到队长的指责，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缩小作业小组的规模，有利于将监督权进一步下放，提高监督效果。

社员：原先队长分组都在地头，现在喇叭广播。谁干嘛活，谁带班，一广播就行了。

访问员：那质量怎么监督呢？

社员：质量是组长负责的。达不到质量要求就扣分。

访问员：组长没监督好也扣吗？

社员：扣，让你带班没带好当然要扣啊。

有意思的是，组长当中没有女性，即便该作业组成员全部为女性，其组长也是男性劳动力，由于村里的干部也都是男性，有社员说这种做法其实便于队长和组长之间进行交流。

队长在监督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舞弊行为呢？调查中发现虽然队长未必能够做到尽善尽美，但基本上能够做到客观公正。

访问员：报工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分歧怎么办呢？比如队长说你干得不好，扣你，社员不满意怎么办呢？

社员：你不满意，质量不好那能不扣你啊？

访问员：那是大伙都做得比较好呢，还是队长碍于情面不说呢？

社员：没情面。

……

访问员：有没有大家公认的说某个人干活儿很懒啊？

社员：那个情况不能说没有，一般的都干得好好的，你偷懒也不沾。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其实监督是一个监督者和受监督者双方

的互动过程。一方面，队长要公平客观地对社员的劳动进行评价，并合理地分配活计，不能出现明显的分配不公，从而获得社员的认可；另一方面，社员也能够积极配合队长的安排，按时保质地完成劳动任务，鲜有偷懒或拒不接受安排的情况发生。这种相对和谐的劳动关系根植于乡土社会的熟人网络之中，对于一种获得普遍认可的安排，这种熟人关系将提高社员违反这一规范的成本。

（三）劳动定额制度的影响因素

当然，劳动定额制度能否做到公平合理为广大社员所接受，能否有效地发挥激励作用，会受到一系列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影响。对于周家庄合作社来说，相对优越的内外部条件有利于减少合作社与生产队监督和计量的困难程度，降低管理成本。这些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利的土地条件。周家庄合作社地处太行山东麓山前冲积平原，地势开阔平坦，土地平整连成大片，基本上没有出现小块分割的状况，因此土地的耕作条件是基本同质化的。

第二，组织规模。周家庄合作社虽然实行合作社一级核算，但还是以生产队作为基本的生产组织与核算单位。队长和副队长负责本队的生产事务和劳动任务的分派，监督社员的劳动过程，初次分配也是以生产队作为基本单位，产出多者多得，少者少得。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生产队还将参加生产的劳动力分为不同的劳动小组，并由组长负责监督本组成员完成分派的任务，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队长和副队长由于监督对象过多而出现监督不力的情况。

第三，技术条件的影响。得益于合作社集体经济在公共积累和规

模化生产方面的优势，周家庄合作社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大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以合作社第七生产队为例，该队拥有耕地2243亩，有大中型拖拉机13台，大型联合收割机3台，从耕地、播种到收获基本上都实现了机械化操作。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大大降低了作为劳动者的“人”的因素对生产过程的影响，提高了生产的标准化程度。同时，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一方面有效降低了劳动用工数量，大大降低了监督成本，同时也有利于提高监督效果。

由此可见，周家庄合作社劳动定额制度是非常完备的，并表现出明显的自身特点。这一制度融合了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的特点，将标准化的定额工与灵活的散工记分方式相结合，既有利于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又能够有效地降低监督管理成本。劳动定额制度的形成完善，一方面基于长期的经验积累并根据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另一方面又注重在定额制定过程中的民主参与，使其能够为广大社员所普遍接受；不仅如此，定额制度还根据不同生产内容的特点，灵活采用不同的形式，如果园的“有限承包制”，这就使其不至于成为僵化不变的教条。正是这种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做法使得劳动定额成为周家庄合作社避免低效率、增进社员福利的基本保障。

七 “三包一奖”合作社的分配制度

如果说劳动定额管理制度旨在解决生产过程中社员劳动投入的监督和计量问题，那么建立在统一核算基础上的“三包一奖”与按劳分配制度则旨在解决合作社与生产队、生产队与社员之间的分配问题，一方面要根据社员的劳动投入来进行收入的分配，多劳多得，实现对

社员的正向激励；另一方面在社员分配之前要在集体层面上进行合理的扣除，以便形成公共积累，进行扩大生产的再投资，发挥规模优势。

1961 年调整之后的人民公社实行“三（两）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实际上是将生产管理和核算权下放到生产队，公社和生产大队只有监督、协调和指导的功能。但周家庄合作社并没有采纳这一制度，至今仍然坚持将合作社作为核算单位，但同时赋予生产队充分的生产自主权。

实际上随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体制的建立和巩固，这一制度已经很少被使用，这是因为生产队作为基础，不仅拥有组织生产的权力，还有权进行自主分配，已经成为基本的核算单位，实际上具有了自负盈亏的性质。

如果说“三包一奖”旨在调整生产队与合作社之间的生产与分配关系，那么按劳分配则是集体经济的基本分配原则，是区别于雇佣劳动下工资制的一种报酬计算和支付方式。本节将从合作社与生产队、生产队与社员两个方面对周家庄的分配制度进行介绍。

（一）周家庄合作社统一核算、“三包一奖”与分配制度的内容

周家庄合作社“三包一奖”与分配制度的基本内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点。

①各生产单位（包括生产队和集体企业，下同）的总收入统一上缴合作社，由合作社组织社员的年终分配。

②各生产单位的总收入和成本在合作社一级分开计算，不进行财务合并。

③各生产队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农用物资由合作社进行统一采购，然后根据各生产队的使用量分别计入各队的生产成本。

④合作社从各生产单位总收入中按一定比例分别扣除生产成本、公积金、公益金、以丰补歉待分配基金之后为各队的纯收入。

⑤各队的纯收入在本生产队的社员之间根据每个社员的工分进行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

1. 合作社与生产队之间的分配

生产队的总收入分为三个部分：生产成本、合作社公共积累扣除和待分配纯收入。农业生产的成本主要包括化肥、种子、农药、柴油、农膜、电力等农业生产资料，由于各生产队所需的农资产品由合作社安排统一采购，因此这部分成本将由合作社在对各生产队进行统一核算的时候从各队的总收入中扣除。

扣除生产成本之后的收入为纯收入，在此基础上进行 3 项扣除：集体公积金、公益金和以丰补歉待分配基金，最后根据工分多寡在社员之间进行分配。近些年来，由于集体企业的发展，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农业总产值，加之农业产出相对较低，因此从农业中提出的公积金、公益金逐步减少，而主要从工业企业中提取，以做到“以工补农”。

2. 合作社与集体企业之间的分配

据统计，2001 年，集体企业的收入已经占到周家庄合作社集体经营收入的 90% 强，而农业仅占集体经营收入的不到 10%。由此可见，集体企业已经成为合作社经济的主导，不仅解决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还提供了可观的公共积累。

企业的经营收入扣除生产成本之外的为纯收入。初期的集体企

业由于由合作社投资建设厂房和购买机器设备，因此企业需要向合作社缴纳投资利息、资产折旧费和占有流动资金利息，但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允许企业利用资本流动资金、向合作社购买其投资的设备，企业因此不再缴纳投资利息和折旧费。但作为集体企业的出资人和所有者，企业仍然需要向合作社缴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

表4-3　2001年合作社4家集体企业纯收入的分配情况

单位：万元,%

企　业	纯收入	工资款	公积金	公益金	管理费	折旧费	占款利息
纸箱厂	159.1	133（84）	11.2（7）	4.8（3）	4.8（3）	0	5.3（3）
印刷厂	251.8	219（87）	17.6（7）	7.6（3）	7.6（3）	0	0
阀门厂	3038.6	2604（86）	224.0（7）	78.0(2.6)	90.6（3）	127.5（4）	42.0（1.4）
建筑队	257.7	223（86）	18.1（7）	7.7（3）	7.7（3）	0	1.2（0.5）
合　计	3707.2	3179（86）	270.9（7）	98.1(2.6)	110.7（3）	127.5（3）	48.5（1.3）

资料来源：刘增玉、王盛秋：《周家庄之路》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周家庄合作社的工资款属于纯收入，而非列入生产成本，这正是合作社与私有制企业的区别所在。后者将员工的工资列入成本，因而成为压缩对象，其利润则归属资本家或者产权的所有者，因此利润和工资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为了利润的最大化劳动者的工资必然会被尽可能地压低。而集体企业属于社员劳动者集体所有，其利润也归属全体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利润和劳动者收入是统一的，二者之间的对立也就不复存在了。

3. 按劳分配

按劳分配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社员的收入所得反映其劳动投入的价值，而非仅仅出卖劳动力所获得的工资收入；其二，收入的水平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不同劳动者劳动投入的数量和质量。从上一

部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合作社扣除成本和公共积累之后的纯收入全部在参加合作社劳动的社员劳动力之间实现了分配，不存在社员收入之外的利润问题，因此社员的收入能够反映其劳动投入的价值；而完善的劳动定额制度则有效保证了收入分配能够较好地做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

分配每年进行一次，一般在年底春节之前进行。由于实行合作社统一核算，因此社员分红都统一在合作社的办公室进行，这也是每年一度合作社和社员们的大事。由于一次性分配的数额比较大，因此分红的场所在此期间严禁外人靠近，还经常有县公安局的警察协助进行，这是周家庄合作社集体经济特色的重要体现之一。

社员的分红所得计算标准为：分红收入 = 工分量 × 工分分值。工分分值的计算标准为：生产队待分配纯收益除以该生产队的工分总量，前者代表总收益，后者代表投入的劳动量。工分的分值越高说明该生产队的经济效益越好，单位劳动的产出也就越高，社员的人均分红也就越多。

（二）合作社分配制度分析

周家庄合作社实行统一核算与“三包一奖”制度一方面在于提高公共积累的水平，扩大积累规模，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合作社集体经济的规模优势；另一方面仍然坚持生产队和集体企业作为基本的生产与分配单位，合作社对各生产单位的经营活动一般不进行直接干预。与此同时，按劳分配则确保社员能够根据自己的劳动投入获得相应的收入，这就使得劳动者投入和所得之间呈现正向激励关系。

具体来说，这种不完全的“三包一奖”制度的优势在于四个

方面。

（1）在合作社的层面上组织生产资料的采购和农产品的销售，这样既有利于节约采购成本，同时也利于销售，提高销售价格，使规模优势得到比较好的发挥。

（2）将核算权收归合作社，有利于降低提取公共积累的成本。如果由各队自行组织分配，就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放弃合作社层面的公共积累提取由各生产队自行确定分配和积累的比例，这种情况下将大大降低积累的规模，不利于资金的集中和扩大生产规模；要么由合作社向各生产单位提取公积金、公益金等，但由于核算权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这种情况下向各生产单位收取公共积累的难度和成本都将大大提高。

（3）提取公共积累的行为实际上是在组织层面对投资和分配的调节，如果量太小，则很难发挥什么作用；如果征收比重太大，会影响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以合作社作为抽取主体，可以在较低的抽取比率上实现更大规模的积累，既不至于引起社员的强烈反对，又能够集中更多的财力进行生产的再投资。

（4）合作社一级统一核算便于在各生产单位之间进行适度的分配调节。前文中已经提及，近些年来，集体企业承担了更多的公共积累的职责，并对农业生产进行适当补贴，实现以工补农。同时在农业生产内部，由于果园和大田作物的收益不同，如果果园的收益较好，那么将会从中提取一部分补贴大田，反之亦然。但这种补贴并不是搞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不同劳动的收入之间仍然保持了明显的差距，而调节只是为了避免差距过大。

由此可见，周家庄合作社实行“三包一奖”制度以及按劳分配的

出发点和优势在于在兼顾各生产队积极性、确保生产效率的同时发挥规模优势，同时便于合作社在各生产单位之间进行适度的分配调节，使劳动者能够根据自己的劳动投入及质量获得相应的收入，而不是搞分配中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

八 合作社的规模优势分析

如果说科学合理的劳动定额管理与分配制度有效避免了平均主义对社员劳动积极性的影响的话，那么合作社较小农经济的优点则在于建立在公共积累基础上的规模优势。上文中提到的“三包一奖”制度旨在在保护生产队和集体企业充分生产自主权的基础上提高公共积累的水平，这是合作社规模优势得以发挥的重要条件。本节将从生产和分配两个方面对周家庄合作社的规模优势作进一步的阐述。

（一）多业并举，合作社的产业结构

周家庄合作社的工副业已经有很长的发展历史，但在1980年之前，农业一直是合作社/人民公社的主导产业和主要收入来源。

1. 集体企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之前周家庄合作社的工副业发展受到外部大环境的影响虽然不断波动，但已经奠定了初步基础，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鼓励社队企业的发展，到1974年工副业收入已经占到全社总收入的24.94%。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大环境逐渐走向开放，周家庄合作社的集体企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到1992年，集体企业已经发展

到18家，后来虽然经过调整集体企业的家数有所减少，但在合作社总收入中一直都占据绝对优势[①]。2009年，合作社实现工农业总产值5.6493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4.9505亿元，农业总产值5252万元，第三产业产值1736万元，工业总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7.6%，农业仅占9.3%[②]。

与当下招商引资条件下借助外来资本进行投资的发展路径不同，合作社集体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集体经济的公共积累。前文中已经提到，合作社各生产单位（生产队和集体企业）扣除成本之后的纯收入在分配给社员之前，还要先行扣除公积金、公益金等公共基金，其中公积金主要就是用于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集体企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原始的资金投入，而这时的资金只能从农业生产上缴的公积金中提取，1980年就有22.85万元的农业提留款用于集体工业的发展[③]。

2. 独具特色的农业规模化

除了工业，周家庄合作社的农业生产也不断转型，实现了有自己特色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

晋县是国家重要的棉花主产区，1979年以后，国家数次提高棉花的收购价格，极大地调动了棉花种植的积极性，周家庄合作社的棉花无论单产还是总产都屡创新高，给合作社带来了丰厚的现金收入。

2000年以后，合作社开始推进农业的多样化经营，尤其是推广高

① 刘增玉、王盛秋：《周家庄之路》，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
② 《晋州年鉴2009》，第238页。
③ 刘增玉、王盛秋：《周家庄之路》，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

附加值的农产品生产。2009 年，周家庄合作社共有土地面积 21046 亩，其中大田作物 18516 亩，主要种植冬小麦、夏玉米和谷子，此外还有豆类。大田作物种植目前已经完全实现了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目前农业劳动力仅占全队劳动力的不到 10%，且多为中老年和妇女。

近些年，合作社与晋县种子公司签订协议，除了口粮田之外，小麦种植全部改为种子田。种子的收购价格要略高于普通小麦 10% ~ 20%。周家庄乡之所以能够拿到小麦种植订单，正在于其集体生产所具备的规模优势，不仅能够提供足够的土地面积，而且实行统一的耕作和管理，便于保证种子品质。

果树种植目前主要包括果园和采摘园，其中后者始建于 2005 年，占地面积达 900 亩，主要发展观光农业，兼有果树、草莓、蔬菜、生态养殖业等经营种类。农业生产主要是各生产队自主决定，但通常都会与合作社进行协商，比如采摘园，就由合作社和十队共同投资建设，但收益归十队所有。与大田作物种植的高度机械化不同，果园、菜园等需要投入较多人手，但收益也相对较高。

（二）工农互补的分配格局

周家庄合作社的经济主要分为农业和工业两部分，前者以生产队为单位，后者则主要是指集体企业。由于合作社的再生产的投资主要来自自身积累，因此在工业发展初期，以农补工，用农业生产的收入来进行工业投资，兴办了一批集体企业。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集体企业已经初具规模，提供公共积累的能力大大提高，这种条件开始进入以工补农的阶段。1990 年农业应提

留 66.65 万元，但由于工业的赢利已经比较可观，当年不仅免除了农业的这笔提留，还从工业利润和其他收入中拿出 90 万元补贴农业，用于农业生产者的年终分配[①]。2009 年，合作社农业生产更是获得补助合计 216 万元。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合作社明确允许农业占用资金不计利息、不提折旧费、免交提留款。农业生产受制于自然条件，是基础产业但产出又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农业进行补贴，必然会导致劳动力流向高收益的工业而影响到农业的发展。在周家庄合作社，由于实行合作社统一核算，有利于在合作社层面上用集体企业的生产对农业进行补贴，在保持农业健康发展的同时避免出现队工和社工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由于集体企业劳动的分红要高于农业生产，因此合作社还有一项规定，尽量使一个家庭内既有队工（农业生产）又有社工（集体企业生产），以此来避免不同社员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

另外，对于集体企业，公积金和公益金的提取比例分别为纯收入的 7% 和 3%，其他大约 86% 的纯收入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参加集体企业生产的社员之间分配。适度的提取比例避免了过度调节可能造成的平均主义，在兼顾公平的同时比较好地坚持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不仅如此，由于不同生产队之间在土地面积、劳动力和生产工具方面有明显差异，因此在农忙季节，进度较快的生产队会支援进度较慢的生产队，进行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协作，更好地发挥生产中的规模优势。

---

① 刘增玉、王盛秋：《周家庄之路》，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

（三）合作社的公共福利事业

除此之外，合作社依赖集体经济的优势还举办了大量的公共福利事业，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对老年人、贫困孤寡人口进行补贴，并提供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等等。周家庄合作社所津津乐道的是自己创立的十项福利事业，其中包括[①]：

65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30元养老津贴；

65岁以上、连续工作20年以上的农民干部实行退休制，每年享受在职干部的平均生活水平；

65岁以上无儿无女的老人，集体负担起生活费，患病派人伺候，药费集体承担，并每月发给20元零花钱；

对还有一个女儿的老人，集体负担生活费，并每月发30元零花钱，老人患病后女儿伺候并负担药费，老人财产归女儿继承；

军属每个兵每年发放5000元的优抚款；

全乡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从小学到初中全部免交学费；

合作社为农户无偿供应自来水；

合理规划，民建公助，统一兴建住宅楼；

对因重病在县以上医院住院给家庭造成经济困难的，根据情况集体给予经济补助。

这些补贴在今天看来已经稀松平常，但在1980～2001年就已经陆续建立，就不能不将其归结为合作社的优越性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改革的攻坚阶段，原有的制度被打破，建立在公有制和

① 摘自《周家庄乡农工商合作社守则》，见刘增玉、王盛秋《周家庄之路》，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

集体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荡然无存，个体农民必须承担巨大的外部风险，医疗保险、免费教育、社会养老等公共服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周家庄合作社在此期间建立的全面的福利制度才显得尤为可贵。

合作社之所以能够实现多业并举，进行生产协作并举办多种福利事业，其原因在于合作社能有效降低进行再投资所需的公共积累的成本，同时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降低生产成本，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避免出现对劳动者的剥削现象。

由此也可以看出，集体生产条件下合作社的规模优势与今天作为官方既定政策的“规模经营”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是建立在产权集中条件下的雇佣劳动基础之上，实际上使自主经营的小农丧失了主体性地位，而成为不再拥有生产资料——土地的农业雇佣工人；而前者则建立在产权共有条件下的集体劳动基础之上，没有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分，所有的生产经营收入都共同所有，并在社员之间进行按劳分配。很显然，这是一种更加公平合理的经营方式；不仅如此，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能够为农民提供更多的保障，这种保障一方面体现在当外部经济条件不好时集体农业生产仍然能够吸收回流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建立在公共积累基础之上的产业多元化经营，解决剩余人口的本地就业问题。

因此，正如本节对周家庄合作社规模优势的分析所证明的，私有制的企业并不是实现规模经营和进行扩大再投资的唯一途径，合作社这种共有产权的制度安排可以发挥同样的功能，并且同时避免剥削的出现，这也是在今天强调社会经济的意义之所在。

九 规模优势与有效监督之间的平衡

与小农经济相比，合作社虽然更加有利于发挥规模优势，但同时也意味着更高的监督成本。个体生产不存在监督和管理问题，因此监督和管理的成本为零；组织化的生产规模越小，通常情况下监督成本也就越低，这是因为在规模较小的组织中，不仅监督的难度比较小，而且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要变得容易很多。但规模太小，合作社的规模优势就难以得到明显发挥。因此，规模优势与有效监督和激励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合作社要表现出较小农经济更高的效率水平，就需要在二者之间实现平衡，既要能够充分地发挥规模优势，又要合理限制规模避免出现由于监督、计量和管理成本过高而出现的规模不经济。

通过上文对周家庄合作社的分析可以看出，灵活的劳动定额管理制度保证了监督和激励的有效性，而集体经济所体现出的规模优势则表现出了小农经济条件下个体生产所不具备的优越性。正因为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周家庄合作社直到今天都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规模优势与社员劳动监督和计量之间并非仅仅呈现反向关系，在合作社中，二者也互相促进。规模优势的发挥有利于提高社员的收益水平，会形成对社员的正向激励，在这种情况下社员会更倾向于主动努力工作，提高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监督并非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之间的单向关系，而是双向的互动过程，因此监督成果和效果不仅取决于监督的客观难易程度，而且取决于被监督者的主动配合程度。

1979 年开始，分田单干之风刮遍大江南北，在这样一个变革的节点上，周家庄合作社利用自身优越的自然条件和长期积累的技术经验，趁国家大幅度提高棉花收购价格以及县里决定免除该社粮食征购任务的时机，扩大棉花种植面积。1980 年，周家庄合作社棉花种植面积较 1978 年提高 7 个百分点，单产更是从每亩 20.65 千克提高到 100 千克以上，同时合作社实行集中采购，种植成本大幅下降。“一升一降”使得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对农民形成了有力的正向刺激，这是避免合作社解体的重要因素。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合作社集体企业异军突起，不仅解决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大大提高了社员的收益水平，合作社的规模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正是社员收益的不断增长，加上合理的劳动定额制度，保证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使得上述劳动监督和计量制度能够普遍为社员所接受，大大降低了管理成本。

正是通过上述一些调节机制，使得合作社在实现规模优势的同时能够有效地避免监督和计量成本过高的问题，使得周家庄合作社表现出较高的效率水平。

十　总结：周家庄合作社对社会经济的启示

与数十万个被逼迫倒下去的合作社相比，周家庄是发展得比较成功的个案，在今天，它的经验当然不具普遍性，甚至也不具代表性。我们对周家庄个案的介绍，呈现了它平稳发展、从公社时代延续至今的一些做法和条件。我们认为，这样处理周家庄个案，有助于我们回归历史逻辑，从而一方面更公允地评价历史上的集体经济，另一方面

展开未来的合作经济的想象。

今天，中国的工业化和整体经济水平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在这样一个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之下，周家庄集体经济的实践对于我们解决市场经济下严重的“三农”问题，对于我们探寻一条真正推动农村发展的道路，就具有了特别的启示意义。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是必然的趋势，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走向衰落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该以怎样的方式取代小农经济？

从当下的主流情况来看，无论是从政府政策引导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土地向少数人集中都是普遍现象。尽管农村新型合作社的发展得到鼓励，但在很多情况下仍流于表面，无论从合作的广度还是从深度上都无法与周家庄合作社相比。而国家财政对于农业补贴则越来越倾向于种田大户，这一思路实际上将把中国引向美国大农场农业的发展路径。

但是对于地少人多的中国来说，这未必是一条最适合的发展道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经济或合作经济具有特别的意义。小农经济的缺点在于无法实现扩大再生产，因为无法实现有效积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劳动者之间的劳动联合而非资本家主导下的雇佣劳动制实现规模经营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脱胎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周家庄合作社给我们提供了特别的借鉴。

从根本上来说，无论是其农业生产还是集体企业，周家庄合作社都采取了一种企业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家庭不再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个体的劳动力只是劳动分工中的一环参与生产。当然，这并不是合作社独具的特色，而是一切企业化生产方式所共同具有的特点。而合作

社与后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两个基本方面：首先，产权共有使合作社的管理者并不是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这就避免了建立在产权私有化基础上的剥削的出现，保证了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民主管理和控制；其次，也正是在上述基础上，劳动成果能够归全体劳动者所有，实现按劳分配。

毫无疑问，与那些背井离乡在“世界工厂”里打工的农民工相比，与那些分田单干后守着几亩薄田勉强度日的农民相比，周家庄的集体经济为其成员提供了一个另类的、同时也更加有保障的工作和生活。也正是这些特点，使合作社能够成为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替代物的社会经济的一种可能尝试。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周家庄合作社能够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为一些根深蒂固的对合作社集体经济的疑虑提供不同的答案。

参考文献

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程漱兰：《中国农村发展：理论和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杜鹏、丁志宏、李全棉、桂江丰：《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影响》，《人口研究》2004 年第 6 期。

郭红东：《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黄胜忠：《转型时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行为研究——基于成员异质性视角》，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姜军松、谢宗藩、桂兹军：《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力产权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湘潭大学学报》2009 年第 4 期。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林子力：《论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社经济的新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2 年第 6 期。

刘庆乐：《权力、利益与信念：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人民公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刘文革：《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方式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陆云航：《对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一个贡献——统购统销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研究：1953—1982》，《南开经济研究》2005 年第 4 期。

王永作：《农业与农村制度创新》，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辛逸：《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叶敬钟、潘璐：《别样童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张江华：《工分制下的劳动激励与集体行动的效率》，《社会学研究》2007 年第 5 期。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张晓山、李周：《新中国农村 60 年的发展与变迁》，人民出版社，2009。

郑有贵：《比较视角的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 年第 5 期。

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Erik Olin Wright, 2006, "Compass Points: Towards a Socialist Alternative", *New Left Review*, 41.

Zeng Yi, 2007, "Fertility Policy Transition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3 (June).

第五章　崖口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危机

香港理工大学　刘　亚

2008 年 7 月 23 日晚，1000 多名村民涌入崖口村村委会，将干部们团团围住，要求“卖地”。此前，村民代表向各家各户派发意见书，就村委会拟以出租的形式与市、镇两级人民政府共同开发海滩一事征求全体村民的意见。然而，干部们没有料到的是，这个安排在村里掀起了万丈波澜。风波持续了数日，最后村民投票，以高达 99.14% 的赞同票通过了 1.17 万亩的土地征用协议。这场风波，不仅打破了村里土地只租不卖的惯例，也把村庄领导人满叔的政治生涯带到了尽头。2011 年，这位“两脚最黑，两手最白”的老支书，在职 37 年后终于“下岗”。

没有了满叔，崖口村坚守多年的集体制度将何去何从？本文拟对“后满叔”时代崖口村的集体经济制度所面临的危机展开讨论，探讨中国农村在资本主义的语境下建设社会经济的艰难与复杂性，并对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师生目前在崖口村开展的社会经济实践的前导性研究作一介绍。

一　崖口村的“一村两制”

崖口村位于珠江三角洲，与孙中山故居所在的翠亨村毗邻。村庄

背山靠海，风景秀丽，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曾被评为“广东最美丽乡村”。然而，崖口村吸引众人的，不在于它的田园风光，而是几十年来对集体化制度的坚持。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在中国绝大多数农村推行分田单干、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崖口却决定依旧走集体生产、共同富裕的道路，仍然坚持着真正意义上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到如今已 30 多年了。今天在崖口，参加生产的村民依然会把自己称为“社员”，把村委会叫做“大队”。作为一个按照公社制度运行的经济组织，崖口具有鲜明的特点：它具有开放性，村民可以自由择业，可以离开村庄去外地打工经商，不如意时可以回到村里参加生产。它的组织规模几十年来不断变化。比如在 80 年代初期，它基本上覆盖了整个村庄，但是 80 年代中期之后，出去打工的村民不断增多，组织的规模慢慢缩小，今天参加集体生产的人只占全村劳动力的 1/3。尽管如此，大队的很多福利是面向所有村民的。比如给长者和未成年人提供免费口粮，村里无人或者家人无力照顾的老人，可以住进老人院，而一切费用由大队承担。

崖口下辖 8 个自然村，每个自然村按报名参加劳动的人数分成一到两个生产队，生产管理分两级进行。大队主要负责大型的农业机械、水利设施或者种植面积、种植结构，还包括补贴政策的制定等。生产队负责安排具体的生产活动和田间管理。每个生产队设有队长、副队长和记分员，此外还有一个对技术要求颇高的排灌员，由各生产队自行选出。生产队长和记分员会记下各个社员出工的情况，一般来说，社员们都是集体出工，若碰上只需少量人手的情况，生产队长会根据自愿以及公平的原则来安排，尽可能缩小生产队内部的收入差距。

每个月底记分员会把当月所有社员的出工及相应的工分进行总结，并把结果贴在公告栏上进行核对。崖口的工分制在操作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并且在设定各工种相应的工分方面体现了很强的“民主”。其灵活性首先表现在大队没有“一刀切”，而是将工分决定权交与各生产队，由各生产队自行制定和调整。各生产队会根据工种不同的性质，通过投标、计件或包干等方式来确定其工分。一般而言，某项工种（尤其是所有社员同时参与的那些工种，比如除稗、施肥等），工分一旦确定下来就不会改变。调整主要针对新情况，比如抢收时晒谷人手不够，割禾的社员不得不参与晒谷；或者，因为责任重大没人愿意排灌，就必须提高工分以示激励；等等。工分制的“民主”表现在工分调整的过程中。每年 11 月底各生产队召开全体社员参加的“年终总结会”，社员们会针对新情况展开讨论（常常发展为激烈的争论），生产队长这时只能充当协调员，帮助争论的双方（有时是多方）沟通，然后向所有社员宣布最后达成的协议。

目前居住在崖口的户籍人口有 3000 多人，劳动人口达 1600 人，其中参加农业生产的不到 1/3。这些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上了年纪的人。五六十岁仍在生产队开工的老人家不在少数。二是返乡务农的村民。他们大多文化层次偏低，缺乏在外与人竞争的谋生技能。三是需要在家照顾老人和小孩的留守妇女。这三类弱势群体，若是放在别处，估计早已掉入市场经济自生自灭的泥潭，而在崖口，他们找到了足以栖身的港湾。他们以劳动换取工分，到年底按工分分红。由于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崖口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从插秧机、收割机到拖拉机、谷粒烘干机，各种农用机械共 60 多台，这使得劳动强度大为减轻，即使体弱者也能胜任大部分的工作。此外，机械化还极大地缩

短了劳动时间，虽然村里规定每个社员每天的劳动时间为4个小时，但事实上2小时就可以完成。这为那些需要照顾家庭的村民提供了便利。同时，农闲打零工赚取额外收入的传统也得以保留。老人家说，现在生产队开工好比做运动，如果不做，整天坐着不舒服。

崖口村土地面积大约6万亩，可耕种土地达4万亩，包括3000亩基本农田，其余大部分为围垦出来的滩涂。崖口村有据可查的围垦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中叶，新中国成立前村庄就以地多而闻名。不过，这项巨大工程的飞跃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崖口村委会开始与外来公司合作，一改之前的锹铲手推肩挑背扛，采用钩机铲车机械化作业，短短20多年的时间，围垦出了近4万亩的土地。于是，当周围的村庄招商引资，在土地上“种植”越来越多的厂房时，崖口村却以集体的力量将村庄的土地面积扩大了6倍。

如今，这片广阔的围田构成了崖口村“一村两制”的主要经济基础。崖口村主要的生产活动是水稻种植。每年两季生产的粮食，大队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留足口粮以后，再将其余以市场价售出，这种高价买进低价售出的补贴方式，对深陷农业低效、低附加值结构性困境之中的生产者来说，无疑十分宝贵。而使这一补贴成为可能的，则是村庄多年来围垦的土地。由于海水养殖利润高，吸引了许多养殖者前来承租崖口的海滩。巨额的地租收益正好可以将农业劳动者收入维持在一个体面的水平。以2010年数据为例，当年农业生产的纯收入为251万元，海滩发包的总收入为1500万元，而用于农业劳动者分配的总收入却达600万元，人均年收入约15000元，与当年中山市农民年平均收入基本持平。显然，在获取以及利用作为生产资料的土

地方面，崖口村在坚定不移地走集体道路的同时，并没有拒绝市场经济，而是积极地以集体主义的方式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因此有媒体说，崖口村的“一村两制”是以市场经济补贴集体经济，以资本主义补贴社会主义。

崖口村的这种“一村两制”早在当年讨论是否分田时就定下来了。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于偷渡风起，崖口流失了大量的劳动力，为了组织留下来的老弱妇孺完成依然繁重的“三粮”任务，同时照顾那些欲外出打工挣钱的村民，大队召集干部、党员、农民代表，讨论半个月之后决定，无论是外出打工，“自己选择走私有制”，还是在家参加生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村民享有绝对的自由。当年的这个决定，获得了全村人的支持。

然而，尽管村庄两制并行，中心依然是集体经济，其核心价值追求的是社会平等。老书记满叔是崖口村制度的设计者，他坚持“只做雪中送炭，不做锦上添花”，这种“只帮穷人，不帮富人”的信念在实践中体现为“保护弱者，按劳分配”。在崖口，选择种植水稻、维持农业就业成为保护弱者的手段。由于高度的机械化，多年的水稻种植传统，以及相对完善的农业管理体系，使农业就业技术要求低，新人无须任何培训即可上岗。分配收入时也向劳动者/弱势者倾斜，只有参加农业劳动者才享受补贴，这种将分配与劳动相结合背后的理念则来自村庄领导人朴素的劳动观。满叔说：“一个社会如果只坐享其成的话是没有意义的，无事可做，这个地方就不太平。分配只有和劳动结合起来，才能体会到乐趣、尊严，这个地方才有生命力。这样的社会才是和谐的社会。”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之下，崖口村成为了一个真正没有穷人的村庄。

二 解体危机

2002 年，崖口围垦工程全部完成。那时整个珠三角经过 20 多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可供开发的土地相当有限。2007 年 3 月出版的《2006～2007 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显示，珠三角大部分城市正面临无地可用的局面，不少城市已基本没有土地可供大规模开发。珠三角经济发展进入高成本时代。崖口村所属的中山市政府一直苦于城区对经济有限的带动能力，正计划培育能够带动全局发展的新增长极，他们将目光投向孙中山故里和东部沿海区域资源。而此时崖口却拥有几万亩土地，不难想象各类寻租势力如何虎视眈眈盯着这块令人垂涎欲滴的肥肉。老书记满叔说，在他卸任的前几年间，不得不投入极大精力应付前来寻租者。

2008 年，在未征得崖口同意的情况下，中山市政府做出了开发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部署，按照计划将在崖口 9000 多亩的海滩上开发度假村和房地产项目。而满叔依照崖口土地只租不卖的惯例，通过与市国土局下属的土地储备中心的多次谈判，村里决定以“租”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为此村民每年都能获得相当于土地产出的收益，以 70 年为一个周期。并且为了保险起见，拟签署的协议还规定将以每年一号大米价格作为补偿的依据。满叔的思路依然是要守护村庄的财产，为子孙后代留一份保障。没想到，这样的安排并不被村民认可，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描述的那一幕。之后的一些调查材料显示，“卖地”风波并非仅仅是村民希望在村庄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村庄里黑恶势力的卷入让整个事件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2008 年夏天的“卖地”风波也并非一个突发事件，早在 7 年前的“大字报”事件即表明，村子里正在形成一股反对现行集体经济制度的力量。2001 年 2 月，先是有崖口村民写信到信访办，说大队干部不肯分田，不卖地，搞腐败。紧接着 4 月，崖口各主要公共场所的通告栏同时贴出内容相同的“大字报”，声称现任领导有严重的经济问题。部分村民还拿着一封请愿书和有 17 个村民签名的“崖口反腐败行动小组”名单，到村委会要求公布 20 年来的财务状况。满叔立即向镇政府汇报，同时发表《告崖口海内外乡亲、崖口村民书》《我们为什么不卖地》等文，向村民解释整个事件过程，并就请愿书中提出的问题做出正面回应。

“大字报”事件以“反腐小组”的失败而告终。然而老书记满叔意识到，“大字报”事件表面上看是冲着村干部腐败问题而来，实质是为了分享和占有崖口村通过集体劳动创下的财富，反对用村集体的土地出租收入补贴集体农业生产。事件过后，满叔根据镇政府调研组收集到的村民意见，立即展开了一系列的整改措施，包括实行财务、村务公开，兴建体育、娱乐设施，提高村民福利水平，包括给两头人（16 周岁以下和男 60 周岁以上、女 55 岁以上的村民）免费提供口粮等。然而，更大的动作是第二年进行的土地收益权分配方案的调整。2002 年，崖口村主动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将总面积约 17000 亩的海滩，按当时登记的农业人口为基数，永久性地划拨给各自然村，每个村民分到约 5.5 亩，由各自然村自行管理其收益。其余大概 13000 亩的围田，仍由大队管理，其收益用于补贴农业生产，以及应付各类社会税费和开支。

在解释为何将围垦土地分给村民的原因时，老书记满叔说：“珠

江三角洲地带，由于土地资源过度开发，余下土地资源不多，各级政府依赖开发土地赚取财政收入，这也使矛盾逐步突出，我们这样一分到人，就回避了正面争夺的矛盾。”崖口通过实行土地股份制改造，将每个村民变成合法的股民，理论上意味着任何土地的征收都必须经过全体股民的同意，这必定会增加政府谈判时的难度，从而抵制政府征地的行为。2006 年，崖口实行第二次土地股份制改革，将除 2002 年已分配土地外的土地和集体财产全部纳入，包括 3000 亩稻田及相关基础设施、厂房、山林等，不量化到个人，每年生产的利润仍旧按以前的集体生产模式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福利分配为辅。纳入第一次股权化改革的土地是村庄新近围垦出来的，利润较低，而第二次股权化所涉及的土地是崖口村财富的核心。2008 年被征用的正是第一次股份制改革中分配给村民的土地，没有对集体统筹生产和分配的模式带来大的影响。显然，村庄领导人是富有远见的，通过对集体资产进行两种不同性质的股份制改革，一来可以减缓村里反对力量给村集体带来的压力，二来可以给各种外来寻租势力设置重重关卡。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股份制也给崖口带来了负面影响。首先，它直接挑战了“按劳分配”的理念。村庄多年来坚持分配与劳动相结合，但按股分红的地租经济却让“不劳而获”成为现实。其次，股份制也对崖口的集体经济构成威胁。随着土地收益的不断增加，反对用地租补贴农业生产者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正是股份制为这些个体权利的伸张与表达提供了便利与合法性。如 2011 年 4 月，某村民向村委提交一份《崖口村未来发展走向意见提议书》，明确要求大队将所有土地收益发给每一个股民，并且建议村领导做一次“民意调查”，让股民们自己决定农田到底是继续“亏本耕种”，还是承包出租“转亏为盈”。

风波过后，满叔“退休”了，尽管新一届领导班子宣称他们会继续走集体主义的道路，但缺乏如此高度清廉、智慧的带头人，崖口村集体制度的未来充满了变数。“卖地”风波结果显示，满叔多年来所秉持的济困扶弱的价值理念和按劳分配的制度安排似乎没有获得多数村民的理解与支持。同时，由于村庄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体现在农业生产者与非农业生产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消费货币化与农业生产的低效以及思想的多元，村庄的凝聚力越发薄弱。崖口村民在“卖地”事件中的表现与最后的抉择表明，这个集体已经不再是30年前那个上下团结一致创造奇迹的集体了。崖口的集体经济制度面临着解体危机。

2011年3月14日在央企招商会上，中山市政府与香港招商局集团签订协议，规划在位于珠江入海口的南朗镇和围垦新区开辟翠亨新区。当年，新区的概念性规划出台，确定集中建设区范围约为160平方千米。2012年10月，广东省政府审议并通过《广东中山翠亨新区发展总体规划（2012～2030年）》，这标志着翠亨新区将很快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按照发展总体规划，翠亨新区将以“文化引领、生态优先、产城融合、智慧创新、和谐善治”为发展理念，打造世界一流的人文丰沛、环境优美、低碳智慧、生态宜居的现代化滨海新都市。同时按照“前瞻性、根植性、错位性、融合性”的原则，重点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和幸福导向型产业。翠亨新区的规划与建设已成为广东省“推动珠江西岸地区提升核心竞争力、促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

崖口村位于规划的新区范围内，毫无疑问，这个以土地“立命”的村庄将无法逃避土地被再次征用的现实，而这一次也许会彻底改变村庄的命运。是危机，还是契机？出于多种原因，新一届的领导班子

至今没有（也许不愿，或者不能）出台任何应对措施。看来，崖口的未来，如同新的村庄领导人所言，真的只能由崖口全体村民来决定了。

面对崖口村被纳入翠亨新区规划、村庄生活将可能彻底改变的前景，多数村民表现出模棱两可的态度。2008 年“卖地”之后，村民对于自己村庄土地的价值才开始有了真正的认识。2011 年 11 月，市国土资源局先后挂牌出让之前从崖口征收的大约 2200 亩的商住用地，竞投起始价约为人民币 11.97 亿元，即 54.4 万元/亩，若加上配建公路的费用，每亩价格超百万元。而 3 年前，崖口村仅以每亩 5 万元的价格转让这块土地。如此大的价格差距让村民受到震撼，他们因此在讨论征地以及村庄未来发展的话题时变得小心谨慎。

不过，种田没用，连小孩上学、老人看病的钱都无法支付，这是很多崖口人对村里坚持集体农业抱怨最多的地方。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中国农村消费方式已经由传统自给性消费逐步转向了货币性消费，而崖口村地处珠三角，对货币的依赖程度更高。在崖口，少数家庭会在庭院或沟渠边开荒种菜，但大多数家庭的日常开支则完全需要使用现金。一个普通家庭从参加农业生产获取的收入，刨去日常开支后一般所剩无几。若是遇孩子上学或家庭成员生病，经济压力便会骤然上升。如阿明一家，她和儿子都在大队工作，媳妇在邻村的工厂做文员，3 个人的月工资加起来不到 5000 元，要承担全家 5 口人的日常生活开销，孙女在镇里上学，每月交通加学校午餐要花去几百元，而两岁孙子的奶粉钱差不多要 1000 元。

阿杰在生产队工作好几年了，他说：“我们崖口的地最多，但人最穷。”阿杰认为将稻田出租更划算。他算了一笔经济账：单单把

3000 亩稻田出租给人种甘蔗、香蕉或其他经济作物，按每年每亩 1000 元计算，加上国家的粮食补贴 150 万元，全村人每人每年可分 1000 多元，即使不劳动他们家也能有 4000～5000 元的收入，这还没算土地分红。而他可以继续做装修，加上老婆、女儿在制衣厂上班赚的钱，全家人的生活肯定好过现在。

不少村民抱怨崖口几十年来没有任何“发展”。在他们看来，工业化才是发展的“硬道理”。他们可能忘记了，崖口并非没有尝试过走工业化的道路。事实上，崖口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就有了村办企业。改革开放以后，中山市首批外来加工、三来一补企业落户崖口。然而，由于缺乏管理人才，加上竞争激烈，村集体赢利的空间并不大。而工业化引发的环境隐患，最终促使崖口做出“退工还农”的选择。只是，这种无法用金钱计算的自然环境资源的价值，对于那些急于获取现金改善生活品质的村民来说是无法理解的。

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以及城乡人口流动而来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生活逻辑和观念逐渐取代了农村传统消费观念，占据了村庄生活的主导权。2008 年卖地之后，崖口村每个人分得 14.2 万元的现金补偿，加上养老保险大约有 17 万元，一夜之间每个家庭拥有了几十万元的财富。暴富给村庄带来了许多变化。卖地当年，村里即出现了建房高潮，据说一年之内就有近 200 栋新房破土而出，造价在 40 万～60 万元之间。高档酒楼多了，买车的人多了，出境、出省旅游的人也多了。更糟糕的是，村里的麻将馆由原来的十几家增加到了 30 多家，不少人整日沉溺在打牌赌博之中，据说有人不到半年，就把一家三口分的钱全部输光了。

不可否认，相当一部分村民盼着征地，相信再次征地他们将获取

更多的金钱利益。在2008年征地后村里就有人开始说“第一次卖地脱贫，第二次卖地致富”。然而，外界对崖口的关注，尤其是卖地之后村庄的变化，开始让部分村民反思，重新审视财富以及所谓高品质生活的含义。2008年以后，村办老人院里的老人都被孩子接回了家，老人院也就此关门。“五保户”也少了，平时不大来往的亲戚突然开始对他们表示关心了。幼儿园被私人承包了，村民不得不为小孩支付更多的教育费用但教学质量却没有显著提高。游手好闲的人多了，社会风气日趋直下。阿全50多岁了，他说：“钱少我见过，钱多我也见过，但钱有什么用呢？你可以用来买汽车，用来建房子，但你住的环境很恶劣，水被污染了，种的菜里含重金属，人的素质还是这么差。这种生活又有什么意思呢？”上了年纪的村民很怀念多年前的崖口，那时候山清水秀，村人和睦相处。那时候连沟渠里的水都是甜的。谁家但凡有事，邻居都会主动过来帮忙。

年轻一点的村民当然希望有更多的钱，可又担心土地卖光了，“到时候自己一把年纪，除了种田都不知道还能做什么？”而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两年，除了一些面子工程，比如种树（只是为此也砍掉了一些树），他们在有关村民福利方面几乎无大的作为。同时，他们不重视农业生产的态度也渐渐明朗。2012年12月，崖口村晚季收割的稻谷没来得及晒干，就遭遇连续半个月的阴雨天气，晾晒在禾庭的谷粒纷纷长霉发芽，估计损失达17.5万千克。但是据知情人说，四分天灾六分人祸，大队疏于管理才是重要原因。而晚季稻谷收割以后，大队没有像往年那样组织人手及时翻犁所有稻田，这不仅使村庄几百年犁冬晒白的耕种传统面临被抛弃的命运，还会直接影响粮食的收成，为农业的低效制造口实。

村民不会轻易对外人谈起他们对如今领导人的看法，不过，他们有的开始怀念满叔，有的开始讨论分田单干好还是集体好。显然，村民对村庄的新领导人没有信心。崖口村人心彷徨。

三　应对策略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崖口村独树一帜的集体经济制度就引起学界的关注，村庄多年来为保护弱势群体所做出的巨大努力赢得了大部分专家、学者的尊敬。他们肯定崖口在规避市场风险、解决剩余劳动力、保存乡土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同时对崖口的未来走向提出建议，比如发展养殖业、有机农业、低/无污染工业、农超对接、农村生态旅游等，认为崖口村应该利用本土丰富的资源，走深度开发的道路。不过，这些发展模式，老书记满叔并非没有设想过。村庄缺乏能干的管理人才，致使之前所有在工业、商业方面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个别干部还趁机敛财中饱私囊，最终迫使满叔退守围垦，靠土地出租维持崖口的集体经济。如今崖口人再次面临选择的十字路口，是放弃集体经济，任由地产资本肆掠横行，还是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整合村庄资源，唤回村庄的凝聚力，如同30年前那样，再次闯出一条经济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出路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的师生于2012年的夏天走进了崖口村。

这项名为“珠三角农村社区设计和社会经济建立”的跨学科研究，旨在通过可持续性设计，在当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语境下，探索珠三角农村社区超越计划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困境，发展另类可持续性社会经济的道路。它采用社区参与和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方法，以及可

持续性设计，以期重新组织社区成员，重新设计乡村景观以及农业产品，推动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平衡发展。它的具体目标包括：

（1）批判性地审视来自农村社区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并研究其在中国语境下增长的可能性。

（2）开创在中国语境下农村社区设计。通过可持续性产品设计，利用当地原材料，复兴本土手工艺，协助其转型成为可商业化操作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

（3）通过与村民合作设计的手工艺产品和新型社会媒介，推广乡村旅游项目。

（4）推动珠三角农村可持续发展，促进城区绿色消费、食品安全以及公平贸易的发展。

（5）发展社会经济社区嵌入模式，策略性地逐步走出计划和市场经济困境。

根据计划，研究小组首先需要通过深度访谈、实地考察的方式，掌握崖口经济生产体系，了解村庄的自然资源和传统手工艺生产情况。下一步则尝试采用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技巧，在村庄组织参与式设计工作坊，讨论并起草可持续发展产品设计策略，并与当地村民一起讨论开展筹备社区生态旅游的工作坊。最终目标是帮助村民成立合作社，管理村庄的社会经济实践项目。

在崖口这样的村庄开展社会经济实践的项目，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说服动员村民参与。研究小组之前的工作主要集中于中国较偏僻、贫困的农村，没有任何在富裕农村开展项目的经验。目前准备在崖口开展的项目，若是放在一个贫困村庄，会形成强大的经济利益驱动，往往短期内即可集聚村庄的各种资源。而对崖口的大部分村民来说，

“钱”不是问题，村民不会因为“有钱”来参与活动，这些社会经济项目则因此丧失其最直观的经济号召力。而社会经济对于村民而言，是一个极新的概念，不能期望村民在短时期内就可以很好地理解和掌握。同时，由于“卖地”风波以及已经逐步展开的翠亨新区建设，一直将崖口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对于外来者，村民常常心存戒备，生怕卷入是非，因此所有的工作只有在不断地摸索中进行。

第一步，项目组需要选择一个“试点”。崖口有3000多人，分住在8个自然村，村庄之间的边界虽然已经模糊，但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沿袭、村庄内部成员的血缘关系等，各个自然村仍然多少保留其内在的文化特性。比如平山村是崖口谭氏族人的开村地所在，宗族文化氛围浓厚；杨家村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多从事小买卖，为人较为精明；等等。而陆家村人整体文化素质比较高，历史上读书人多，出过不少高官名人，孙中山的姐姐当年就出嫁到陆家村，老书记满叔也是陆家村人。与其他村庄相比，陆家村人热心公益的人多，每年端午节捐款数额在8个自然村中从来都是名列前茅，春节前全村人参加的“千人宴”也因此得以持续多年。而其他村子则因经费不足，举办过一次之后随即取消。而且，研究小组一位成员曾在陆家村居住，已建立起基本的社交网络。经过权衡，研究小组决定将试点建在陆家村。

第二步，需要确定村庄可供开发的自然资源。不过在这方面崖口似乎不是一个好的典范。村里可供开发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当地人原本有在田基、山脚采集药材煲凉茶的传统，但由于使用农药、除草剂，药材安全已经成为很大问题。能用来制作手工艺品的原材料也极其有限，包括稻草、蚝壳、竹、咸草。最后经过讨论、评估，项目组将目标锁定为稻草和竹子。崖口每年两季种植水稻，收割后稻草基本

上被村民用做燃料，部分被用做鸭舍鸡棚的垫料，利用效率低下。但是如何利用稻草？最简单的设想是以稻草为原材料开发草编工艺品。然而崖口没有草编传统，即使项目组负责开发出来技术，也需要在崖口建立一个承接的平台。因此，项目小组对于如何利用稻草发展手工艺品依然处于研究阶段。另一种原材料是竹。据说崖口的竹子曾经遍布溪岸山头，有的野生，有的是人工种植。那时每个村都有不少人编织粪箕、秧篓、鱼篓，以及春节时蒸年糕用的篮子。后来竹编作为副业不断衰落，对竹子的需求慢慢减少，今天主要被各生产队用来制作育秧棚。由于需求减少，竹子的数量也随之下降。不过研究小组依旧将竹子列为待开发的原材料，是因为考虑到崖口气候温暖，竹子生长迅速，如果未来开发，大量种植山竹不是问题。

颇费周折的是寻找村庄里的传统手工艺品制作师傅。在崖口，依旧记得竹编技术的大有人在，他们偶尔也会编织秧篓自用或送人。但要找到一个愿意与外界交流、尝试了解社会经济实践项目且有意愿有能力加入的师傅绝非易事。事实上，懂得竹编技术的师傅基本上都上了年纪，要么过着含饴弄孙的安逸生活，要么忙于照顾子女的小孩，常常无心也无暇参与项目活动。研究小组曾经确定了一名竹编师傅，但第一次活动后他决定退出，理由就是他没有时间。

倒是与村里另一个编织师傅的合作进展顺利。师傅会编“芦苞鸡”，是利用当地人端午节包粽子用的新鲜芦苞叶编织的。编好的“小鸡”肚子会填满糯米、咸蛋黄和猪肉，再放进锅里和粽子一起煮熟，就成了“芦苞鸡粽子”。尽管编织“芦苞鸡”使用的原材料不是研究小组已确定开发的稻草或竹，但“鸡鸡鸡，芦苞鸡，端午鸡”是很多中山人儿时的记忆。而且，师傅的女性身份，编织“芦苞鸡”的趣味性，以及体力

消耗小，都可以成为未来宣传、动员的有效手段。研究小组目前正在积极筹备下一步的编织手工艺工作坊，同时逐步在陆家村尤其是中青年妇女中开展宣传工作，希望通过邀请她们参加“芦苞鸡”编织工作坊，重拾本土文化记忆，并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重新认识本土的文化价值。不过，新鲜芦兜叶不易保存，因此项目组正考虑用其他材料替代，以便将来用以制作可商业化操作的手工艺品。

除了手工艺工作坊之外，项目组还计划通过设计，协助社区改善公共空间或设施。前期的调研显示，崖口村缺乏面向村民开放的文化资源。每个自然村都设有一个老人活动中心，但设施简陋，往往除了一台电视机、一张麻将桌，再无他物。有的村子连电视机都没有。陆家村的老人活动中心设在公庙，位于陆家村的中心位置，是一栋两层楼的水泥建筑。一楼是村里老人每日集聚的地方，但近年来其他村民也常来此处赌博玩乐。二楼是陆家村存放飘色道具与色袍的地方，制作于20世纪30年代绣有孙中山头像的头旗也存放于此。空间很大，但利用率极低。

但如何通过设计来改造二楼空间、改造后的空间如何利用，项目组需要进一步讨论。初步的设想是将之改造成一个多功能图书室，集阅读、培训、展示等功能于一身。陆家村人对孩子教育的议题十分关心，遇到镇上举办有关学习方法的讲座，村民会骑十几分钟的电单车载小孩前往参加。所以，如果以建造学生阅览室为切入口设立公共文化活动空间，应该能被村民所接受。这样的空间不仅可以成为外来资源承接的平台，比如外来志愿者举办的学生暑期培训班等，同时，该空间还可以与编织手工艺工作坊的活动相结合，室内设计，包括手工艺品的陈列，将成为向村民以及外来者展示崖口社会经济实践项目成

果的绝佳窗口。

不过，多功能图书室还只停留在概念阶段。接下来项目组将通过抽样访问、普查等方式做村民需求评估，还要与村民代表讨论项目的可行性。与编织手工艺工作坊相比，设立多功能图书室可能是一个更好地尝试整合村庄资源的契机。

任何一个到过崖口的人，莫不被它的美所打动：水天一色，稻浪飘香，鱼塘水面微波粼粼，劳动者忙碌的身影，伴随着轰鸣的新式收割机。这样美丽的景象象征着人与土地的和谐共生。但是它的前景怎样？悲观者有之，乐观者也有之。不过与想象相比，更重要的应该是行动。以社会经济项目的开展促进社会的有机团结，凝聚社区共同体意识，重新将经济发展嵌入社会关系，这应该是在富裕农村推动社会经济的首要目标。这样，在崖口人与土地和谐共生的画卷上，才有可能再添人与社会协调融洽的妙笔。

参考文献

曹正汉：《伶仃洋畔的村庄公社——崖口村的公社制度及其变迁》，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郭亮：《集体所有制的主体为什么是模糊的?》，《开放时代》2011 年第 7 期。

潘毅：《走向以社会经济为目标的城镇化》，《南方都市报》2011 年 4 月 3 日。

崖口村档案室：《崖口村资料汇编》，2007 年 10 月。

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崖口村档案室：《崖口村资料续编》，2010 年 4 月。

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崖口村资料三编》，2011。

《2006 ~ 2007 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http://doc. mbalib. com/view/eca056a75717ac6e9fe461d495 d09dfc. html。

第六章　山西永济市蒲州果品协会社会经济案例

香港大学　东莞理工学院　何宇飞　居　正

一　前言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令人瞩目，其主流发展大致遵循着西方式的“四化”模式即“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化”，亦可被转译成“工业化、资本化、城市化和现代化”（Wen，2007）。此“四化”引领中国经历高速增长，世界话语体系亦从“中国崩溃论”过渡到“中国威胁论”，这多多少少让中国人有些骄傲。然而中国同时走上了一条充满陷阱的道路：社会分化日益加剧，城乡二元分立严重，生态危机成为持续发展的重大威胁，大量农地迅速消失……在资本逐利的逻辑下，民生、环境、公益都要让道。

政府虽然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且出台了相关措施，却因各种因素难以执行。以 2007 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专业合作社法》为例，国家投入大量财政资金扶植合作社的建立，希望农民们可以在产销上组织起来，壮大市场谈判力量，通过农业生产在本乡致富。然而大多数政府资源被农村精英攫取。地方干部抑或生产大户作为

村社中的能者，自然在组建合作社的过程中起带头作用。但合作社同时也沦为地方精英的私人业务——农民不用直接附着在企业资本的产业链上，却在合作社里被大户控制，经济谈判地位依然没有实质性改变。

宏观上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好在一些社区内部自发的行动在寻找另类发展模式上已取得一些成绩，令人鼓舞。前身为蒲州镇农民协会的蒲州果品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正是这样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探索。经过12年的发展，协会始终强调社会公平的理念，不仅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也实现了经济上的自负盈亏和可持续。协会内部联结不断稳固的同时，也充分扩展各种外界联结，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整合，提供了农村社群构建另类经济发展的可能。

协会位于山西省运城永济市蒲州镇的寨子村。运城市位于晋、陕、豫3省交界处，为传统的农业大区。永济市为运城地区的一个县级市，除农业优势外，亦因此区为西厢故事的发源地而带动旅游业。协会由寨子村村民郑冰1998年创办，2004年正式注册为蒲州镇农民协会，2007年改名为蒲州果品协会。经过14年的发展，目前协会主要包括经济服务部和公共发展部两大部门，下属共18个业务板块。服务范围以寨子村为中心，覆盖周围43个村庄，截至2010年辐射总人口6220户25800人（蒲州果品协会，2012）。由于这43个村庄分属蒲州镇和韩阳镇，因此协会习惯称自己为“蒲韩社区”。两个镇目前共有可耕地约8万亩，其中责任田占40%，黄河滩地占50%，山地占10%[①]。出产作物种类繁多，包括小麦、玉米、棉花、苹果、柿子、

① 数据来源：蒲州果品协会：《蒲韩乡村社区简介》，蒲州果品协会内部资料，2012。

桃、樱桃、花椒、芦笋等。

经过近14年的发展，协会主体包括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两大部门。前者包括农资店、有机联合社、红娘手工艺合作社、城乡互助部、市场调研组、资金互助部等10个分部门，后者则包括生态家园、农民技术培训学校、妇女老人康乐中心等分部门。另有支持性部门诸如财务部、后勤部、协会办公室等。

二　合作的萌生

1998年，协会发起人郑冰还是一名乡村小学教师，空闲时帮忙打理爱人谢富政开设的农资店。她发现多数农民购买化肥农药时，不太了解实际生产需要，仅仅根据其他乡亲的说法盲目购买。于是她邀请农技专家为村民讲课，最初主要动员妇女们参加培训。之后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也为农资店带来了更多的收益。技术培训大致固定为每季度一次。

2001年，经常聚集在一起的妇女们又萌生了组建跳舞小组的想法。当时广场舞在中国内地的城市地区开始流行，一位妇女去城里走亲戚，看见城里妇女们每天热热闹闹地跳舞活动，回来就与村里的姐妹谈论。大家于是想：城里人可以跳，农村人也可以！特别是在冬季，农闲的时间大把，与其去看电视、打牌，不如跳舞，既能陶冶情操又能锻炼身体。只是这个活动的扩大范围出乎意料：利用农业技术培训在周围村庄打下的群众基础，跳舞活动逐渐扩大到30多个村！以至于后来郑冰不得不与其他姐妹们以“承包”的形式每人负责一个村或几个村去教当地的妇女跳舞。妇女们则感受到自己精神面貌的改

变——自己也能像城里妇女一样跳舞，展示自己的才艺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随后辩论小组的出现既有些戏剧化，又像是农民组织进行到一定程度的自然而然。跳舞活动中有分组比赛，但大家经常为到底哪一组跳得好而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影响互相之间的关系。当时正值全国大学生辩论赛热播，郑冰受启发，提出谁不服气评判的结果，干脆当场辩论：各队说出自己期望的结果和理由，通过辩论把争执焦点公开有序地摆出。胜负之分就通过集体协议做出大家都可以信服的决断。

思辨的趣味性与活动的公共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村民——大家不仅可以像城里妇女一样跳舞，还可以像电视里的大学生一样辩论！辩论赛议题也扩大到如婆媳关系、生男生女好等乡村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而活动还在进一步发展：村民们逐渐意识到要在辩论中树立自己的论点，并且拿出论据是需要做很多功课的。于是大家又组成了各种学习小组，在农闲的时候分组学习。如同辩论赛议题超越当时的跳舞比赛结果一样，学习小组的议题也超越了辩论赛，内容扩展到农业技术、农业政策、家庭教育（诸如婆媳关系、育儿经验）、文艺表演等。

于是，本来为了解决跳舞比赛争端的一个机制（辩论）就这样逐渐演变成了基层的集体思辨和集体学习活动，在锻炼了农民们的逻辑思维和集体议事能力的同时，也试图打破一些农村陈旧观念，帮助农民学习农技和政策知识。

2003 年，以寨子村为中心扩散的农民文娱活动达到高潮——郑冰和一些积极分子将 35 个村庄的 1000 多名妇女组织起来，在永济市参加元宵节集体表演活动。热闹的秧歌、腰鼓和狮舞表演中，这个一千人的大团体，丝毫没有乱了秩序。市政府领导观看后不得不打消之前

对她们表演与组织能力的疑虑，并称赞表扬。这极大地鼓舞了村民们的士气，建立自己正式组织的想法开始萌芽。

另一件鼓舞人心的大事是大家合力建好了村里的水泥路。寨子村以前是土路，到处是垃圾，下雨天道路泥泞肮脏不堪。由于各种原因村委会无法有效行使公共服务的责任。为了解决道路和卫生问题，平时参与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成立了“寨子村村容治理理事会”，挨家挨户发传单动员各家修理自家门前的一段路。绝大多数村民出义务工响应号召。公共路段则由理事会出钱修理。修路的工作只用了70天就全部完成，一共仅花费3万元。修理后的巷道，还设置了垃圾箱，村庄成立了老人卫生监督队，解决了垃圾乱倒的问题。

大家自己成立的“村容治理理事会”解决了村委会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士气，寨子村的农民组织实质上已经形成，这也让外村人很是羡慕。为了惠及更多村庄，进一步将农民组织工作系统化，2004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这个曾经自称为妇女活动中心的农民组织正式注册为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成为法律实体，经费来源主要是郑冰夫妇农资店的利润。

（一）初期的合作经济

协会成立后，开始引导大家发展合作经济。利用当地优秀传统文化和资源，协会先后组织手工艺生产小组、蒸馍作坊和涂料厂。在最初开办的合作企业中，郑冰就一直控制大户垄断的发展。据介绍，建涂料厂是几个村民在参加学习小组的时候提出来的，当时正值文娱活动和修理道路的高潮，大伙儿参与性很高。许多人愿意出高价购买更多的股份，但是被郑冰拒绝。大家不理解，郑冰便找到合作制企业和

股份公司的材料让大家学习："他出钱控股，我们大家全都是给他打工的，我们就是要自己给自己当老板。"郑冰提出300块钱1股，每户最多入3股，共300股，在入股不够的情况下各理事和协会会长们可以多入股，但也不得超过10股。此外她还提出向村里12户困难家庭每户赠送一股，资金由协会出。虽然因为管理问题，涂料厂未能继续办下去，但是我们看到"精英俘获"在这里力图被遏制。农村发展当然期待地方精英可以带头，但同时也需要郑冰这样的精英能够从长远、全局利益出发，认识经济与社会平衡发展的重要性，从而从"小我"的世界扩展到"大我"的立场。

合作经济的高潮是2005年的千亩生态园。在一次去南街村的考察学习后，协会的骨干们萌生了集中村民土地共同经营生态种植的想法。经过动员，协会一共集中了870亩果树地进行集体经营，大家共同推选了20个种植能手专门负责生态园的耕作。但是由于没有解决农业劳动中的激励问题，其他入股户将土地交托之后基本不管，20名种植能手无法了解所有土地的情况，以致影响农业生产。最终生态园的生产管理出现了问题。

（二）反思与调整

轰轰烈烈的舞蹈队、辩论小组和学习小组，代表着村民们的行动力。然而随后兴办的几个合作经济体却未能继续下去，加上原来支持协会的政府领导调任其他地方，新任政府领导对协会持保守态度，协会迎来了"内外交困"的一个低谷。然而"危"中有"机"，作为一个自发内生的农民组织更善于从危机中自我剖析，总结经验教训，亦如协会自我总结所述：

农村十年实践经历结合外部很多案例，让我们深切感悟到，单一项目可能成功，但会受农村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牵制，稳定性不够。而综合规划，以公共服务和经济合作为两大发展主线，既有各自独立操作空间，又有相互促进性，有效结合，方可避免矛盾风险，充分调动和整合社区内部资源，达到稳步发展的目的（蒲州果品协会，2012）。

2007 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实施，协会开始考虑利用农业合作社的形式进行新的发展[①]。2008 年，协会出台了新的十年规划。新规划分三个阶段，内容主要是建立一个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两项平衡的农民组织，同时也提出了具体策略的构想，如推进整个社区的有机农业、垃圾分类和整合妇女孩童老人服务等，最终达到社区环境、文化和经济的和谐发展。

从之前各种公共文娱活动的开展，到 2004 年协会正式成立，再到 2008 年重新规划，这期间有千名妇女元宵节进城进行舞蹈展示的高潮，也有村民一起发展合作经济的挫折，同时还有来自政府的外部压力。协会起起伏伏的发展脉络展示了宝贵的地方经验：农民合作的达成是多种活动的磨砺和不断创新共同促成的。其中不可避免会遇到挫折，但是农民们有能力自己解决。每克服一次困难，其实是又往前迈进一步，正如从跳舞活动衍生出的辩论赛，从辩论赛又衍生出学习小组，亦如合作经济遇到一些挫折后的反思和重新规划。在这个过程中，协会逐渐意识到经济和社会的互嵌，以及扩展综合服务领域的需要，并沉淀出自身独特的发展理念。

下面分别按照经济发展以及公共服务两大部门类别介绍协会的重

① 这一考虑的主要目的一是通过贯彻中央和地方对于合作社的支持政策，消除当地政府对协会的警惕；二是通过建立正式的组织将农民从经济上进行联合，真正推动合作经济的发展。

点板块目前的发展状况。

三 社区经济发展

（一）农资店

农资店由郑冰夫妇创立，开始完全属于私人产业。1998 年开始的农业技术培训给农资店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2001 年农资店已经开始利用赢利资助大规模的妇女活动。2004 年协会正式成立后，农资店被纳入协会，目前在蒲韩社区有 4 个分店。在手工艺合作社和城乡互动部赢利之前，农资店是协会最大的经济来源，支持协会日常开支和公共服务部门的运转。2011 年，农资店毛利 31 万元，上缴协会 7 万元，其余用来支付人员工资、股东分红和填平呆坏账（任小平，2012）。

协会正式成立之前，会长郑冰就开始了农资店合作化经营的尝试。在 2000 年左右，由于村里的一些经济项目出现问题，年底农资店的赊账款大多收不回来。经过调查，郑冰发现虽然当年农户们的经济效益受影响，但许多村民还是有还款能力的，只是因为看到别人不还他们也不愿还。于是她就想到如果把农资店变成大家的，每个人都感到店里的收益跟自己息息相关，赊账问题就应该可以解决。最初她动员了 20 户村民参股，每户 2000 元，按月分红，每月 3 分利。参股村民果然积极性高涨，不仅他们的赊账问题得到了解决，农资店的销售也进一步提高。可惜的是，向村民募股的做法曾经被当地一些金融机构污蔑为“非法集资”，农资店合作化的尝试在 2004 年暂时搁置。目前，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农资店鼓励预付款购买。即有意愿的村民可

以在农资店预付费用，多少由自己决定，购买农资时可以从预付款里抵冲。交预付款的村民和协会的会员可根据产品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以及年底的实物返利。

2004 年协会正式成立后，郑冰提出用自家的农资店来支持协会运转，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将农资店交给协会。对此许多人不理解，在一篇新闻报道里，郑冰谈道："连锁店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是我自己在操作，其实真正的收益来自我们协会的无形资产。"（佚名，2010）日本学者田原史起（2012）研究中国农村精英时提到，"公、共、私"三个领域都可以作为农村治理的资源。郑冰此举展现了中国的农村精英可以突破私利和小圈子，从以市场交换为原则的"私"领域扩展到中国传统基层治理资源——以互惠互利为准则的"共"领域，从而从经济资本的积累扩展到社区社会资本的构建。

从此，农资店的利润作为协会的重要经济基础支持了其他经济板块的诞生和成长，而这些经济板块在赢利之后又继续支持整个协会的运转和新板块的发展，使协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农资店所孕育的农业技术培训是协会公共服务的起始，它本身则是协会第一个也是目前来说最重要的一个经济部门。它是协会的起源，也是服务于协会的社会企业。

（二）红娘手工艺合作社

红娘手工艺合作社起源于协会成立之前的社区文娱活动。在一个剪纸比赛上，当时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们观察到参加者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有感于此，他们认为要把这些传统的晋绣与剪纸技艺传承下去，于是招募一些对传统剪纸有兴趣的中青年妇女，利用本社区内生

产的有机棉花手工纺线织布，并用这些土布制作成床单、被罩、衬衫、各种布包、布条幅等百余种产品。红娘手工艺合作社（以下简称红娘）在此基础上于2004年正式成立。它成立的最初目的正如它办公室墙上的一段标语所说："发源于黄河边的农耕文化同样展示给世人的又是一种自给自足的人文精神，但市场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人力资源失散，使传统文化后继无人……我们生逢在传统与现代碰撞的年代，义无反顾的就是要用我们的微薄之躯去寻回祖祖辈辈的生存之道。"继承并发扬传统文化，同时发展农民生计是红娘的一个宗旨。因此，红娘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单位，是融合了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等的一个综合体。

目前红娘已有纺线组、纺织组、缝纫组3个生产小组，8名全职工作人员分别担任会计、采购、质检等不同角色，30多名骨干负责管理不同的生产组，覆盖社区43个村。它是蒲韩社区唯一一个全部是女性的部门。

从一开始接受香港公平贸易的订单，到现在来自各方应接不暇的订单，红娘手工艺合作社已经能够每年赢利20多万元。有市场，就要扩大再生产，赚取更多的利润——红娘手工艺合作社也遇到了这种主流发展的逻辑陷阱，于是出现了一些利用闲暇时间纺纱织布的老人，为多挣一些钱延长工作时间而拼命劳作以至于病倒的插曲。老人的家属因此指责红娘，红娘的工作人员没有生气，而是开始反思：如果最初的理念是为了传承文化，快乐生活，如果协会的总目标不是赢利，而是打造"幸福社区"，有什么理由为了增加收入而损害农民的身体呢？从此之后，红娘硬性规定每位老人每个月只能纺1.5千克棉花。这是个有趣的规定，因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劳动的异化被农民们拒之

门外，人变成了生产核心与最终目的。

（三）有机联合社

有机联合社的前身是2005年的千亩生态园。由于将分散小农的土地集中、劳动集中的尝试没有成功，协会自2008年调整思路，将土地经营归还给各家各户，协会主要负责技术指导以及销售。在中国各级政府对合作社大力扶持的政策的带动下，2008年协会成立了40多个专业合作社，并在此基础上组合成联合社。各合作社按照作物品种成立，比如玉米合作社、小麦合作社、芦笋合作社等。社长基本上都是协会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各合作社规模为20～150户不等。推广有机种植是联合社目前的主要工作，借此联合社希望达到各合作社的“五个统一”：“统一土壤检测用肥，统一预防用药，统一选用种子，统一技术培训，统一达标销售”[①]。远景目标希望达到综合农业产品的深加工，实现有机食品的品牌运行。

目前联合社有专职工作人员10多个，服务区域覆盖整个蒲韩社区的43个村。实际上，联合社只负责生产环节，包括有机种植的推广和技术传播、有机作物生长监测、有机农户信息系统建立等。销售环节由协会的城乡互动部门负责。据联合社负责人介绍，大规模推广有机种植于2010年开始，有机种植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鉴于社区内癌症发病率走高，希望打造绿色农业，减少农药化肥对农民身体的伤害；二是协会也发现目前日益扩大的有机农产品市场可以成为致富的手段。目前联合会已经统计出蒲韩社区愿意或者已经进行有机种植农户的名

① 来源于有机联合社办公室墙上标语。

单。下一步的工作是巩固和扩大有机种植面积。

联合社的工作人员除了动员农民进行有机种植，还要发放大量有机种植技术资料，资料的来源之一是集体学习。每天早上，联合社的工作人员聚集在办公室讨论完一天的工作计划后，如果没有特殊安排就进行集体学习。学习的内容包括有机种植技术和农业政策。除了个人汇报自己的学习心得外，大家还会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对其他人汇报的看法。如同联合社一样，集体学习在协会其他部门也定期开展，因为“打造一个学习型团队”是协会的管理方式之一。

协会为了促进集体学习，从2012年8月开始准备每个月进行月考，考察各部门的专业知识和对农业政策的了解程度。以联合社为例，除了自己找的有机种植技术外，还要学习社办发放的学习材料。农民自己编的学习材料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在7月的材料中找到了中国合作社法的章程，还有中国合作运动的介绍。最令人惊讶的是，还有一篇关于合作运动历史的论文！不一定要有大学学历，农民们照样可以找到自己需要的文字材料自我教育。

（四）城乡互动部

农产品销售由城乡互动部负责，联合社在各品种收获季将社员（有机种植户）名单提供给城乡互动部，后者按名单收购产品。由于有机种植推广刚起步，协会也收购一些非有机产品和非会员的产品。

有趣的是协会对有机农产品的收购价基本等同于市场价，有时稍微高出一点。城乡互动部负责人向我们解释，这主要是为了避免价格争端。协会最初也曾提高收购价，但是少数农户见有加价余地，不断

讨价还价，希望进一步抬高价格，2010 年左右，协会曾为此和一户农户发生矛盾。最终协会未能按照农户的要价收购农产品，农户则据此认为协会不讲信誉，未能兑现收购承诺。经过类似的事件，协会强化了“金钱容易造成社区关系紧张”的理念，不再提高收购价。

会长郑冰在一个农民合作论坛上说：农村是生活的天堂，不是经济的天堂，“我们跟我们社员合作的时候，做有机农业不是为了多卖钱，是为了我们的环境”①。这与红娘手工艺合作社传承传统文化的初衷十分相似，经济的发展要照顾到社会性的目的。所以同样，如果是为了求一个好环境，建立幸福社区，就不能让价格的提高变成农民进行有机转换的唯一动力。那么如何激励农民提高劳动投入进行有机种植转换呢？协会目前尚在探索中，其中已有的策略是进行实物或者服务返利（分红）——每年实现利润后向农户提供低廉或免费的农机服务。比如，协会购买了 3 台农机，帮助农民秸秆还田、深翻土地和耙田。对于第一年入会的农户，每次每亩收取 10 元的费用（市场价为 30 元）；从第二年开始，坚持有机种植的会员农户免费获得该服务。这同时也促进了产中服务的一体化。另外，协会未来计划向农户提供实物返利，比如发放本地不生产的大米、茶叶等。

目前城乡互动部也在尝试将替代性食物体系中的社区支持农业作为一个新的产品销售渠道，实现直接和周边城市消费者的对接。未来则希望能够在城市开设自己的有机产品销售点以及超市。

---

① 参见郑冰在 2013 年第三届全国农民合作组织论坛暨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与生态农村建设研讨会上的讲话，http：//www. 365960. com/index. php? Rewrite = article - 15767. html&show_ at = 1。

（五）本土概念：内外循环的社区经济

协会在发展社区经济时，一直强调“内外循环”的概念。这个词是协会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总结的。内循环是指利用本区资源，使生产、交换和消费在社区内部形成通路，比如公共食堂利用本地的小麦蒸馒头供给员工内部消费，红娘手工艺合作社用本地的棉花和工艺织出床单可以当作员工们的福利发放，未来还可能作为对会员的实物分红。外循环包括两方面：一是同政府处理好关系，尽量获得政府的支持；二是通过合适的渠道实现与市场的对接。

棉花这一作物的流通最能体现“内外循环”的概念。协会的合作伙伴香港 X 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推动环保的企业，目前在大力推广非转基因和有机种植。按照其建议和要求，协会收购的棉花均为有机棉。去年一共收购 13.5 万千克，收购价为每千克 6 元左右。其中红娘手工艺合作社纺线用棉消化掉几万千克。红娘的棉纺织品包括协会定制的员工工作服、包装有机农产品的土布袋、销往运城的土布床单等，其中一半以上的产品销售给城乡互动部，通过城乡互动部销售到外地或者直接使用。这是协会内循环的一个缩影。

协会收购的大部分有机棉花均出售给 X 公司（有 20% 到 30% 的溢价），公司经过加工后将成品出售到欧洲有机产品市场。同时 X 公司也帮助协会从美国寻找有机棉种子并与协会合作开发有机种植技术。这是协会外循环的一个缩影。内外循环就像打通协会的任督二脉一样，两条线齐头并进，互相补充，降低市场风险的同时也能够扩大收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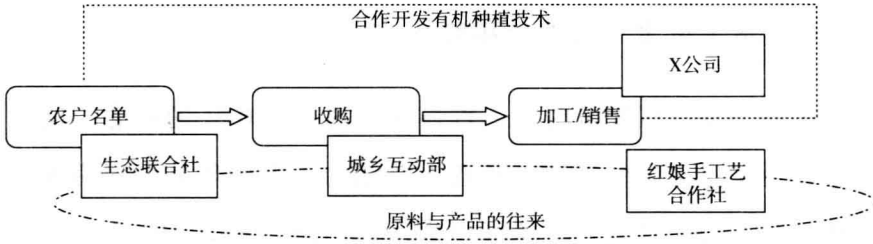


图 6-1 蒲韩社区有机棉花产业链

注：方框的虚线表示外循环，圆圈的虚线表示内循环

在 X 公司的帮助下，协会自己的实验农场目前已可以培育非转基因棉种，由联合社在产前免费分发到各个农户手中。外部资源的有效利用当然能够促成社区经济的发展，却不意味着要在市场大潮中将自己同化。多年来，不论政府部门还是 NGO 都曾表达给予协会资金和物质支持的意愿。但协会对外来资源一直持谨慎态度。2008 年协会成立 40 多个合作社，其中正式注册 28 个，根据当时的政策，政府对注册合作社有专项拨款支持。但是会长郑冰认为这并不是好事情：一是轻易获得太多资助容易滋生依赖情绪，很可能降低自己的工作动力；二是获得外界的资助之后往往需要受资助方的掣肘，有时资助方和协会理念并不符合，协会的决策会陷入尴尬境地。所以在 2008 年的合作社注册潮流中，郑冰当时就宣布协会之下的合作社 3 年不要政府的钱。一些不能理解她做法的合作社社长只能退出协会自己发展。但正是因为坚持经济上的自力更生，协会的城乡互动部以及红娘手工艺合作社才能够逐渐实现赢利，为协会独立自主地进入良性发展打下基础。

四 社区服务和培育

协会各赢利的部门没有仅仅止于利用环保理念或者传统文化发展农村生计，而是一直沿袭最初农资店支持整个协会的传统，利用利润支持各公共服务部门的发展——协会所有的赢利部门都需要将利润的30%作为社区发展基金支持非赢利部门。协会目前的社区服务包括技术培训学校、儿童教育、妇女老人康乐中心、生态家园、电脑图书服务等。下面主要介绍儿童教育和生态家园。

（一）儿童教育

儿童教育是在农业技术培训学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技术培训学校于2003年左右正式在永济市教育局注册，承接最初在农资店开设的技术培训，目前主要的工作是将学习资源系统化，为未来开设定期、固定的课程打下基础。

2011年协会开始尝试在培训学校中纳入儿童教育的部分，开发具有乡土特色的教育活动，并于2011年和2012年连续两年开办了暑期夏令营。由于是实验阶段，夏令营只招收协会员工子女。未来可能向一般农户开放。虽然大部分家长希望夏令营能够帮助孩子们补习功课，但协会最终没有走“学习辅导班”路线。夏令营的内容是野外运动、植物认知、花草栽种，让孩子们熟悉自己生长的农村社区并在环境中抒发天性。除此之外也有唱歌、书法等兴趣小组。孩子们还被带到红娘手工艺合作社，学习刺绣和绘图。这里值得探讨的是协会的教育理念：作为农民自己办的学校，课程设置不仅要体现农民的需求，

更要展现农民们的主体意识。正如郑冰在2012年学校夏令营汇报演出后讲道：

“我们大部分家长每天想的是怎么让孩子的分数提高，学习搞好，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长，也没想过到底要将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孩子本来应该在自己的天性中才能发挥创造力和潜力……我们在夏令营教孩子爬树、认庄稼，就是为了培养孩子对农村的情感。农村的教育应当为农村自己培养人才，并不是以后所有人都要留在农村，但一定会有喜欢农村的人。我们所做的是尽量让他们看到家乡的好处，长大了能够做自由选择。”

曾是乡村教师的郑冰对这一点认识深刻：在进入社会生产体系前，主流教育灌输的竞争和学习第一的观念已经开始了对人的异化过程，另类的发展模式应当从另类的文化体认，即思想重塑开始——不仅针对成人，更要从娃娃抓起。对乡土文化和农村社区的认知，才不会让受教育者囿于主流意识形态定义的“发达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才可能有真正做出个人“自由选择”的机会。

（二）生态家园

生态家园，起始于2004年寨子村的巷道卫生治理和道路修建。2008年协会重新规划后，将卫生管理工作纳入生态家园中，主要推广垃圾分类和统一处理，成本主要由协会负担。此举一来改善社区内的卫生环境；二来通过厨余、塑料等垃圾的分类，可以对资源进行重复利用。厨余垃圾配合协会的有机农业战略，作为堆肥；而塑料垃圾则卖给相关收购厂商，重新利用；其余不可利用垃圾则统一堆放在村中的垃圾站。

在协会的大本营寨子村，协会雇用两个员工每天打扫各巷道的卫生，另雇用一人每周六负责收集各家垃圾。此三位劳动者的报酬均由协会负责。此外，在征得村民的同意后，村中每户每月需要上缴一元的垃圾处理费。因为这项费用一个月一共就只能收上来两百多元，协会解释这一元钱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一方面弥补少量成本，更重要的是让村民们感受到这种服务和自己息息相关，是自己需要付出的，环保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

调查中我们碰到一些农户表示非常羡慕已经实施垃圾分类和统一清理的村子，希望能尽快落实到自己村。这说明农户对于这项服务是有需求的。协会除了做好寨子村的垃圾分类处理工作以外，在其他村主要靠村委会的配合，目前已经有 6 个村开展此项服务，由村委会动员村民并负责收缴每户两元的管理费，同时村委会也负责招募垃圾收集者并为其发放工资。其余各村还在推广中。这里协会主要起到的是理念宣传和资源整合的作用，并非亲力亲为。从寨子村开始将服务的理念和模式扩散，利用当地的资源达到目标，节省了精力和成本，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协会的其他公共服务部门如妇女老人康乐中心尚在探索中，目前已有两个成功案例，促成有老人照顾需求的家庭与愿意提供服务的劳动者对接。既应需求方之急，又为服务提供方创造就业机会。电脑图书服务部的功能兼对内外。对协会内部，它提供电脑技术的培训，促进协会办公的信息化。对外它一方面管理乡村图书室，另一方面为农民提供电脑系统重装等技术服务。

向农户提供公共服务，目的是尽可能在社区内解决他们的各种需要，比如技术培训学校传播农业技术、教导儿童乡土文化、帮助农户

在树立社区认同感的同时做到不离乡即可维持生计；再如生态家园通过动员农户进行垃圾分类，分离出可供有机种植使用的堆肥，促进社区再生产的良性循环。因此这些服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解决问题”导向的社区服务，而是力求在服务中在文化和经济两方面从整体上营造和更新社区。

五　团队成长

协会目前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团队建设模式，对于社会经济的规划和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协会相对成功的经济发展和打造“幸福社区”的理念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回乡服务协会。目前协会的工作人员在朝着年轻化转型，主要以女性居多。一位放弃城市相对高收入而在红娘全职工作的员工说道：“在城里工作，工资是高些，我以前是做前台收银的，后来还升了，可是干那个工作吧，就是觉得不开心，每天像机器一样！后来听说寨子有这个手工艺合作社，需要人，而且自己也喜欢做这些事，虽然钱不多，但是每天都很开心，感觉很有意义，还能照顾家。”“每天都像机器一样”是人对于拒绝异化的呼唤，是基层民众对于“以人为本”的需求，是主体意识的觉醒，也是一个另类的发展途径能够得以实践的思想基础。

（一）每天的开场舞

跳舞被认为是培养集体精神、展示自我和振奋人心的一项活动，是每个工作人员的必备功课。继承协会成立前曾经声势浩大的妇女集体舞传统，各部门每天早晨 8 点钟来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集体跳舞活

动，大家互相教着舞步，有说有笑，一天活跃的工作气氛也就这样展开。

从2012年8月开始，跳舞不再分部门进行。协会所有员工不论部门，不论男女老少，每天早上8点钟都集中在寨子村的一个巷道上一起跳广场舞，一般持续20分钟，之后大家回自己的部门工作。一位员工说："一跳舞我们就觉得活生生的，热血沸腾，精神状态马上不一样了。"男员工总是认为女性化的舞蹈动作不适合自己，但在会长郑冰的强烈要求下，他们也必须参与。郑冰认为，对男员工来说，这还是破除男女不平等观念的一种手段。

（二）到群众中去

协会的每个员工不管在什么部门，都要负责50～150户农户的工作。本着"分工不分家"的原则，农户工作既配合协会的整体战略，比如调研农户经济生活状况，动员进行有机生产、垃圾分类；也照顾到各个部门的实际需要，比如后勤部员工会向自己负责的农户购菜用做食堂原料，联合社员工向自己负责的农户发放技术资料，手工艺社的员工重点负责老人户，调查老人的需要。入户调研和入户动员是协会重要的工作方法，协会对此极其重视，目前选出6个工作时间较长的骨干，对年轻员工进行调研方法的实战培训。调查带队骨干王变娥讲道："农民有自己的想法，对于好的建议他们都是支持的，社区缺乏的是传播搜集信息，鼓励大家的组织者。"倾听其他农民的需要，好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只不过这里是一群最先被组织起来的群众到另一群尚未被组织化的群众中去，如此才能真正发掘农民需求与协会规划之间的差距，不断改进协会的服务组织功能。

（三）公共食堂

为了节约员工忙于家务的时间，协会于2009年开办了自己的公共食堂，并成立后勤部负责运营。每天中午，协会员工可以免费在食堂消费午餐，午餐标准为四菜一汤，主食也会米饭馒头定期轮换调剂口味。目前后勤部共有员工4名，每天的菜式由他们商量决定。食堂虽然规模尚不算大，但食堂厨房的卫生管理却比较严格，盆碗的摆放、清洁都有明确的规章制度。食堂的原料从本社区的农户收购，少量从青年农场获得。有时后勤部员工会专门去某些农户家采购特定的蔬菜，有时农户会打电话问后勤部是否需要自家的菜。后勤部每月的采购量在3000元左右[①]。

由于协会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知名度，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后勤部也承担为这些客人安排食宿的任务。协会的公共食堂未来可能向外界开放，可能以此为基础准备发展蒲韩社区的乡村旅游业。

六　实践的理念，理念的实践

在蒲韩社区，如果你问协会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大部分工作人员都会一口回答："打造幸福社区。"幸福二字的含义很广泛，让大家不用离家可以生计无忧并且奔上小康是一部分，让农户的社会交往需求、个人发展需求、教育医疗需求在社区内部得到满足亦极其重要。通过协会的工作，社区承担了这些职能，一方面减轻了农户的负担，

① 农村社区内部的菜价比较便宜，加上有从协会青年农场运送过来的菜，因此虽然公共食堂采购量比较大，但采购总额并不多。

另一方面也更能够了解农户的实际情况，提高服务的瞄准机制和品质。

协会的合作经济如各农业合作社、红娘手工艺合作社等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公共服务业也需要向社区更多村庄推进并探索更为稳定和体系化的模式。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由农民依靠自身力量发展起来的综合性农协，致力于打造地方的文化共同体和社区共同体。协会在十几年发展中沉淀下来的各种社会经济发展的理念亦是未来蒲韩社区腾飞的基础。我们真诚地期待在协会的努力工作下，蒲韩社区能真正实现公平公正并且可持续的发展，也能够为中国其他地区探索农村发展模式的努力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Wen T. J. 2007. Deconstructing modernization. *Chinese Sociology & Anthropology*, 39 (4): 10 - 25.

蒲州果品协会：《蒲韩乡村社区简介》，蒲州果品协会内部资料，2012。

任小平：《永济市蒲州镇果品协会调研报告》，《综合农协》，2012。

田原史起：《日本视野中的中国农村精英：关系、团结、三农政治》，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

佚名，2010 - 09 - 12，《郑冰：三千农民办农会》，http：//wiki. ngocn. net/index. php?doc - view - 105。

第七章　农户融资：山西蒲韩乡村合作与台湾农会比较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袁月兴　杨　帅　温铁军

一　背景与问题

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经济，早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全球市场化下的商品化和货币化进程。1988～1991年中国爆发滞胀型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农民收入连续三年增速下降，对外现金开支刚性增加[①]，迫使大量农户不得不依靠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务工的收入来维持生计，遂使劳务收入占比不断增大。据此，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价格也会因这种流动而产生外部劳动力市场化的对照，反作用于农业，出现“被动闲暇”现象[②]。这种城乡劳动力长期的流动，已经打破了原来的农村作为“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进入2000年，由于这种外部市场化而带动的农民生计货币化，商业化的小额信贷——通过占有其他要素收

① 董筱丹，温铁军：《宏观经济波动与乡村治理危机——关于改革以来“三农”与“三治”问题相关性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

② 刘怀宇、李晨婕、温铁军：《“被动闲暇”中的劳动力机会成本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益才能实现自身的高利率应运而生，客观上已经成为外部金融资本加剧农民困境的工具。本文通过大陆和台湾农会比较研究，指出小额信贷的问题所在，并探索农户信贷金融的另类方案。

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受启发于2011年印度发生多起农民因无力偿还小额信贷而自杀的悲剧。印度南部的3个邦因小额信贷机构贷款利率高，所以银行、私募基金和国际投资者都热衷于开办小额贷款业务。这种竞争导致小额信贷机构出现了重复放贷、强制收贷等追求短期利润的行为[①]，从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使其陷入更大的困境。国外经验教训表明，对一个乡村地区或者合作组织而言，完全依靠小型金融市场化地注入资金，并不能形成低度发展地区所需要的制度性资源。很多研究认为，农村金融应该通过内部化的制度安排把组织成本隐化，让农户融资可以内生于这个制度。

二 蒲韩乡村社区

以村庄共同体为基础的综合性合作组织——山西省永济市蒲韩乡村社区，在地域上涵盖了蒲州、韩阳两个镇43个村庄；其合作组织负责人郑冰把这个覆盖6220户25800多人口的地区称为蒲韩乡村社区（以下简称协会）。当地人均年收入在6000元以上，在中西部农村属中上水平，芦笋种植和外出打工是该社区的重要收入来源。

蒲韩乡村社区起源于1998年，蒲州镇寨子村村民郑冰夫妇创立的

① CGAP. Andhra Pradesh 2010：Global Implications of the Crisis in Indian Microfinance Focus Note 67 [R]. Washington D. C.：CGAP，2010. http：//www. cgap. org/gm/document - 1. 9. 48945/FN67. pdf.

寨子科技中心，从1999年开始在周围18个村中组织过果树、芦笋、玉米、棉花、养鱼等各类免费技术培训。2004年6月7日在永济市民政局注册成立“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之后更名为“蒲州果品协会”，开展农资的共同购买，为加入的会员提供免费培训、价格优惠及赊账、年底按交易额分红等服务。

从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和组织化降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农资联合购销与协会向综合性合作社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它一方面能够累积一定的剩余支持其他多元化的非经济板块。如，在寨子村开展了妇女文化活动，以健身秧歌、演讲、辩论等推动多元文化生活；还组织有手工艺特长的妇女成立红娘手工坊，传承工艺之余也接受海外支持公平贸易的订单；为了达到村容整洁，协会还做起了垃圾分类与回收的工作。另一方面，多元文化的活动促进共同体成员自觉形成提高组织化的共识，以农产品分类建立专业合作社，进而以专业合作社组建联社为平台做培训，大幅度降低组织收购的交易费用。

从乡村治理角度看，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以血缘地缘为基础聚落而成的小农村社，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利益共同体”[①]，具有成员间认同的文化伦理体系。传统的社区精英是社区共同利益的代理者，其权威来自个人经验、能力与社区舆论赋予的威望。但现在的农村基层组织大部分缺乏动员原子化的农民的组织能力。自改革以来，农村社会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去组织化过程。一般而言，农村弱势群体，特别是老人和妇女，因为占有资源过少难以产生剩余，难以支付自我组织化的

① 张静：《历史：地方权威的授权来源》，《开放时代》1999年第5期。

成本，因此处于更为弱势的境地。

同样道理，协会面对一盘散沙的农户也需要支付组织成本，才能重新建构共同体。正是因为协会开展多元化的社会文化活动，才使成员之间发生的信息共享，降低任何组织化成本。虽然协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人力与资源存量较低的老人、妇女，但在社区里还是能够产生一定的组织网络，形成多样化社会资源。因此这个跨 2 个乡镇的协会是一个综合性的合作社组织——有 3865 户成员，766 个小组，12 个工作板块，7 个工作片区，35 个核心骨干，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固定资产，有多种经营业务的盈余返还。以这种合作社作为经济基础，能够对接体现民生新政的上层建筑改革，但难以满足“公司化政府”占有“三农”剩余的经济规律。

三 综合性合作社与金融对接

近年来，小额贷款公司的增长速度惊人，截至 2011 年 11 月末，全国小额贷款公司数量突破 4000 家，但大部分都设在城镇，以服务城市人口与个体户为主。永济市富平小额贷款公司（以下简称富平公司）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把资金直接批发给蒲韩乡村社区合作联社，使后者在村庄里面对农户做小额贷款的零售业务，富平公司因借助当地村民组织体制及运作上的支持而节约零售成本，直接获取批发利润。

山西省永济地区的农村经济以种植、养殖为主，形成了以棉花、水果、大棚瓜菜、畜禽养殖、芦笋等生产贩运农产品市场，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因而对资金的需求非常旺盛，也意味着为小额信贷业务提

供了广大的市场基础。一直以来，永济农村金融市场虽然存在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多家正式金融机构，但在村内更多还是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来解决农户需求。

根据富平公司的宣传资料，贷款的额度分别为基本贷款额度（1000～30000元）与大额贷款额度（30000～50000元），平均每笔贷款余额约15100元，期限为半年至一年，月利率为1.75%（年利息为21%）。贷款用途包括养殖业、生产投资、经商、建房、婚丧嫁娶、教育、医疗及家庭消费性贷款等。公司收取手续费，每笔贷款3万元以下收100元，3万元以上收300元。还款方式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以家庭作为贷款服务对象，已婚需要夫妻二人共同申请，未婚的由父母或者直系亲属共同申请，承担相关责任。

截至2010年9月10日，富平公司累计已服务贷款客户2300余户，发放贷款2500余笔，金额近4000万元，贷款余额约2500万元[①]。据介绍，从开业到2011年底，累计发放的贷款余额8000多万元，贷款客户累积5000多户，没有坏账。

何广文等学者曾于2010年5月对富平公司进行调研，提出“本土化、信息充分与对称，是公司贷款风险控制的基础”[②]。由于信贷员来自当地，客户也来自小额贷款公司所在的乡村，信息对称，能够有效避免贷款过程中的逆向选择，同时避免道德风险，在一般情况下风险是可控的。同时，利用了熟人社区中的村庄规范与村庄信用等要素和村庄内部的诚信机制。这些非外部加入的制度因素，才是永济富平小

① 山西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http://www.fdi.ngo.cn/index.php?id=411。

② 何广文、杨虎锋、张群等：《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怎么实现对于农户和微小企业的服务——基于山西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案例的分析》，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8201.2011。

额贷款公司获得成功的最主要的因素。

笔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其所依托的乡村社会组织已经承担了前期组织成本，这是降低公司进入成本的关键因素。就村一级小额贷款公司而言，信贷员是其最大的开支，也是公司之间竞争的最大的资产。从2009年成立之初，协会在蒲韩乡村社区抽调了11个骨干充任富平公司的初始员工，他们秉持协会特点，把工作“做到田间地头”，除了早晨员工例会，日常时间都在老百姓家里，不仅对农户收入，而且连夫妻婆媳关系、子女教育等都要摸清楚，才能判断农户的资金流向、真实贷款需求等。与其他小额贷款公司比较，蒲韩乡村社区的信贷员在客户信息搜寻方面有很大优势。他们跟农户的密切关系，形成利用共同体内部化处置风险的组织基础，才没有商业银行与客户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的困境，因此可以有效防范道德风险。

总之，资金只是一个外来的要素，整个零售贷款业务的运作机制，都借助了乡村社区10年来再造的共同体作为它的运作基础，所以才能在信息收集与风险防范上体现了一般商业化的小额贷款公司不具备的优势。

可见，商业金融机构可通过将规模资金批发给多功能的社区合作社的方式获取收益，而把零售业务交由合作社内部化运营。

四 比较案例

台湾地区的农会已经有百年的发展历史。由历史的角度观之，台湾农会延续了日据时代的“工业日本、农业台湾”作为日本粮食生产

与原材料供应基地的发展策略。

农会是台湾地区最大的农民组织。至2005年，台湾地区共有农会289家，拥有会员179万人，正式农民会员99万人，占会员总数的55%，赞助会员有80万人，占会员总数的45%，这个农民组织还提供了16594个工作机会，平均每个农会提供58个就业机会，无论从人数还是组织来看，农会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绵密的组织网络。

农会为农民提供从生产到生活的共同资源，同时推动金融、购销、推广、报销等多样化服务。为此设立有信用事业部、运销事业部、推广事业部、家畜保险事业部等，使其具备经济性、服务性、教育性、社会性，并承担政府的政治任务的多元功能。农会具有在经济领域的盈余不必通过政府税收及其二次分配就直接资助农会的教育功能，也可内部化地提供生产技术、家畜保险等服务，为小农分担生产与生活的风险，通过社会化的服务也提供了组织载体，让政治任务得以传导到农村。整体而言，以农会的架构得以让经济功能在组织内循环，为小农社会创造了剩余，农会组织与农民所形成的独特信任与根深蒂固的网络关系，不仅有助于农业政策的执行，而且这种以社区性的多功能合作社作为经济基础支撑的乡村治理，也是农村社会政治长期稳定的基石[①]。

台湾农会多功能的社会经济组织特征及其所创造的社会资本，两者间有循环与再生特征，社会资本既是农会逐渐发展出的公共财产，也起到维系农民，强化农会的作用。

---

① 廖坤荣：《台湾农会的社会资本形成与政策绩效》，台湾：《政治科学论丛》，2004（22）：181－219。

五 台湾农会的内置金融分析

农会的经济功能以信用部为轴心，农民与农会的经济关系可以说是“有钱存农会，没钱找农会”。信用部不同于一般的商业银行，不仅给农民提供贷款，也是农民的融资机构，推进农业的产业化发展。

1949 年时的农会以推广为主，供销以及信用业务没有很多开展。直到 1952 年后，台湾的经济转向工业化，需要改组农会，支持农业发展。此一时期，农会的推广、信用、购销方面的业务开始逐步增加，但以信用的业务扩展最为明显。信用部办理存款业务、放款业务、代理业务等，帮助农民融资，其所得盈余用于农会内部推广、文化、福利、保险、农民教育等。

随着经济发展，农会信用部的存款逐年增加。以 2005 年为例，全年存款达到 12472 亿新台币，其中会员的存款达 5536 亿新台币；就放款而言，信用部整体对会员放款达 2710 亿新台币，占总体放款的 49.2%[①]。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农民到一般的商业银行贷款较难，信用部的贷款服务与农民遂成为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此外，农业放款的类别中，比较特殊的是“农业发展基金”，包括农业基础建设、购买农业机械、购买农地、兴建农宅等放款。虽然台湾也有专门的农业金融银行，如“中国农业银行”、合作金库与土地银行等，但是，农民的资金需要规模一般比较小，缺乏市场化的抵押品，所需求的农业融资一般银行无法匹配。农会在全台湾岛上的各

① 2004 年台湾地区各级农会年报，21 - 22，http：//www. farmer. org. tw/% E5% B9% B4% E5% A0% B1/93% E5% B9% B4% E5% A0% B1/yearbook. htm。

个村落、偏远山区等都设有金融服务。农会信用部也代理各项金融服务业务，如办理保管箱业务、汇款结算、公共服务收款等。所以，农会信用部实质上扮演了一个农村金融全方位的角色，这些都是专为农民而设，为一般银行所无的地方性金融服务，其业务是以“小农”为出发点。农民从生产到生活的所有融资，都可以从农会得到满足。

基于多功能的设计，农会除了信用部以外，其经营范围还包括供销、运输、会员共同利用等业务，以及其他加工、制造业务。因此，农会组织与其拥有的生产设备，对调节以小农为主的金融、生产、运销与推广等，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因为如此，农户成员在农会内部通过多种业务形成信息共享，使得信用部有条件无成本获取农户信息。这种对农户金融风险的内部化处置，不是完全一般市场化的操作。

社会资本形成的一个前提，是能够有共同的资源。根据农会法规定，农会须在盈余中提留农业推广、训练与文化、福利事业等经费，且不得少于总盈余的62%，这些资源都成为农会的农业教育投入。长久以来，信用部与其他生产性的服务部门与农会成员非纯粹的经济性与非纯粹的市场化的金融关系，与其能够累积巨大的组织公共资源与相应的社会资本是正相关的。

六　结论

在商业化运作的金融体系中，至少要求获得社会平均收益率的资金要素，基本不会“光顾”利润微薄、远低于一般产业收益率的小农生产领域，而且，收益低下的农业生产者也难以应对巨大的市场波动

风险，因此，在完全市场化条件下任何所有制的小额信贷进入乡村，都只能靠高利率支付内生性高成本。

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大多数贫困社区，资源禀赋差、人力资本存量少、资源空洞化的情况更为严重，难以单靠农业生产来获得稳定的收益。而从蒲韩乡村社区与台湾地区农会的经验以及本土诸多乡村共同体重新建构的试验比较来看，只有发展集金融合作、供销合作、专业合作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合作组织，把规模运作的金融机构与分散小农户之间过大的交易成本，通过高度组织化的农民组织内部化机制予以消化，才能够缓解“三农”的资金瓶颈。

第八章　妇女、手艺与合作经济

——一个西南村落的实践案例*

香港理工大学　古学斌

一　引言

自2001年3月起，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云南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和云南省师宗县政府一起推动了一个名为“探索中国农村能力建设的灭贫模型——云南的个案研究”的行动研究。项目所在地的平寨村位于中国西南地区云南省的东北部。它拥有大约300年的历史，是由8个自然村寨组成的一个行政村，面积约占23平方千米。村子只有一条机耕路通往外界。村子的居民主要是壮族，也有少数的汉族。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全村壮族和汉族加起来共有347户，1469口人。因为村寨里的人还不能完全达到温饱水平，依旧挣扎在贫困线以下，所以村子被官方划为贫困村。一般情况下，每年有超过20户人家缺粮4个到6个月。根据平寨2006年8月提供的资料，大概有16户人家44口人因为过于贫穷而被免除了所有的农业税。此外还有62

* 这个研究专案分别得到了香港RGC研究拨款（专案代码：PolyU 5491/09H）以及香港理工大学研究课题（项目代码：1-ZV93）的支持。

户人家约285口人因为严重的贫困在那一年接受了粮食救济。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很多村民，尤其是在山上只有贫瘠土地的两个汉族村，许多人不得不借高利贷买粮食吃。很多孩子也因为贫困失去了上学的机会。鉴于平寨村是县里最贫困的村子之一，当地政府采取了三项本土政策——“冬季农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高科技农作物推广”——作为减贫的重要策略。

像中国其他农村一样，平寨村在后改革时期也在经历巨大的变迁。在主流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农村的经济越发市场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越发城市化，这一过程其实为农村带来了深重的影响，其表现在市场经济导致村民面临日益严重的生计问题，城市消费文化也破坏了农村的传统文化，出现文化认同的危机[①]。有鉴于此，我们探索着如何回应村民在生计方面的要求，同时能让农村的经济发展变得可持续。笔者觉得应该将经济和文化结合起来推动一个新的项目。

在2005年，受到公平交易发展理念的启发，我们启动了一项称为“设计与发展”的行动研究，试图开发本土的传统文化和手工艺产品，一方面使得在地妇女能够有生计的改善，同时也保护和再生了在地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第一次跨学科和专业的合作研究，我们和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进行合作，希望设计师能跟我们一起利用当地材料和本土手工艺来打造富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艺产品，通过公平贸易的途径，让妇女们能够得到合理的报酬，同时透过经济的赋权达到性别和文化的赋权。

---

① 这种情况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Wilson & Dissanayake，1996）。

二　传统手艺和妇女发展：能力建设和赋权的行动

根据世界劳动组织的报告，世界上5.5亿的穷困劳动者中60%是妇女。妇女做的无薪工作两倍于男性。她们代表了世界兼职和非正式部门工作者中的绝大多数，失业率也比男性高出许多倍（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2006），因此妇女发展是很多发展机构的主要目标。

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妇女一样，平寨村妇女正在经历着贫困。为了增加家庭的收入，她们从早上忙到晚上，还是无法应付家庭日增的开支。自2005年开始，在村子里我们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妇女追随农村外出打工的浪潮，到煤矿或城市的工厂里打工。虽然她们实际上不希望离开家乡，就像一个中年妇女告诉我们的那样："我实在不想去，如果我能在村子里挣个几千块钱来支持我孩子的学费，我就不会去。离家真让人伤心。"

平寨村的妇女承受了抚养下一代的最重要责任，并愿意贡献她们的每一分钱在孩子的教育上。她们还是家庭中的情感支持者和照顾者。当母亲被迫与孩子分开，远离家乡到城市里实在是让人悲伤的事情。也因为母亲的离开，没有人照顾老人和孩子，这些家庭常发生悲剧。即使是年纪大点的孩子也感到悲伤，因为他们只能在母亲一年一次回到家过农历新年时才能见到她们。在村子里，这些景象让我们感到应想尽办法，回应妇女们的需要。我们前后尝试了不同的增收项目（例如养猪）来帮中年妇女增收和提高生活水平，希望通过经济的赋权达到文化和性别的赋权。

我们的团队主要由人类学者和社会工作者组成。我们都持守着一种共同的视角，那就是小区民众的能力和资产建设（capacity and assets building）。能力建设的视角背后是相信在地小区的民众不管是贫困还是边缘群体都拥有她们自身的能力，只是这些能力常常被隐没和没被发现（Saleebey，1997；Sherraden，1991；Tice，2005；Templeman，2005）。资产和能力的建设的框架说明我们从优势的视角看待在地小区，看到的是其隐藏的各种资产和力量，而不是盯着他们的缺陷、问题和无能（Ginsberg，2005；Lohmannn，2005；Collier，2006）[①]，就像斯科尔斯（Scales）和斯惴特（Streeter）指出的那样，农村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是“去揭示和重新确定人们的能力、天赋、生存策略和激情，以及小区的资产和资源”（Scales 和 Streeter，2005）。所以我们的角色就是致力于赋权农村小区，以创新的方式发掘和利用在地的资源，创造出新的资产。协助民众寻找和决定自己小区发展的方向。在平寨，我们认识到平寨有丰富的文化资产，妇女刺绣手工艺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决定通过推动妇女手工艺项目来提高妇女能力，通过增加她们的收入来保存村民的文化认同。以下部分是我们走过的一些历程。在当中，发掘和提升小区能力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希望从个人和小区的能力建设达致小区的变革。我们也理解到能力建设意味着对人力及其组织的长期投入，所以从 2005 年开始，我们发展妇女刺绣小

① 能力建设的模式已经被广泛运用于社区发展的项目里头，以建立个人和集体的能力（见 Moyer 等 1999；Li 等，2001）。与“赋权”“参与”和“性别平等”等概念一样，能力建设被认为是所有可持续的和民众中心的发展模型的基本组成因素（见 Eade，1997；Plummer，2000）。在我们对能力建设的理解里，我们基本的信念是所有人都有权利平等分享资源，作为自身的主人掌握自身的发展和命运。对于这种权利的拒绝是贫穷和痛苦的根源。增强人民在选择中的决策能力以及采取行动达到这些目标是发展的基本所在。

组，陪伴她们走到了今天。

三　口述见证（oral testimony）与手工艺文化含义的发掘

项目的开端，我们的重点工作放在发掘传统刺绣手工艺的文化意义。因为我们知道，只有明白了刺绣手工艺与妇女生活的关系，我们才懂得去欣赏她们的文化，欣赏她们的手工。

在方法上，我们选取了口述见证（oral testimony）。口述见证是推动小区参与发展的另类手法，也是一种另类的参与性农村需求评价（PRA）手法。它除了说明我们收集资料外，通过口述的方法，我们还可以聆听到超越主流话语之外的声音，发掘那些在小区被压制或者隐藏的问题。更重要的，口述也是小区弱势赋权的手法，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路径，让边缘的民众自己发声，讲述自己的故事和见解，从叙述自身生活经验的过程中召唤被遗忘的主体。口述故事也能帮助我们发现和理解一些小区共同拥有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利用小区的资源来重建小区。[①]

口述故事的收集也是小区民众发动和参与的途径，因为故事收集是民众最能掌控和运用的手法。我们所在的少数民族小区，民众大部分不会汉语。面对语言的障碍[②]，我们只有邀请民众一起参与故事的

---

① 我们在贵州已经尝试过口述见证的方法，觉得非常有效，可参考古学斌和陆德泉（2002）的文章。口述见证和口述历史的方法可以参考 Slim 和 Thompson，1995；Perk 和 Thompson，1998；Yow，1994。

② 当地人说壮族方言。只有很少的年轻村民或者受过教育的成年人可以说汉语——普通话。因此，我们很难与当地居民进行直接交流。一方面，这是我们的不利条件；另一方面，这却成为我们的优势，因为我们不得不保持谦虚，并且与受过教育的当地居民保持密切关系，后者经常成为我们的翻译。

收集，才能够完成这项工作。2001 年我们在小区已经做过一次大规模的口述故事收集，并且与村民一起编写了《平寨故事》一书。2005 年我们再次做妇女手工艺的口述，一切显得驾轻就熟。我们和小区的妇女一起，在不同的寨子访问老妇人。老人家给我们讲述了自己的生活故事，她们一生为生存打拼，虽然辛劳但也看到她们的生存策略和智慧。她们还告诉了我们关于刺绣和手工艺的事情，讲述她们如何纺线织布、如何绣花、如何自己制作衣服等。在老人的房间，还保留有织布机和纺线的工具等，她们还给我们示范这些手艺。在半年的口述收集之后，我们基本能把握过去平寨妇女手工艺制作的整体生产过程，以及这些手工艺背后的文化意义。

在平寨村，所有针线活中用的布料都是他们自己纺织的。过去平寨妇女从小就被教导传统的刺绣。她们纺自己的布和纱，用天然的矿物和植物来染布，制作自己颜色多彩的衣服和装饰。在老人的记忆中，她们以前是自己种棉花的，可是由于土地不够，平寨已经很久不种棉花了。如今她们从市场上购买带着不同颜色的棉线，然后近邻和亲戚一起帮忙拼线，用手工织布机纺织自己的七彩壮锦。虽然还有一些老人懂得用自然的花和植物染布，但现在多数的妇女只用市场上买来的化学染料的布。

妇女们通常会在自己的衣服和日常用品（譬如鞋子、背篼等）上绣花。她们绣花都必须在纸上剪下样子，然后在上面刺绣。她们的颜色和图案富有民族特色，手工非常精致。刺绣是妇女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妇女引以为傲的手艺。妇女琴就告诉了我们她自己的故事。

>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看到大人做针线活，我很羡慕。当我放牛时也带着妈妈的针线盒。我学着剪刺绣的样子。那时，树叶

就是我的纸张，野花和大自然就是我的图案。

另一个妇女琼也说道：

当我干完田里的耕作和家务活后就坐下来刺绣，这时是我最享受的时光。在孩童时期，为了学着剪绣样，我从弟弟的课本上撕下了很多纸。

平寨妇女的刺绣图案主要是花朵和其他她们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得到的东西。妇女小组带头人凤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她们只是设计和绣花儿：

我们几乎不绣其他东西，像动物。原因是我们常常在山上看到花儿。我们几乎碰不到什么动物。之前山上的植物很多，所以我们记得的都是大自然的东西。我们有很多花的图案。妇女总是绣那些长在地里的四叶花。我们以前不用化肥，田里很多。每当分地的时候我们就去找长这种野花的田地。每个人都争着要这样的地，因为长这种花的地肥育。这种地里种稻米不用化肥也长得很好。但是，最近这些年花儿都被农药杀死了，它们再也不长了。

就是这种花，我们叫它猫头鹰花。我们都绣这种花。这种猫头鹰花可以保护我们的庄稼。老鼠来吃我们的庄稼。我们种这些花来保护谷子。所以这也是保护庄稼的花儿。

通过口述故事，我们和其他参与这个口述收集的年轻妇女建立了稳固的友谊和合作关系，我们有了共同努力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年轻的妇女有机会听到村里老人的故事，并理解传统刺绣的意义。这

是一个教育、赋权的过程，妇女们重新发现她们自己文化的根，重新明白这些手艺的价值。年轻妇女表示对老人们的尊敬，并且开始对一代代人传下来的文化遗产产生了兴趣。此外，老人也重建了自信心，通过讲述自身的生命史以及和年轻人分享村子的历史与传统文化，她们找回了自己的能力和骄傲，后来老人们也成立了小组帮助恢复老布的制作。

口述故事收集之后我们还组织了分享会，我们都觉得刺绣是一个重要的资源，有几个妇女非常积极地要成立小组来推动刺绣产品的制作。看到她们的积极性，也看到她们刺绣的精美，我们明白妇女手工艺项目的可行性，于是决定进到下一步小组的发育。

四 妇女手工艺小组的发育

在评估了妇女手工艺小组项目的可行性之后，发现工具和材料在村里方便可得，我们决定组织一个妇女手工艺小组，因为我们相信增强合作是妇女能力建设和赋权的关键。我们想挑战强调个人主义和竞争的主流发展思维，希望通过手工艺项目推动一种新的集体合作形式的经济模式。我们从平寨之前妇女发展失败中汲取教训，决定小规模开动项目。在与妇女积极分子商量之后，我们决定了项目的目标：通过发展刺绣手工艺产品，增加妇女的收入来支持她们孩子的教育；推动新的合作主义和妇女参与；通过经济的赋权提升平寨妇女的能力；保护平寨的传统文化和提升在地的文化认同和自信；提升消费者的绿色消费和公平交易意识。

我们和妇女领袖凤一起，到各寨子寻找刺绣技术好的妇女，邀请

她们加入妇女手工艺小组。我们帮助召集了几次小组会议，解释妇女工艺小组的理念和运作方式。妇女特别是年纪较大的对我们的合作经济形式没有信心，因为集体化“大锅饭”的记忆犹新，同时妇女也担心市场，总觉得自己绣出来的东西城市消费者不会喜欢。虽然我们不断地解释合作的重要性和保护传统文化的可行性，也不断保证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寻找市场，但是最终，只有 7 个妇女愿意参加妇女手工艺小组。

我们并没有因这个状况而灰心，因为我们明白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农村改革，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下，很多农业生产只在个人或单户的基础上合作。农民除了婚礼、葬礼和新年之外很少合作。每户都在自己那块责任田劳作，并没有合作的文化（Ku，2003）。我们也知道如果合作想成功，就必须通过不同的培训和活动来建设妇女的能力。

作为小区发展的协作者，我们通过不同的手段促使妇女发挥她们的主动性和动力。我们协助妇女组织会议并讨论妇女手工艺合作项目的年度计划。我们也承诺给予妇女启动基金贷款，用于购买材料和工具，并支持她们去昆明等地学习参观的。

五　设计和生产过程中的能力建设

为增强平寨妇女手工艺产品市场形势的意识，2006 年 9 月，我们支持妇女小组中的一些成员到著名旅游景点石林去参观旅游手工艺市场。石林的大部分旅游产品都由彝族生产。平寨妇女探访了当地一家妇女组织，参观了她们制作的旅游产品的类型和她们的手工艺术。她

们同彝族比较了针线活中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她们讨论了市场价格，并走访了旅行社的人。在第一次市场考察之后，平寨妇女们得出几个结论：这些手工艺产品质量很差，市场价格太低；她们刺绣的风格和技术是独特的，不同于彝族；旅游产品是机器生产的，她们的却完全是手工的。这种考察增加了平寨妇女对市场的了解，也增强了她们的信心。她们从比较当中发现了自己刺绣技术的优势。

2006 年 10 月，我们的工作人员带了一些她们的刺绣产品到昆明，进行了一些市场开发。我们找到了产品设计师，跟他一起探索如何把平寨的刺绣设计成不同的产品。我们看到平寨妇女们刺绣的精美，相信如果可以开发出一些精美的刺绣产品，一定可以得到懂得欣赏的消费者的欢迎，到时不仅妇女可以有所收入，也可以保护壮族的传统手工艺。设计师利用平寨妇女的绣品设计了四种产品——布制书皮、贺年卡和礼品卡、刺绣镜框和抱枕套。我们把这些样品带回平寨村，妇女们都很高兴，她们兴奋地看到自己的刺绣竟然可以变成家居用品和装饰。

我们强调设计者的参与但同时看重在地妇女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因此，原则上设计者并不改变妇女刺绣的样式、色彩和风格。设计者只是用妇女做出来的刺绣产品帮忙设计一些产品。我们也让妇女学习自己成为产品设计师，尊重妇女对产品的选择。我们告诉妇女们，如果一些产品对她们没有意义，她们可以随便放弃这些款式。专业设计师的参与只是为了启发妇女的创造力，从设计师那里学到一些观念后，妇女开始创造她们自己的产品。那几样设计师的产品，妇女们可以接受布制书皮、刺绣镜框和抱枕套，但她们不喜欢贺年卡和礼品卡，因为这不是她们的文化，她们对此不熟悉，认为它没什么用。

2006 年 9 月，我们和妇女小组一起制订出生产计划，并逐步落实。但是，当她们从市场中购买绣线和布料等原材料，一切准备工作都完毕时，她们突然间告诉我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明白这是妇女缺乏信心的表现。于是 2007 年 1 月我们带领平寨妇女再次外出拜访另一家刺绣妇女小组，与其妇女小组带头人和组织成员进行了深度的交流。那个组织建立了 3 年，并有 3000 名会员。这个协会组织从外面的工厂获得订单，然后把工作分给会员。她们的产品销往上海、北京和东南亚。会员的平均年收入有 2000 ~ 5000 元人民币。这个刺绣小组的成功故事再次给了平寨妇女信心。

回来之后，我们跟平寨妇女一起做了总结。这次访问的组织还是属于彝族，她们的针线活很不错，但她们的针法跟平寨是不同的，属于十字绣。平寨的刺绣是先用剪刀在纸上剪好图案，然后把剪纸放在织布上，然后一针针地绣。刺绣的效果是凸面的，跟机器做的很不同，机绣是平面的。她们也学习到这个组织一些宝贵的经验，譬如她们组织内部的分工非常细，有 3 个姐妹负责跑市场，有负责做账的。她们还规定在农忙的季节不做刺绣活，只有会员才能从中分到订单的活。她们运作的方法也很简单，她们得到订单，然后定好价格，会员过来拿活，完工之后送回产品。这是合作的一种方式。

实地的走访开阔了平寨妇女的视野，并增强了她们合作的信心。这也增强了她们的组织意识，平寨妇女也发展出自己的组织和合作方式。就像领袖凤解释的那样：

> 我们和她们不同。我们平等分享利润，大家一起做，大家有不同分工，在心里我们感觉公平。我们的产品价格也比她们的高，因为我们的刺绣更加复杂。我们先剪纸，然后手工刺绣，非

常耗时。我们担心市场，担心我们费了很多时间，最后没人喜欢我们的产品，没人买它。但是看了其他人做的东西，我们有了信心。经过这么多年她们才成功，这就是为什么她们能组织这么多妇女的原因。现在我们有信心尝试了。如果我们不去访问她们，看到她们的成就，在心里我们依然有很多不确定性。这种感觉让我们无法定下心来开始工作。

这一次我们还带平寨妇女拜访了一家时装公司的经理，商讨合作的可能性。接着还在昆明看了一些民族手工艺品商店和花鸟街（昆明最大的手工艺品市场）来激励妇女的创造性，帮助平寨妇女了解市场上流行的货品。我们还介绍在昆明开了一家高质量工艺品店的老板林先生给平寨妇女，希望他作为手工艺产品设计者和店主，与平寨妇女分享一些市场理念和运作的经验。在这个分享工作坊中，平寨妇女很高兴地学习了很多东西，譬如做生意的技巧，也知道了有三种手工艺产品的市场：大众市场、高质量市场和另类公平贸易市场。平寨妇女在走访中感觉收获良多，得到了很多生产自己产品的点子。

六 消费者教育和公平贸易的推动

回到村子后，平寨妇女热烈地讨论了她们应该瞄准的市场类型。她们最终决定选择开拓精品的另类公平贸易市场。对她们而言，大众市场的价位太低，而且她们觉得大众市场产品的质量也差。如果做那么丑的刺绣，她们会觉得羞愧。她们真心希望消费者能够懂得欣赏她们高质量的刺绣，而且更希望价格在某种程度上能反映她们的劳动和

努力，以及她们传统文化的价值。

为帮助妇女测试市场，并增加她们与外界交易产品的信心，我们决定在两个国际研讨会上卖她们的产品，同时进行公共教育。在这些国际会议上，从2007年2月到7月，平寨妇女做了大量的刺绣产品，例如可以挂墙的刺绣镜框、刺绣手机包、刺绣桌布、刺绣垫子和抱枕套、刺绣纸巾盒套、刺绣名片夹、刺绣棉笔套、刺绣情人手链等。妇女们在短短时间内进步神速，而且她们高度的创造性也让人惊讶。她们从设计者和走访过的市场及商店的产品样式中吸收了大量的灵感和点子，她们成了自己产品的设计者。

在2007年7月16~20日香港理工大学举行的第15届国际社会发展联盟（ICSD）大会上，我们设了一个销售专柜和展览专柜来介绍我们的项目和展示平寨妇女的手工艺品。我们提出如下口号："您的购买将会产生不同!""购买平寨母亲的手工刺绣产品，支持她们的经济独立"，还有"购买平寨妇女的手绣工艺品，让我们与她们成为公平交易的伙伴"。

让人倍感鼓舞的是，她们的产品在大会上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赞扬，有很好的销售记录。许多人对这些刺绣产品的生产过程和产品之外的意义很感兴趣。他们还希望更多地了解妇女小组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在ICSD会议之后的那一周内，平寨妇女的产品出现在云南大学举行的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和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我们做了同香港会议上一样的事情。但是，不同之处在于平寨妇女参加了这次会议。她们向当地和国际的代表销售与介绍自己的产品。刚开始，一些平寨妇女很害羞，不敢面对面地跟陌生人讲话。但她们很快克服了这种紧张情

绪，当她们看到代表们赞赏她们的作品并想购买时，她们笑得像花一样灿烂。尽管对很多代表尤其是本地的代表来说，她们的价格比一般的旅游民族工艺品要高很多，但我们都一一解释她们价格构成的部分，让消费者明白公平贸易的原则——要肯定生产者的劳动价值和文化价值，在购买过程考虑的重点是免除购买产生剥削，而不单单是价钱的考虑。她们还在会上进行了一次表演，并公开响应与会者提出的问题。妇女们的变化让人印象深刻，她们如此的勇敢，表现了真正的赋权。

七 小组的巩固与发展

在这两次会议上，包括已卖的和与会代表订购的产品，她们差不多赚了人民币 23700 元。这一次的收益对妇女是一大鼓励，然而下阶段该如何进行呢？如何巩固其组织和规划将来的发展呢？

首先，我们让她们集体决定如何用她们赚的钱。妇女们开始学习簿记和会计的技术。去掉购买原料的成本人民币 10000 元，她们每人可以得到人民币 2000～2800 元。最可贵的是她们决定另外留下人民币 7000 元作为妇女集体（合作）发展基金。

为了帮助平寨妇女巩固她们的项目并理解这种合作形式的意义。我们联系了贵州省很出名的杨建红苗族刺绣学校，希望妇女可以学习这个组织的运作。杨建红苗族刺绣学校属于一个民间组织，由当地妇女杨建红创办。她的目的是保存传统苗族文化以及增加当地妇女的收入。这个机构主要是提供刺绣技术培训，给年轻苗族妇女提供工作机会。更重要的是，她以社会企业的方式运作它。不仅为了增收，也为

了赋权给妇女，增强她们的自尊和自信。她成功推广她们的产品，现在产品远销大城市和海外，像中国台湾和日本。

我们的项目工作员和妇女手工艺小组的成员在2007年12月去了贵州，到了苗族刺绣学校参观。杨建红女士介绍了机构的结构和运作，也介绍了她建立的苗族刺绣博物馆，里边收藏和展览了大量传统的苗族刺绣。平寨妇女和贵州的苗族妇女坐在一起对刺绣技术和妇女小组运作经验做了交流。这次的走访给平寨妇女展示了未来，使她们在平寨推动妇女手工艺小组的信心大增。她们受到杨女士的鼓励，也被她这么多年的坚持所感动，也开始明白保存传统文化的意义，同时提高了积极参与意识。

回到村子以后，她们做了年度规划，为妇女手工艺小组建立了管理体系和规范，并开始从其他自然村招募新成员。她们有明确的分工，例如一个负责簿记和会计，一个负责质量控制，一个负责样式和产品的设计。她们的规制显示了合作精神，促进了集体主义、信任、资源共享和主体参与意识的提高。

她们在2008年7月还建立了一个网站来介绍项目，分享故事，推广她们的产品。从2008年到今天，她们成功开发了公平交易网络和选择性市场。例如，她们先后得到了香港大学学生会、香港理工大学、公平贸易店、香港乐施会、中欧论坛等的订单。她们开始讨论与香港公平交易动力的长期合作，也开始收集传统壮族刺绣的作品，并准备建立一个传统壮族刺绣博物馆。她们已经在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研究和发展网络和社联的商务中心设立了一个橱窗，来展览、陈列平寨手工艺产品。2010年我们也与香港地脉基金会、鄂伦春基金会合作在母亲节一起举办了名为《母亲与女儿》的循环展，这个展览将从香港移到

北京、上海、昆明等地，希望教育公众，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理念，也愿意参与到我们的事业中。

八 我们的行动成果

经过几年的发展，这项农村社会工作计划基本上按照我们设想的妇女的能力建设和经济改善目标运作。最让人高兴的成就是发展了一个坚定的妇女核心小组，她们热心于参与妇女手工艺小组的工作，把它看成自己的事业。另外，很高兴看到当地妇女间的团结和合作意识逐渐增长，以及信心和自豪感的增加。通过推动妇女参与和赋权，很多妇女重新有了控制自己命运的感觉，并对自己的文化遗产产生了更强的认同感。

（一）从消极接受者到积极行动者

妇女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行动者。在项目的开始阶段，妇女认为她们为外来小区组织者工作。因此她们只关心可以从我们这里拿到多少钱。但现在她们清晰地意识到这是她们自己的项目和手工艺小组。发展的唯一可能性就是依靠小组成员的集体努力。

在这个过程中，平寨妇女也发现了她们自身的能力和潜力。刚开始，她们几次要求找些专家来教她们产品设计或简单地给她们设计好模板来模仿。但当平寨妇女有机会到外处参观手工艺市场，与其他少数民族妇女比较时，她们的信心增强了。当专业设计师的介入最小化时，她们的创造力和设计能力完全发挥出来了。平寨妇女成了本土设计师，并给我们展示了再创造刺绣样式、颜色和风格方面的能力。项

目朝着我们的理想发展："在小区中设计，和小区一起设计，为小区设计。"

（二）推动集体主义和合作精神

这个项目在村子里也打破了个人主义的恶习，推动民众转向了集体主义。刚开始，当我们强调合作组织建设时，平寨妇女都很冷漠，不明白为何要合作。但是，当她们看到合作和相互帮助的益处时，她们开始理解合作的意义。像一个平寨妇女兰说道：

> 之前我们看不到妇女小组的前景，所以我们不来。今天我们着实喜欢一起刺绣。我们聊天、设计和缝纫。我们相互学习刺绣的技术，很享受。而且我们可以交流信息。有一次我突然生病了，妇女小组的姐妹们帮我恢复了过来。

面对生活的压力，妇女们也不再孤单。她们在一起可以商量、一起分担，平寨中心的妇女手工艺工作坊成为了她们喜欢聚集的地方。

（三）发展了妇女关于管理和销售的知识和能力

这个项目的另一方面的能力建设是发展妇女销售和交易的知识。两年训练之后，她们掌握了做生意的基本知识，例如成本计算、价格设定、市场风险和产品制造。像小组领袖凤说的那样：

> 之前我们不知道如何做生意，我常担心有人可能下了大的产品订单，当我们生产出来时结果他们不想要。我们怎么样才能拿回钱呢？如果不能，我们的损失就很大。我们常常担心这样的事情，哈哈……我们之前不知道怎么去做生意，现在我知道可以跟

买主要定金，然后才生产。

（四）增强文化认同和文化保护意识

文化认同危机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另一个障碍。在市场经济的意识主导下，文化的价值往往用市场的价值来衡量，价格高、销路好才叫有价值。之前妇女觉得刺绣没有价值，是因为没有市场，所以大多数年轻女孩不情愿学习刺绣。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让妇女看到她们的刺绣是珍贵的，也让她们明白在主流市场没有销路和价钱低是因为当中的剥削和不公平贸易。当我们转向公平贸易的市场，平寨妇女就看到了自己产品的价值，因为购买她们产品的消费者或团体都是因为欣赏她们的刺绣手工艺和文化意义，而不是看重产品的价格。通过刺绣，她们的收入也不断增加，吸引了更多的人愿意参与进来。她们开始吸收年轻妇女，让她们开始学习刺绣。特别是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许多年轻妇女失业回到了家乡，陆续参加了妇女手工艺小组。会员们都很受鼓舞。就像兰说道：

> 我们都是40多岁的妇女，尽管小组中所有的姐妹都会绣花，如果我们不传下刺绣的技术，将来就会消失。现在任何一个30岁以下的，甚至更年轻的妇女根本不知道如何做刺绣活。

当问到她为什么如此享受刺绣时，她的回答着实让我们惊讶：

> 我们为什么保存刺绣？因为我们发现村子里的树将来都会被砍掉。我们的后代将不知道山的漂亮景色。现在我们保留下村庄

景色的样子就是为了告诉孩子们故事，让他们知道我们家乡的美。当他们欣赏着我们的刺绣时，一切都值了，尽管刺绣辛苦也累人。

妇女现在有了文化保护的意识，她们开始收集古老的刺绣和织物，也准备建个博物馆。她们也与村庄老年人协会里的老妇人合作，恢复古老的布料生产和染布技术。她们希望传统刺绣技术可以得到保存和发展。

（五）经济赋权与性别赋权

我们的项目很清晰地希望通过经济赋权使得小区的性别关系得到改变，妇女能够得到赋权。我们深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在这几年的过程中，从细微之处我们看到刺绣小组妇女与丈夫之间关系的改变。

在平寨，壮族妇女的家庭地位是很低的，家务和农活儿基本上都由妇女来承担。在饭桌上，我们每次都看到妇女总是在男人喝够吃饱才开始用餐。可是，我们看到手工艺小组妇女的丈夫对妻子的态度在慢慢改变，甚至重视起她们的工作来。我们常看到，当妇女集中在平寨中心赶工的时候，中午她们各家的男人都会做好午饭，给她们送来。每次跟妇女们聊到这事，她们都笑得很开心。

在小组领袖凤的身上，看到她丈夫更大的改变。以前她丈夫基本无所事事，家务不干，田也不耕。但自从凤挑起妇女小组的大梁，为家庭的经济带来很大的贡献后，她丈夫也开始积极起来。除了支持凤的工作外，也参加了我们另外的生态大米种植合作社。

妇女们还跟我们分享了她们经济自主的重要性，譬如凤说：

> 以前我们的腰包里没钱，每次跟老公要点零用钱都很难，还要看他们的脸色。到乡上赶集，想买点什么都不行，都要问准老公。现在我们的腰包有钱了，要买什么就买什么。要上街就自己去，不用理他们了，哈哈……

经济的自由让妇女们有了尊严，当说到这些的时候，她们都笑得特别开心，让我们深深感受到这对她们是多么重要，也是她们走下去的动力。

九 结语

与平寨村民一起工作的7个年头，我们发现农村贫困的核心原因不全是低水平的教育、土地贫瘠、村庄位置偏远、技术无法更新，以及缺乏市场经济知识等。主要应该是，农民失去对发展过程的控制并变得被动无助。当面对外来发展主义理念的冲击时，他们对自己发展的道路产生了错误的理解，以为农业商品化就能致富，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叫发展，以为外出打工就是改善生活，以为抛弃传统就是“先进文明”。这一切导致他们对农业生产失去了信心，也对传统产生怀疑。身份认同的危机使得他们迷失，生计的困苦使得他们变得悲观没有动力，对发展失去了信心。农村发展的另一个障碍是农户个人主义的抬头，没有合作和集体的支撑，农户个人往往无法与市场竞争，成为了市场经济的牺牲者。

因此，为了农村可持续发展，我们的首要关注不应只是增加生产

效率，增加农民收入，而是强调能力建设和赋权的工作。我们应努力在经济赋权的过程中重建在地民众的文化自尊和信心，达到文化赋权和性别赋权。我们在平寨的工作只是另类发展和农民合作的一种尝试。我们相信，发展没有唯一路径，它完全取决于是否能够使当地民众成为发展的主体，让他们意识猛醒和能力提升以抗拒在现代化发展中被边缘化。

我们的项目知识针对这些议题的初步尝试，希望将来能够有更令人鼓舞的发现与读者分享。无论如何，我们有一个梦，希望有一天农村的每个妇女可以轻松地告诉外来者："我们的幸福像盛开的花儿一样。"

参考文献

Collier, Ken (2006). *Social Work With Rural Peoples.* Vancouver: New Star Books.

Ginsberg, Leon H. (2005) *Social Work in Rural Communities.* Virginia, U. S. A: CSWE Press.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06). *Facts on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in the World of Work.*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Ku, Hok Bun (2003). *Moral Politics in a South Chinese Village: Responsibility, Reciprocity and Resistance.* Lanham, Md., U. S. 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Lohmann, Nancy and Roger A. Lohmann (2005). *Rural Social Work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un, Ngai (2003). "Subsumption or Consumption?: The Phantom of Consumer Revolution in Globalizing China", *Cultural Anthropology*, 18 (4), November, pp. 469 - 492.

Pun, Ngai (2005). *Making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Saleebey, D. (1997)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New York: Long-

man.

Scales, T. Laine and Calvin L. Streeter (2003) *Rural Social Work: Building and Sustaining Community Assets.* Belmont, CA: Brooks/Cole/Thomson Learning.

Sherraden, M. (1991) *Assets and the Poor: A new American welfare policy.* Armonk, NY: M. E. Sharpe.

Templeman, Sharon B. "Building Assets in Rural Communities through Service Learning." In Leon H. Ginsberg edited, *Social Work in Rural Communities.* Virginia, U. S. A: CSWE Press.

Tice, Carolyn J. (2005) "Celebrating Rural Communities: a strengths assessment." In Leon H. Ginsberg edited, *Social Work in Rural Communities.* Virginia, U. S. A: CSWE Press.

古学斌、张和清、杨锡聪:《地方国家、经济干预和农村贫困:一个中国西南村落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04 年第 2 期。

严海蓉:《现代化的幻影:消费和生产的双人舞》,《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0 年第 48 期。

第九章　流走边缘　团结创业

——云南流动社群合作生计的实践初探

香港理工大学　兰树记

一　背景

随着国家力量推动的城市化建设进程加快，农村人口往城市迁移的速度也在进一步加快，政府在应对人口流动方面的制度政策却显得相对滞后。以云南省昆明市为例，截至2011年12月，其城市流动人口总数就已超过200万，其中大部分居住在城中村或城郊结合部社区。但近年来房地产商与政府的利益捆绑，大规模的城市拆迁改造同时也在昆明上演。居住在城中村社区的流动社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冲击涵盖了家庭频繁搬迁导致的子女入学困难、居住缺乏保障、生活成本倍增、生计困难等。也因此，很多家庭面临返乡或艰难求存于城市的现实处境。出于对子女能接受更好教育以及在城市能有更多收入的期待，很多家庭更愿意暂时停留于城市。我们特别关注在流动社群中处于相对边缘位置的如来自贵州的布依族拾荒群体，流动中因带孩子无法就业的妇女群体，以及以“站工”为职业的非正规就业群体等。他们或因少数民族身份，或因职业的特殊性，更容易造成生计

的困难，及被社会所排斥。改善社群生计，已经成为服务于流动社群的非政府组织（NGO）必须关注的重要议题。但从传统单纯以社区服务为主到与社区经济的结合，对于以社会学、心理学及社会工作为专业背景的NGO从业人员而言，以推动社区经济的方式协助流动社群改善生计，注定将面临更大挑战。

二 社区经济在流动人口社区的可能性

“经济”一词是“经世济民”的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社区经济即是一种促进社区互助合作的重要方式，可将社区内互不相连的各种经济成分变为利益共同体，建立一种新的经济生产方式，从而促进社区民众的生活福祉。香港中文大学黄洪（2001）教授从香港的经验中提出，“社区经济”所尝试的是一种以非纯经济利益为主导的社会交换生活，是一种基于互助关怀的社会关系，强调以社区为本，由下而上的参与及动员，发挥各个不同网络群的才能、技术与经验的联结，来服务其他社群中的成员。他提到近几年本地一些劳工及社区团体在弱势社群中组成工人合作社或以“社区互助”方式进行各社群网络之间的生活互助，希望因而能建立一种不是纯粹以经济利益主导的社会关系，而是工人之间、弱势社群之间互助关怀的社会交换生活。如社区内失业的装修工人为老人搬屋、装修，单亲妇女的互助托儿，也有本地工人合作社尝试发展社区的环保回收工作等。这些实践既发挥工人原有的能力和技术，又可以满足社区的需要或促进其发展，特别是民间组织在协助工人或其他社群建立彼此的信任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在流动人口社区推动社区经济，意味着要发动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信仰背景的人走到一起，进行团队创业，回应社区生计改善议题。我们坚信，社区经济作为应对当前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其定能发挥降低民众生活成本、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及改善社群生计的作用。但社区本身的资源与条件直接决定着推动社区经济的可能性。流动人口社区相对于城市社区及传统意识上的农村社区有着极大的差别，但其快速形成高密度人口聚集特征，为推动社区经济提供了重要基础。

流动人口社区自身拥有的资源是发展社区经济的重要前提。这种资源既包含了人力资源方面上的资源，也包括了技术技能层面上的资源。我们所在的流动人口社区本地人口仅为4000多，外地人口数量近40000，本地与外地人口比为1∶10。在这样的社区中，有部分因照顾孩子无法就业的妇女，以及部分因辍学或未能实现就业的青少年，这些都是重要的人力资源。与此同时，社区里的民众自身就拥有各种各样的技术技能，如少数民族群体在流动过程中传承下来的手工艺技能等，这些为发展社区经济奠定了重要基础。

社区内生需要成为发展社区经济的重要推动力。大量流动人口居住在城市的城中村及城郊结合部社区，社区本身就存在着在衣食住行、幼儿照顾、青少年托管、养老及家政服务等方面的巨大服务需求。但现有社区经济模式更多从个人经济利益角度出发，缺乏对社区公益及互助理念的关注，容易引发假冒伪劣产品及食品安全等问题，破坏原本就已经很脆弱的社区信任关系。如2010年在我们工作的社区就发生过用死猪肉再加工售卖的案件，直接引发了本社区甚至整个城市对于猪肉市场的不信任，特别是城市民众加强了对城中村的负面评

价，为政府拆迁城中村提供了重要理由。而建设基于信任、互助合作的社区经济，可以有效促进社区不同社群之间的互动、沟通与信任，促进社区融合。

底层民众对于降低生活成本的需求成为推动社区经济的重要契机。在城市大拆迁的背景下，昆明的城中村社区在快速消失，较为低廉的城中村房源锐减，由此导致房租涨幅加快，流动社群租房困难。而由房租上涨直接引发的通货膨胀最终导致了流动社群生活成本的大幅提升，民众对于降低生活成本的诉求很高。因此，如何通过发展社区经济，降低社区流动社群生活成本，实现社区内生生产与消费，成为发展社区经济的重要契机。

三 从社区服务到社区经济

NGO 在国内发展不到 20 年时间，在最早开展的工作中主要以服务为主，较为缺乏社区经济的视角。如北京的工友之家、青岛的小陈热线最初都是以关注农民工维权开始；云南携手困难群体创业服务中心虽然以小额贷款起步，但很快又转为以服务为主；我们所在的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最初即是以服务流动儿童开始。但随着社区工作的深入，NGO 越来越发现贫困是社区工作中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我们从 2007 年开始即在昆明流动人口聚集社区开展工作。我们工作的最初思路是以流动儿童助学、功课辅导及各种兴趣小组为切入点，逐渐深入流动社群家庭。我们在社区里特别关注到有一群来自贵州的布依族家庭，他们以拾荒作为职业。最初，我们主要以丰富社群

生活为工作目标，组织布依族妇女舞蹈小组以及各种健康讲座。但我们逐渐发现，妇女对于这些活动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经过访问和了解，我们得出她们更加关心生计的结论。特别是在废品价格不稳定，以及近年来拾荒人群规模逐渐扩大，行业竞争日益加大的情况下，很多布依族家庭的经济面临较大困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认为社区工作一定要回应社群最为关注的议题。基于此，我们借鉴香港及其他地方的经验，在社区建立二手互助店，通过组织妇女参与衣物整理及售卖，回应她们的生计问题。但互助店面临的因销售无法跟上导致大量二手衣物积压的问题也同时出现。如何处理这些积压的二手衣物，给工作员提出了挑战。凭借我们拥有的在设计方面的资源，我们又带领社区妇女进行另外一种尝试，通过成立绿色手工坊，在设计师的帮助下，组织妇女进行旧物改造活动，希望以此能使积压的二手衣物重新焕发生命，做到资源的循环使用。同时基于社区有大量布依族、彝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群体的情况，我们希望能有所关注，并将旧物改造与少数民族刺绣进行结合。二手互助店、绿色手工坊这两个被我们称为绿领平台的社区经济项目由此诞生，我们在社区工作中开始涉足经济领域。

四　社区经济的实践反思

社区经济在减低社区生活成本、促进社区互助及社区创业方面的功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社区开设的二手互助店目前已有 3 家，参与妇女骨干有 5 人，而加入绿色手工坊的妇女人数稳定在 7 人。互助店通过在城市社区、高校的宣传获得了明显成效，定期会获得

大量二手衣物及少量其他物品，保证了互助店的物品供应。绿色手工坊通过两年多时间的摸索，开发了大量旧物改造产品，其中有2～3样较为成熟的产品能不定期接到订单。虽然发展社区经济取得一定成效，但我们同时也发现，社区妇女骨干不断离开以及工作员在其中的抱怨，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我们所探索的社区经济模式存在的问题。

纠结的补贴标准。在发展社区经济过程中，需要考虑参与人员的收入，但如何制定一个补贴标准，这是问题的关键。处理不好，往往会成为工作员及妇女骨干抱怨的焦点。我们在社区时常会听到工作员对妇女骨干的不满意，比如在妇女骨干提出增加补贴或手工费要求等方面。而妇女骨干也对工作员存在诸多意见，诸如严格的管理规定，却往往忽视了对妇女骨干进行个别对待。比如有一位单亲妈妈，带着眼睛有残疾的女儿，生活实属不易，每个月在互助店仅有800元补贴，不足以维系家庭开支。按照互助店的规定，每个月骨干只能拿到800元的补贴，请假方面也有严格规定，而这位母亲因为孩子经常生病需要照顾，如果完全依照这些规定，这位妇女无法很好完成工作。诸如此类，也就产生了骨干与工作员之间的抱怨。而这位妇女最终离开了互助店，去做她最擅长的家政服务行业。但她曾经多次提到希望在社区成立一个家政服务队，由她带领进行创业的想法。但机构出于各种因素考虑，并没有支持她的创业计划。如果与昆明最低月工资标准950元进行对比，每个互助店及绿色手工坊骨干每个月拿到800元的补贴，还没有达到最低工资标准。可以想象，那位单亲妈妈不可能依靠这点补贴坚持在互助店继续工作。我们虽然一直强调800元是补贴，而不是工资，但从互助店及绿色

手工坊的成立来看，最先是由我们提出来的。当妇女骨干知道工作员每个月拿着比她们要高出很多的工资，单位还给购买各种保险时，妇女们自然是有想法的。

社区资本的有效使用。社区资本包括社区拥有的经济、自然、社会及人力资本这几个方面。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黄洪（2011）举例说，在香港湾仔就使用了一种社区货币“时分券”，在该社区中，可以通过“时分券”加现金的方式在社区中进行基本的产品交换，由于“时分券”只能在社区内部流通，就避免了社区资本的向外流失。但在我们现有的社区经济项目中，并没有很好考虑社区资本的有效使用，大量社区资本外流严重，流动社群仅将城中村社区作为一种居住的功能，而没有意识到社区资本在社区内部的有效使用，导致了社区资本的流失。其实，社区大量家庭所需要的幼儿照顾、电器维修、老人服务等，都可以通过换工或合作社的方式进行运作，有效将社区资本在社区内部产生作用。互助店及绿领平台的工作，就是希望社区资本能够对自己的社区发展发挥促进作用，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并没有摸索出如何通过诸如“时分券”的方法替代居民对于货币需求的困境。

另类的代价。互助店及旧物改造最初是由我们这样一群带着理念先行的人提出来的。理念虽好，但往往忽视了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困难，如社区民众对于旧物的接纳程度，以及旧物改造的市场前景等。我们听到妇女骨干反映，很多社区民众不敢到互助店购买衣物，担心会被邻居或亲戚耻笑，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所以不少人更愿意在互助店打烊以后敲开门来购买衣物，这样就不能依赖于他们能够起到宣传作用，在社区民众对二手物品接纳度低以及

无法有效开展社区宣传教育的情况下，妇女们当然会担心销售的问题。而绿色手工坊将旧物改造作为推动社区就业，改善社群生计的另类做法，同样遭遇着来自消费者对于旧物的不接纳心理的影响。旧物改造产品也仅仅能售卖给少部分愿意接受旧物重新改造利用理念的人。打不开市场意味着参与的妇女无法拿到更多的手工费，在面临生活压力的情况下，有些妇女选择了离开。当看到社区妇女有创业的主张及意愿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做到及时支持，而由我们提出来进行尝试的社区经济路径同时也还没能较好实现社区就业，改善社区生计，这需要我们进行反思。

五 结语

互助店及绿色手工坊的社区经济模式，不可否认在改善社群生计、促进社区就业方面提供了可能的路径，但总体而言还有很多需要继续探索和完善之处。虽然通过互助店及绿色手工坊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区少部分妇女之间的互助与合作，但我们无法较好地去认真对待每一位社区流动妇女面临的生活处境。如果我们相信民众有改善自己生活的能力，那么我们需要更加充分地去挖掘社区的各种资源，如老乡网络及自助互助团体，以及社区民众自身拥有的能力。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协助他们发挥自身的能量去改变生活现状，去共同应对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结构。

参考文献

周昭德：《社区经济发展：失业者及边缘劳工的出路》，香港天主教劳工事务委员

会，2003。

吴明儒、刘宏钰：《社区经济与社区发展关系之初探——以台湾三个乡村社区经验为例》，《社区工作理论与实务》，2011。

黄洪：《社区经济是什么?》，http：//www. iri. org. hk/article_ 1. html。

Trevor Hancock（2010），“建立社区资本”，www. healthycities. ncku. edu. tw/。

第十章　社区妇女有力量：农民工社区的“同心希望家园”

香港理工大学　罗加铃

一　前言

北京市区高楼林立，过往那些由平房式民宅所区隔出的巷道——胡同，由于所剩无几，便在怀旧情怀的渲染下成为观光热点。眼尖的商人因而纷纷租赁起胡同内的平房，开店贩卖游客喜爱的怀旧商品赢利，例如民宿、餐点、小饰品以及胡同导览等，莅临的游客则主动配合起“感受老北京风味”的观光宣传，合理化自己的行径，以居高临下的心态透视着被“博物馆化”（Museumification）的在地风情。坦白说，这种体验北京的方式，充其量不过是经验商业手段所堆砌出来的消费文化而已，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劳动人民，通常不认同那是他们曾经的生活面貌。

事实上，北京都市外围，那些尚未拆迁的平房小区并未沦为观光化下的商品，且正以新形势在旧场合中延续。相对于四环路内[①]城市

① 北京城市规划以环形而论，主要以故宫为核心向外层层延伸出各环规划区，目前已规划至第七环，但较繁华的地段仍在四环路内。

中心为数甚少的胡同，四环外城郊区还保留有一些平房式的建筑群，居民生活依然仰赖蜿蜒的胡同，差别在于，这些平房多半由不断被整合进都市经济部门的外来人口聚居，主要是因四环路内各种政府机关、公司行号和百货商行盘踞，房价十分昂贵，在京务工的外地人[①]负担不起。举例来说，笔者北京友人位于二环路广安门内大街一处96平方米的电梯公寓要价300万元，租金则以5000元起租。

如此高昂的房价，导致2011年月均工资4672元的北京本地人常被迫与享有早年城市住房分配的父母同住[②]；而缺乏城市住房保障的农民工则在月均收入2049元的现实条件下[③]，仅能选择落脚于设施较差、房租便宜的城郊平房区，继续书写着过去北京胡同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四环路内、外的胡同虽在同一个城市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样貌，充分展现出国内社会“二元经济”（Dual Economy）发展的结构。

根据2010年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北京常住总人口有1961.2万，其中外来人口704.5万。但是，总数占北京人口35.9%的外地人，却有九成左右居住在四环路外的区域，如朝阳和海淀两区分别有151.5万和125.6万人；其他如昌平、丰台、大兴、石景山、房山、通州、顺义和怀柔等区的外地人加总也有数百万[④]。以“同心希望家园”（全称为“同心希望家园文化发展中心”，外界习惯称同心希望家园，以下简称“同心”）所在的石景山区来说，截至2011年底，

① 本文所说的“本地人”指持有北京户籍的居民；而“外地人”则指持非北京户籍的居民，一般多为农村户籍人口。

② 数据来源：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2。

③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2。

④ 资料来源：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办公室，2011。

全区常住人口为63.4万，而外来人口为21.3万[①]。

一般来说，分布在石景山区的平房多为计划经济时期兴建的房舍。当时在全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背景下，城市居民仅能享有基本的资源分配，导致这些住宅并不如晚近所盖的商品房有卫浴及供暖设施，而在随后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本地人口逐渐移居条件相对优越的新购楼房，或存有待拆图利的心态，更新基础设施的欲望并不强烈。所以至今关于如厕、盥洗这等“人生大事”，还是承袭历史在公共厕所及澡堂内解决，许多妇女因为如厕及沐浴不便，反复患有生殖或泌尿系统的疾病，如阴道炎和尿道炎等。

目前仍居于石景山平房小区内的本地人多半是早前服务于首都钢铁总公司（以下简称首钢）的工人（或眷属），近年因经济改制与迁厂等因素纷纷下岗，有些年纪较大无能力另寻工作者，便仅能以离退补助过活，或将首钢分配的住房加盖、隔间来租给外地人以增加收入。近几年由于房价的飙涨，石景山平房的租金在10年间增加了2~3倍，许多举家搬迁至此的农民工为了节约，便将孩子留在农村。以同心服务的几个小区为例，一般一个三口之家每月的基本开销包含：房租500~600元（10平方米空间），水电30~50元，食物与生活用品2000元，若是冬天则要增加烧煤取暖费150元。也就是说，举家农民工最低要支出2530~2650元/月（冬天则为2800元/月），且这个数目还不包含如娱乐、农村原生家庭寄养学童教育费等，因此有些家庭被迫双薪劳动。

虽然依照“十二五”规划，正逐步推进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相关

① 资料来源：北京市石景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口就业科，2012。

福利政策，但问题是“农民工意愿的房价和房租与现实差距巨大。那些想在务工地购房的农民工，能够承受的商品房单价平均为2214元/平方米，能够承受的商品房总价平均为21.82万元，能够承受的月租金平均为292.7元，都大大低于务工地的一般房价和房租水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加诸，新颁布的住房政策多半不允许外来户籍者申请保障性住房（如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亦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截至目前并未被列入城镇住房的保障体系，短期内外来人口租赁城郊区的简陋房舍，仍是他们无法逃脱的命运。

二 “个体”到“群体”的组建历程

1979年改革开放后，同心的创办人（负责人）马小朵成为第一批“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从江苏农村至北京务工的日子里，城市生活并不如预期的光鲜亮丽；相反，受到城乡二元发展体制的影响，进城务工的农民承受许多异常的待遇，例如同工不同酬、歧视及缺乏社会保障等，从而让马小朵兴起团结农民工以共同寻求改变困境的想法，遂于2005年3月8日，在北京石景山区雍王府小区成立同心，并以农民工的服务工作作为起点。

（一）爱心超市（二手生活用品商店）

草创期，作为实践者的马小朵深知兵马将至，粮草必须先行的道理，因为唯有解决团体成员的生存问题，共同改变自身困境的梦想才有可能真正化为行动，而不致流于单纯的想象，“爱心超市”便在这样的动机下成立了。

所谓爱心超市即同心以非营利组织的名义，从社会各界（主要是大学校园的学生）募得一些生活中实用的二手物品，如衣、鞋、背包、文具、图书、玩具及锅碗，经清洁与分类后，通过超市，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转卖给需要的农民工，例如一件夏衣3～10元，一件冬衣5～15元，一个盘子1～3元等。因为农民工工资普遍低于城镇职工[①]，为了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超市最初设定的服务对象是农民工，然而服务开展后，除受到农民工支持，亦逐渐受本地居民喜爱，于是便拓展为面对小区全体居民的服务点。最重要的是，如此操作一方面整合社会闲置的资源节省小区成员的开支；另一方面还能支持机构自身的运转，并创造一些就业机会来团结更多的人，凝聚更多的力量。

目前超市的4个店面（法海寺、北辛安、西黄村、金顶街小区）及1间作为统整捐赠物品的仓库（雍王府小区），也因应现实需要，分别设置在这一带的不同小区。据同心统计，超市成立6年多以来，已卖出至少12万件物品，所有收入除用于支持机构的运转外，多半作为回馈小区的公益性支出。例如，2006年资助小区内的艾滋病童1000元；2007年提供罹患子宫癌妇女2000元；2008年贴补小区贫困家庭置办年货500元；2009年支付肠癌妇女医疗费用1000元等。这些支出内容皆根据每年剩余多寡，由机构内所有工作人员共同商量而定。至于超市的财务管理，则采取公开透明的原则，方式为：①收到捐赠物品后立即清点与登记，接着送入仓库进行清洁与分类，再依各超市需求供货；②售出商品时逐一登记，并让购买者签名；③每日各店自

①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年的调查，“农民工家庭人均纯收入比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61.5%，仅比城镇居民家庭10%的最低收入户高1363.5元，比城镇居民家庭10%的低收入户低1545.4元，位于按收入五等分排列的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最低的20%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

行结账，做成记录；④每周各店聚集召开例行会议，审计营收并讨论相关改进事宜；⑤每月上网公开账目，以取得社会公信。至于现金的部分，则由超市管理员相互推选出一位妇女管账（银行存折），另一位保管印章，且每次提款后，所属银行会将当次账户支出及剩余，以短信方式传至机构负责人的手机。

现阶段，爱心超市的整个运作从募捐、入库、整理、分类、出货到销售，清一色由小区内的外来务工妇女负责，原因在于，许多从农村举家搬迁至北京打工的家庭，因家中有孩童必须照料，女性在传统思维影响下多半成为家务劳动的负责人，鲜少与外界互动，久而久之便失去与社会的联系，能力也因而遭到埋没，甚至被污名化为缺乏能力。因此，为了鼓励她们参与小区公共事务，同心招聘超市管理员时，优先考虑小区内较为弱势的移民妇女。当然，偏好女性还有部分原因在于，目前超市的创收仅够提供较低的劳务补贴，不太符合父系社会男性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者对工资的要求，但同心不排斥未来条件许可时，组织一个跨性别的团队。话说回来，超市成功的运转经验证明了妇女并非没有能力，而是没有机会运用或被忽略其才能，有些妇女甚至又文又武，在文学上也有不错的造诣，非常适合培养为文宣人才，例如管理仓库的谢琴就曾在岁末联欢会中，以爱心超市为题，唱了如下自创的歌谣，抒发了她参与同心的想法：

爱心超市进小区，实惠多多数不清。衣物实惠质量好，穿在身上暖人心。

打工姐妹在异乡，同心牵手走四方。高校师生爱心好，小区献爱永流芳。

小区献爱为我们，大爱无疆走江湖。名传千古走四方，同心希望永是福。

雪压青松松更青，霜打梅花花更红。面临拆迁压不倒，小草春天会翻身……①

此外，爱心超市不仅是贩卖二手物品的商店，也是小区内居民相互交流的场所，许多小区居民喜欢聚在超市话家常，分享或传递生活周遭的信息，例如哪个摊位今天肉价便宜、哪家人患病经济陷入困境等，无形中让本地居民与外来务工者融合，很多热心的妇女甚至在送孩子上学后就来超市帮忙，或替买衣服的人义务修改尺寸，或利用破旧废弃的衣物缝制鞋垫赠送给小区居民。同心同时通过这个平台，传达机构设立的理念，并适时组织小区居民参与同心举办的活动，例如讲座和联欢会等。

（二）儿童中心：师资来自小区

至于“儿童中心”的创立，某种程度即是成形于小区居民的意见交流。石景山的流动人口小区，聚集大量携家带眷的外来务工人员，其中包含为数不少的学龄前儿童，但因城市客观环境的限制，孩童无法如同在农村生活般处处皆可探寻自然资源，和同侪齐聚边玩乐边学习。因而家长们希望有一个公共空间让自家孩子有机会与更多同龄儿童互动，并接受学前教育，而不是天天关在家里，但碍于小区外围幼儿园的学费少则一个月数百元，多则数千元，非一般外来务工家庭所能负担。街坊邻居因此经常反映是否能开办一个学龄前儿童的学习空

① 参见同心希望家园，2011。

间，除了让孩童互动，也方便家长们交换育儿经验。

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同心的工作人员利用一年多的时间收集相关资料，并探访愿意义务协助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终于在2007年3月开始，陆续邀请一些幼儿园教师带领每周一次的亲子活动。在此期间，同心负责人马小朵更多次与北京师范大学长期从事流动人口学前教育研究的张燕教授接触，就成立儿童中心的师资问题进行讨论。张教授认为流动儿童教育应该遵循“始于学前、重在家长、依托小区、社会参与”的原则，从而鼓励同心组织热心参与的妈妈接受教师训练，以适应小区本身条件的情况出发，摸索出适合流动人口自身的非正规学前教育，而不要仰赖主流所谓的专家，因而催生了同心所谓的“妈妈老师”，也就是以小区内农民工孩童的妈妈们作为种子师资，她们在自愿自觉下接受培训，并在过程中不断地相互讨论、反思及改进教学方式，探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群体的学习方法。

2009年9月，同心本着边学边做的精神，在许多友善团体的支持下，除了维持每周固定开办一次亲子班外，更进一步成立属于小区的儿童中心，以自己培养的妈妈老师带领小区内招收的学龄前儿童，提供学前教育；并与张燕教授合作，在北京教委的认可下，成为非正规学前教育模式的推广点。目前这个计划仍在进行中，而妈妈老师们的教学技巧，也定期通过每周的校外学习不断改进。值得一提的是，儿童中心成立初期，因受到各界资助[①]，所以能免费服务小区居民，但是渐渐地因参与学生越来越多，必须增添的资源随之增加（如课桌椅和午餐费等），以及将原本依赖外来支持者的操作方式，逐步转为以

① 例如北京金苹果幼儿园捐赠儿童午休的床铺，小橡树幼儿园提供义务支教，以及香港乐施会资助房租等。

自己培训的妈妈老师为主导的形式后，所要支付给妇女的劳务补贴等开支，纷纷加重了同心的负担。2010 年 3 月，正当同心的工作人员烦恼着该如何依靠自己撑下来的时候，有些家长提出了收费的建议，并在一次家长齐聚的讨论会中共同决定每位学生每月缴纳 300 元作为支持儿童中心的费用，显见儿童中心深获小区居民肯定。

（三）图书角

除了服务学龄前儿童，同心也照顾到学龄期儿童的需要，“图书角”便是一例。事实上，设立图书角的点子来自小区内学童强烈的求知欲。一直以来，社会各界捐赠给同心的物品中不乏儿童书籍，但因人力有限，这些书籍有段时间被遗忘在服务处的墙角，一些经常到服务处玩耍的孩子，就主动“挖”书来看，无法在回家前阅读完毕的书籍，就要求借阅。消息传开后，越来越多的儿童响应，甚至提议增加不同类别的书籍。

基于许多流动人口家庭的经济条件无法多出剩余为孩子扩充学习资源，同心便腾出服务处的一个角落（5～6 平方米），成立了这个免费的儿童图书馆，并广邀社会各界捐赠不同类别的书籍来满足孩子们的需要。为了培养孩童的阅读习惯，还鼓励准时还书、保持书本良好状态（如不乱画），以利于资源共享。同心还定期举办由义务教师或大学生社团带领的“故事会”和“书友会”等活动，让孩子交换阅读心得，并借机在聚会上给予奖励。目前，这个每周六对小区儿童开放的图书天地，已超过 300 位孩童持有借书证，未来预计增加开放时段，并组织高年级同学成立义工团队，自己管理图书资源。

（四）三点半学校

近几年，同心为了将触角延伸至小区的每一个角落，服务更多的农民工家庭，也安排定期家访，探询他们的需要。举例来说，北京石景山区这个外来人口的聚居地，农民工家庭通常都租住在旧式平房加以分隔出来的约 10 平方米的小屋内，学童无法拥有独立的学习空间；有些家庭为了节省电费，甚至使用低瓦数的灯泡，孩童因而必须在小灯下或门口趋光处完成作业。有鉴于此，2009 年 5 月，同心在小区内开辟一间设有书桌椅及灯光充足的学习室，并安排大学生义务给予课后辅导，供有需要的同学使用，由于这个教室开放的时间是配合学童放学后的时间，故顺势称为“三点半学校”。

（五）系列讲座和艺文活动

除上述之外，同心也不定期举办讲座，邀请不同领域的人来分享经验，议题包括因应生活需要的，如子女教育和妇幼保健等；因应改造世界观需要的，如小区参与、性别意识与经济发展等。同心更希冀将艺文与小区凝聚作结合，举办如电影赏析会，借由讨论社会议题的影片，让大家认识农民工的社会处境；或组织妇女歌唱班，借由教唱与劳动者有关的歌曲，讨论歌曲的创作背景与缘由，以增强团结意识等。有些外来务工妇女甚至受到启发，而将传统中国民间群众表演的“三句半”改编为“四句半”，并把现实生活融入说唱曲艺，公开表演，希望让更多的人关注农民工议题。例如：

天南海北打工人，离别故乡闯四方。相约北京石景山，高低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搬砖卖菜扫大街，修鞋修车焊大梁。一把辛酸一把汗，一年辛苦一年忙。

忙了才充实！

出门摆摊怕城管，家里睡觉怕拆迁。孩子上学怕偷懒，生病住院怕花钱。

谁给咱上保险？

同心希望好家园，儿童中心乐翻天。爱心超市衣服好，物美价廉心里甜。

大实话！

社会各界献爱心，大学都把衣服捐。小橡树老师来支教，金苹果送床送温暖。

还是好人多……①

三 “分散”到“凝聚”的困境应对

然而，所有计划在实践的过程中并非事事顺利。同心成立至今，经历过不少挑战和危机。所幸，每次危机都能化为转机，进而强化团队的向心力。以下分享几个对同心影响较大的案例。

① 参见同心希望家园，2011。

（一）拆迁

1993 年以后，因受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加速工业化与大办开发区的影响，大量外地人涌入北京务工，这些外地人基于经济考虑，选择了类似像雍王府这样的城郊区落脚，由于移入的人口渐多（如雍王府的人口从原本 2000 人左右，暴增至 3 万人），本地人便顺势将自家房舍分隔成多个小屋，或在原本乘凉的院子上扩建更多房子出租。但是，许多农民工聚居的平房小区，由于多属旧式建筑群，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先后被划入发展的蓝图，2000 年以来陆续遭到拆迁，因此租金便宜的地段越来越少。

据当地人说，石景山区开发较晚的原因在于，备战时期军重工业发展重镇之一的首钢坐落在此区，其所带来的污染使房地产缺乏市场。不过，2008 年首钢迁至河北省唐山市后不久，开发商很快将目光转至此区，迅速派人挨家挨户地拜访屋主，拆迁的风声此后就没断过，安置的事宜更是大家茶余饭后闲聊的话题。但令外地人诟病的是，与拆迁相关的安置事宜通常以屋主家庭为主，鲜少考虑大量的流动人口要搬往哪里，诚如某位外地人批评的：

> 2008 年的时候，首钢迁了，所以 2009 年时开发商看中了这个地方，然后就开始赶流动人口走，那个时候的口号是“城乡一体化，王府现代化，生活质量化，环境生态化”。流动人口觉得你们要生活质量化、环境生态化，我们就要更边缘化，就要被赶走，当时小区还有大家喜爱的爱心超市，有儿童中心，大家一起努力干了 5 年，最后全被赶走，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补偿，本地人

房东却都分到了房子，而外地人只有被赶走，只能到处找房子……

2010年夏，雍王府小区确定拆迁的通知传来后，各项计划逐步步入轨道，机构基本能够自给自足，并试图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同心，再次面临考验，例如已经组织成形的移民妇女团队，可能因为各自搬离而各奔东西；运作中的爱心超市是支撑同心运转的经济来源，拆了现址后如何另起炉灶；还有重新寻找的服务处、超市店面、仓库和儿童中心等空间，机构能否负担起日益增长的租金。同心的工作人员曾说，当时大家都着急了，每天全体动员，四处寻找新的、合适的地点，醒着的时候，脑子里基本萦绕的都是“未来怎么继续”这个大问题。

值得欣慰的是，同心的工作人员在那段遍寻新据点的日子中，虽然都很辛苦，却反而因为共同对抗外在矛盾，内部产生了很强的凝聚力。例如，新租来的一些地方，有的如同废墟，杂草与垃圾布满屋院，决定租下时，有些本地人曾质疑是否能住人，但由于房租便宜，在经济考虑下，大家只能集结劳动力及创造力，一起打扫，一起布置，硬是把它弄出个像人住的样子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上网看看他们的博客（Blog），你一定也会佩服他们的毅力。2011年初，同心搬家了，新据点是离原服务处约2500米的北新安小区，而以往团结的农民工们虽然后来住的稍微分散，但基本都还在彼此能够联系的距离。其实，同心坚持不远离石景山区的最主要因素并非经济问题，因为曾有人愿意在较近城中心的地方提供免费的空间给同心使用，但遭到拒绝，原因很简单，因为离开自己团结的对象——农民工——的据点（聚集区），同心的存在便没有了意义。

（二）基层主体的模糊

短期内，空间的问题大抵解决了，接下来是人事问题。打从同心“被决定”要搬离雍王府小区开始到新据点设立期间的数个月里，工作团队的主要任务基本是应付拆迁衍生而来的种种问题，而与此相关的许多事务都要跟行政单位接触，例如与小区居民委员会协调进驻事宜，跟政府单位重新申办机构运转的不同许可证等。由于移民妇女对这些工作相对没有经验，所以习惯默默退居二线，从事如打包、搬运和清洁等工作，那些文书上的行政工作则由机构中学历高些的知识分子全权处理。久而久之，团队中本应作为主体的移民妇女的声音弱化了，负责超市经营的妇女们以及一些妈妈老师甚至不自觉地以对待领导（主管）的方式面对这些知识分子，而这少数几位知识分子实际上成了“脱产干部”，于是团队内部逐渐出现分化和官僚化的问题。加诸，大家重新安顿后立即开展先前搁置进行的读书会，几次对社会议题、机构未来走向的讨论，显现了彼此世界观的差异，上述少数的这几位工作人员是以同情弱势、济世扶贫的视角来看待机构的目标，以“自我牺牲”看待自己在基层的工作，并不自觉地以自己为主体，以小区妇女为需要帮扶对象，于是团队间逐渐产生派系，从而在工作的开展上也因观念的差异产生分歧。

当时，团队内部出现的这个纷争，影响了大家的工作士气，同心的负责人马小朵担心团队凝聚力就此瓦解，因此对内，她尝试与个别工作人员恳谈，征询意见；对外，则广泛求教于相关团体（尤其有类似经验者），想要尽快化解危机。最后，通过几次内部的辩论，点出了大家在世界观上的相左，当时大多数的工作人员（尤其是移民妇

女）都支持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团队的工作关系和重新认识同心原本的目标，使同心不至于落入爱心救济式的慈善机构之列。遗憾的是，反对多数人共识的少数几位年轻同事却以离职作为抗议。坦白说，这个结果对机构来说损失颇大，因为这些决定离职的工作人员都积极干练，才华横溢，如他们会架设网站和设计文宣等。

然而，大家在总结经验时也认识到，每位加入实践过程中的人，未必始终志同道合，有些人或许在某些时候起到进步的作用，却在过了那个历史的时间点后成为反动的力量，因此为了坚持初衷，只能忍痛选择互相祝福，分道扬镳。同心在经过这次可贵的教育后，为了避免再次发生主客体倒置的问题，工作安排不再有“脱产干部”，人人参与劳动，且预计未来将采用定期轮调不同岗位的方式工作，亦即一段时间在基层，如经营超市，一段时间在办公室，如学习计算机操作、报告撰写和联系接洽等，如此不但可以边工作边学习，熟悉彼此的工作性质，必要时相互支持，同时也会发掘某些人的某些潜力或兴趣，进而对工作做适才适性的调整，一举数得。

（三）与小区的关系

最后要讨论的是同心与小区的关系。事实上，同心作为一个外来的草根组织，进驻小区初期，由于本地居民对同心不熟悉，双方在缺乏信任基础的情况下，不少本地人对同心的工作不表认同。以爱心超市为例，刚开始有不少本地人拒绝接受超市贩卖的二手物品，以讹传讹超市里的东西全是过逝者家属丢弃的，是不祥的，不该购买，因而阻碍了超市的发展。虽然死者用过的物品能不能回收再利用仍有讨论

的空间，但为了化解当下存在的矛盾，同心暂时搁置争议，除了制作小传单，在小区各个角落发放，解释超市物品多是大学毕业生因返乡带不走而捐出的；同时定期安排各大学管理捐赠事宜的社团成员至小区参观，让捐赠者与本地居民接触；加诸一些帮忙至大学拖运物品的货车司机都住在邻近小区里，本地人会直接向他们打听信息。几经宣传后，渐渐地本地人开始走进超市消费，然后自行发现店内衣服确实偏年轻化，且许多运动衫印有大学校名，才逐渐消除误解，转而代为宣传资源再利用的优点。

比较可贵的是，这一事件教育了同心的工作人员：若想在小区内开展工作，获得本地人的接纳和支持极其重要。也因此，虽然同心以服务农民工为主，但公开的活动（如讲座）必然积极邀请所有小区居民参与，一方面借机让本地人认识同心的实践工作；另一方面则让本地人与外地人有机会相互交流，了解彼此，增进情谊，如此若产生矛盾，较易化解。例如，曾经有居住在儿童中心周围的本地居民抗议幼童活动嘈杂，干扰其生活，要求儿童中心搬离，若按照往常的经验，本地人多半连成一气，一致抗“外”，但由于本地人与外地人通过同心这一平台加深认识后，当时部分本地人主动出面缓解，最后以幼儿活动时尽量压低音量达成和解。

四　“反思”到“再前进”的未来规划

林林总总的挑战让同心的工作人员不断在自省与总结中向前，应对问题的态度也渐受改变，尤其是作为主体的移民妇女们慢慢地会提出反对的声音，而不像以往总是认为自己什么都不懂，选择沉默。不

过，农民工群体所面临的问题毕竟是结构性的问题，而结构所引致的个人痛苦，绝无法因个人的抵抗而消失。

对于身为外地人、底层劳动者、缺乏社会资源及没有在地亲属网络的农工来说，也的确不大可能以个体的力量打破长期面对的困境。但是若有一定的组织、共同的意识形态和目标，改变现存问题的时间也许漫长，却未必不可行。著名剧场工作者钟乔曾以“蜗牛不一定比小鸟慢”的故事，勉励基层工作者不要因为既存的弱势状态，就认为所有事情皆不可为，反倒该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下，摸索转化限制的可能性，而不是放弃或等待救援。故事概述如下：

> 树林里的小鸟邀请蜗牛进行一场比赛，规则是3个月内谁先到达树林彼端就是赢家。比赛开始后，小鸟认为蜗牛行动缓慢，不可能依约到达终点，便一直拖到最后一刻才启程，最后小鸟虽在约定时间内抵达目的地，却在抵达时发现蜗牛早已守候多时，原因是树林里的蜗牛在过去的3个月里，以接力的方式传递比赛信息，每逢寸步遇上另一只蜗牛，就将信息往后传，直到临近终点的那只蜗牛接到信息为止，整个过程只耗时2.5个月，蜗牛因而获胜。

现阶段，同心持续在艰苦的环境中求发展，一方面要维持机构的生存；另一方面要朝改变农民工困境的方向迈进。涉及前者的，如当前许多非营利组织以募集物品转卖的方式筹资，爱心超市的捐赠来源因而受限，为此同心正寻求替代方案。关于后者的，如长期以来，同心虽将重心放在组织移民妇女，但妇女们经常把在同心接收的观念与家庭成员分享（尤其是伴侣），渐渐地有些男性成员的思

想也在改变，例如以往认为女性只需把家务管理好而不需抛头露面的一些男性伴侣，开始主动协助做家务及照顾幼童，以让他们的女性伴侣腾出时间参与小区公共事务，甚至有些男性伴侣也要求参与。同心意识到这个改变，并希望借此发展出其他的可能性，例如这些男性多为技术工人（焊接、木匠和水电等），若经组织，或可成立小区自己的装修合作社，这样一来除了能养活农民工自身及增加经济来源支持机构，也能因为有更多的人加入同心的工作，而壮大团队力量。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同心已经撷取上述故事中的蜗牛精神，虽在实践的过程中有诸多限制踽踽而行，却始终不放弃团结改变困境的可能性，期盼未来有更多人成为同心人，一起为改善农民工的困境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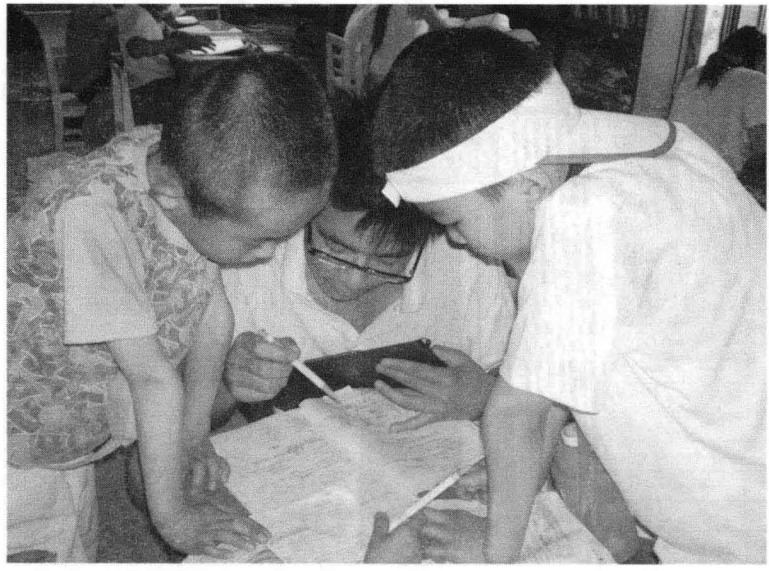
同心爱心超市衣物募捐



同心爱心超市



同心妇女干部聚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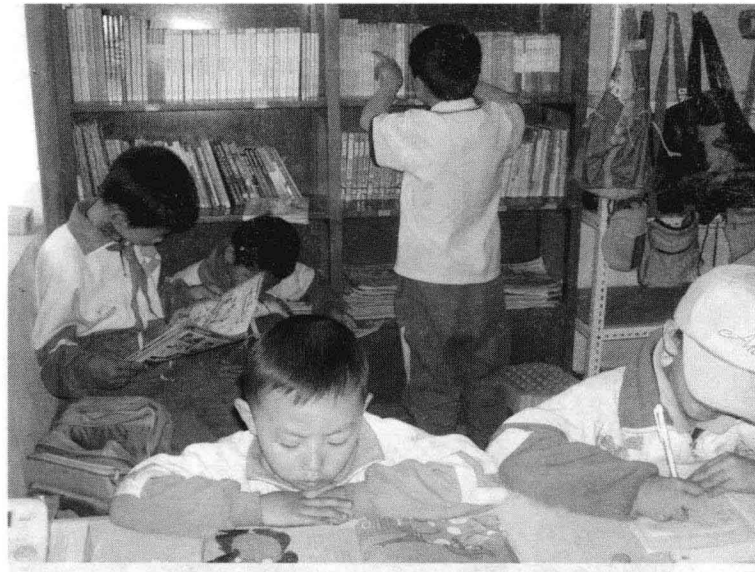
同心三点半学校：大学生义务课业辅导



同心社区拆迁导致同心被迫搬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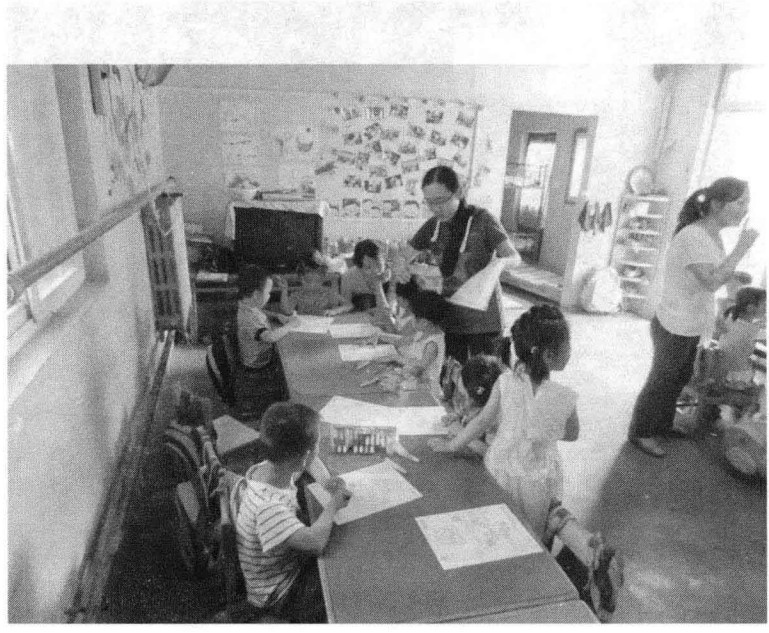
同心社区居民购买爱心超市物品



同心图书角



同心幼儿园



同心幼儿园：妈妈老师授课中

参考文献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历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http：//www. bjdch. gov. cn/n5687274/n5723271/n5736318/n5736858/n5737008/7340175. html，2012. 11. 21。

武洪敬：《从数据看一年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口变迁》，《数据》2012 年第 4 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 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http：//www. stats. gov. cn/tjfx/fxbg/t20120427_ 402801903. htm，2012. 6. 21。

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办公室：《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的地区分布》，http：//www. bjstats. gov. cn/lhzl/rkpc/201201/t20120109_ 218566，2012. 11. 21。

周忆如：《南洋姊妹要说戏：当组织工作搭载文化行动》，http：//web. bp. ntu. edu. tw/WebUsers/taishe/assembly/A4 - 1. pdf，2011. 12.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十二五时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要点》，《中国经济报告》2011 年第 3 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社会经济在中国
作者=潘毅主编
丛书名=社会经济研究丛书
页数=221
SS号=13437612
出版日期=2014.01
出版社=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号=978-7-5097-4909-8
中图法分类号=F124
原书定价=55.00
主题词=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参考文献格式=潘毅主编．社会经济在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01．
内容提要=本书着重探索社会经济的理论问题，并扎根在中国社会的本土实践上，摸索一种有别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作者主要阐述的观点是，从根本上来说，社会经济不是服务于资本积累的，而是重新将经济发展嵌入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新型模式。社会经济的实践是多元化的、开放性的、非垄断的，真正回归社区和人的发展需求的。例如，合作社（生产者合作社，消费者合作社）、社会企业、公平贸易、社区内生性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等等……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部分　重思社会经济——理论篇
第一章　指南针：指向社会主义的替代性选择＆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埃里克·欧林·赖特（Ｅｒｉｋ　Ｏｌｉｎ　Ｗｒｉｇｈｔ）
第二章　团结经济：主要概念和问题＆团结经济网络创办人伊桑·米勒（Ｅｔｈａｎ　Ｍｉｌｌｅｒ）
第三章　公共资源的未来＆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大卫·哈维（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ｖｅｙ）
第二部部分　当代中国的合作经济实践
第四章　周家庄：人民公社遗产的新启示＆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李长江　卢晖临　潘毅
第五章　崖口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危机＆香港理工大学　刘亚
第六章　山西永济市蒲州果品协会社会经济案例＆香港大学东莞理工学院　何宇飞　居正
第七章　农户融资：山西蒲韩乡村合作与台湾农会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　袁月兴　杨帅　温铁军
第八章　妇女、手艺与合作经济——一个西南村落的实践案例＆香港理工大学　古学斌
第九章　流走边缘　团结创业——云南流动社群合作生计的实践初探＆香港理工大学　兰树记
第十章　社区妇女有力量：农民工社区的“同心希望家园”＆香港理工大学　罗加铃